SORSTALANSÁG

2002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作品

无命运的人生

KERTÉSZ
IMRE

[匈] 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许衍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ORSTALANSÁG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1929年11月9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44年，他刚满15岁时，被纳粹投入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第二年又转入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5月获救。19岁时开始在布达佩斯一家报社当记者，1951年被解聘。从此靠翻译和写作谋生。翻译过尼采、霍夫曼斯塔尔、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德语作家的著作，并著有《无命运的人生》、《惨败》及《给未出生的孩子的祈祷》等作品。

责任编辑　傅石球
装帧设计　王　俭


ISBN 7-5327-3222-3
9 787532 732227 >
易文网：www.ewen.cc
定价：16.00元

ORSTALANSÁG

2002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作品

无命运的人生

KERTÉSZ IMRE

[匈] 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许衍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命运的人生/(匈)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K.)著;
许衍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2
书名原文:Sorstalansag
ISBN 7-5327-3222-3

Ⅰ.无... Ⅱ.①伊...②许... Ⅲ.长篇小说—匈牙利—现代 Ⅳ.I51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3482号

图字:09-2003-056号

无命运的人生

〔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雷 著
许衍艺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72,000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ISBN 7-5327-3222-3/I·1878
定价:16.00元

为了回忆的持续

（译者序）

200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 · 伊姆雷（注：匈牙利人名习惯为姓在前名在后）1929 年 11 月 9 日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小商人，但家境并不宽裕。 5 岁那年，父母离异，后来又分别再婚。凯尔泰斯日后回忆道：“ 我有四个父母 ,但我却在教养院里。”儿时的这种生活经历与《无命运的人生》中少年柯韦什的经历颇为相似。凯尔泰斯不懂希伯来语，不识犹太习俗，对于犹太教亦知之甚少，他始终强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是被外界 “ 强加 ” 到他头上来的。1944 年，14 岁的凯尔泰斯被投入奥斯威辛集中营，后被转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 年 ,美军解放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回国后，凯尔泰斯从事过体力劳动，当过报社的记者。在匈牙利极左路线统治时期，处于苦闷和无聊中的凯尔泰斯也曾迫于生计写过一些娱乐大众的轻歌剧。一次偶然的机会，凯尔泰斯接触了托马斯 · 曼的作品，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随即四处收集并潜心阅读这位德国作家的著作，很快，凯尔泰斯开始写作了。对于许多问起他的集中营经历的人，风度儒雅、人情洞达的凯尔泰斯只是讲讲他们想听到的奥斯威辛，但从未触及那

些深深埋藏在他心底的东西。只有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才重新回到那个被他“忘记”了的世界里，而这些作品也总是无一例外地指向他所经历过的恐怖和专制极权。《无命运的人生》这部 14 万字的小说从构思到脱稿历经 13 年时间（在此期间凯尔泰斯还创作着其他作品),于 1973 年完成，但直到 1975 年才得以出版。小说出版后反映平平，也没有给作家带来他所期望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失望之余，凯尔泰斯在自己简陋的蜗居里完成了《失败》(1988)和《给不曾出生的孩子的哀祷》(1990)。这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柯韦什·久尔吉，一度被人们看作是凯尔泰斯的三部曲。2003 年 9 月,凯尔泰斯出版了新作《清盘》,为他的种族大屠杀小说划上了一个句号，也使得他的作品最终构成了一个四部文集。1989 年东欧剧变之后，凯尔泰斯得以公开地活动，他的一些演讲和随笔被收集整理成《作为一种文化的大屠杀》(1993)、《行刑队再次上膛前的瞬间静默》(1998)以及《被放逐的语言》(2001)。凯尔泰斯的其他作品还有:《寻踪者》(1977)、《英国旗》(1991)、《苦役日记》(1992)、《笔录》(1993,与另一位匈牙利作家埃斯泰尔哈兹·彼得合著)、《另一个人 演变编年史》(1997)等。作为翻译家的凯尔泰斯曾译介过尼采、霍夫曼斯塔、施尼茨勒、弗洛伊德、洛特、维特根斯坦、卡内蒂等人的德文著作,这些人均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 20 世纪 80—90 年代起，凯尔泰斯陆续荣获了包括德国勃兰登堡文学奖（1995）、莱比锡书展大奖(1997）以及匈牙利柯苏特奖(1997）等在内的多项国际国内文学大奖。2001 年被授予代表德国文艺界最高荣誉的“功勋奖章”。

2002 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凯尔泰斯现旅居德国柏林，他所有的作品均已被译成德文出版。

凯尔泰斯的作品不断重复着奥斯威辛的主题。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有句名言“奥斯威辛之后不可能写诗。”凯尔泰斯将这句话解读为：“奥斯威辛之后只能写奥斯威辛的诗。”种族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包罗了历史意识的本质、回忆的可能性与意愿无法传达的经验，以及忘却的必要性等诸多问题。回忆与树立纪念、理解与使人理解在此面对着其自身的不可能性。那些视回忆的持续为道德己任的人常常受困于传承的迫切需要与媒介的无能为力之间。凯尔泰斯曾在《奥斯威辛属于谁？》一文中指出，在种族屠杀问题上形成了大屠杀感伤主义、带有禁忌体系的大屠杀经典及其仪典般的语言世界，形成了大屠杀廉价商品，甚至还形成了对大屠杀的否认。为我国广大观众所熟悉的电影《辛德勒名单》创造了一个大众神话，在这神话中，关于罪犯与牺牲者之间的界限、反抗与幸存的关系等许多敏感问题都被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种族大屠杀被降级为仅局限于德国纳粹分子与犹太受害者之间的问题。这部黑白片结尾的彩色镜头暗示着人类跨越了恐怖，过去被抛到了身后，人文主义理想得以安然无恙地永世长存下去，凯尔泰斯因此称其为一部拙劣之作。另一部电影《美丽人生》为牺牲者与幸存者之间的道德关系提供了一个悲喜剧——通俗剧式的视角，凯尔泰斯说：“这部电影将这个可怕的世界的一切荒谬都告诉了我们，而在这无奈面前无能为力的脆弱的人却依然具有着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它只是个“童话”。种种层出不穷的

传达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有关种族大屠杀表述的最基本问题，即无法描述性及独一无二性、归根结底为可理解性的困境。凯尔泰斯，这位将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贡献给了回忆之持续的作家这样写道：“对于种族大屠杀这一无法理解、无法纵观的事实，我们惟有借助于美学想象才能真正地建构想象。’可以说，《无命运的人生》这部作品正是通过实现奥斯威辛经验的持续化而保持了对于大屠杀的被迫道德反思。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匈牙利文坛，各类大屠杀题材的文艺作品均受制于反法西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在创作上以传统的语言再现观念为基础，强调语言中介的“透明性”，不注重文学的表现手法。《无命运的人生》由于没有满足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真实再现原则的要求，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声讨”，所以在出版后遭到了冷遇，此外，其古怪的风格也令评论界不知所措。随着“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到了 80 年代,匈牙利国内开始有人尝试着重新诠释《无命运的人生》，并有评论家视其为一部后现代主义的作品。

《无命运的人生》虽篇幅不大，却令人百读不厌。其中的妙处就在于，小说在铺陈事件的同时，通过一个有着独特身份及语言的讲述者的声音,对(生活)故事之关联性、回忆与纪念物、话语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话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从个人与集体的记忆及评判道德问题的角度来说，这一点才是最为重要的。

在凯尔泰斯后来的自我分析文章中可以读到，作家认为传达

奥斯威辛的首要条件不是进行真实的描摹，而是要找到一种语言使用形式、一种中介，以便能使奥斯威辛作为一个过程、作为一个一步步实现的（从前因实际上是推导不出来的）事件显现出来。《无命运的人生》旨在搭建一个考察对于奥斯威辛的态度、重新思考其意义（无意义）、发掘各个不同视角的潜在意义并使之相互对照的平台。作品挑战了语言的承载能力，展示了美学经验的力量。

《无命运的人生》的主人公是一个十四岁的犹太少年柯韦什·久尔吉。他以一种特有的、犹疑而迂曲的方式讲述了 1944 年春他的家庭送父亲去劳动集中营、两个月后他本人在上班途中被抓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然后转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又从那里去了蔡茨集中营,后来被遣送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后于 1945 年春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一起返回匈牙利的故事。在久里（久尔吉的昵称）的讲述中，集中营的生活如同单调乏味而又真实的日常生活一样，有苦痛,有无聊,也有欢愉与幸福。与其他所有的犯人一样,久里也在一步步地适应着集中营里越来越恶劣的生活条件，直至他的身体严重衰竭，最终他放弃了生的抗争。但就在此时，完全出乎他预料的是，集中营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们对他进行了救治和照料，这让长期生活在惊恐与怀疑中的少年百思不得其解。少年生存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久里发现,发生过的一切无法传达,在牺牲者和局外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站在两个时代交替的门槛上，少年带着他的过去,准备继续他那‘无法继续的生活”。

《无命运的人生》是一部自传式成长小说。主人公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少年人命运的形成则大体上符合成长小说的基本结

构。成长教养类小说或记录少年如何经历时间的磨练演化为成人的过程，或追索个人如何在历史变迁中与历史一同成型，直至完全脱胎换骨，个性在顺从中获得理性的升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柯韦什的社会化过程却是在集中营的世界里完成的，他在个性形成过程中所学得的实质上是这个世界的秩序，并与之形成了特有的和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种学习——顺应的过程中发生的。在小说中，柯韦什要学习的不是欧洲文化中一脉相传的人文知识，而是奥斯威辛的世界，是“支柱”的轰塌，是与此前世界经验的粗暴决裂，是文化摧折的认知体系，是宣告了先前之道德考虑通通无效的“谋杀”准则和“幸存”策略。通过少年柯韦什的个性形成的遭遇，奥斯威辛的历史存在展现在了我们眼前。当柯韦什回到家乡时，他将这种“教养过程”视作已结束的、最终有效的和无可逆转的,不能够否认它已经发生过“新的生活——我认为—— 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或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患了病时才有可能开始，我想他们也许并不希望看到后一种情况…… 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够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小说最震撼人心的一刻是柯韦什重返故乡后，体会到了无法使他人理解，这时他对集中营产生了思乡之情：“即使是现在，即使是在这里，我也认得出它——这就是我在营地里最喜欢的那个特别的一小时，此后有一种尖利的、痛楚的、徒劳的情感攫住了我的心：是想家了。一下子，一切都鲜活了起来，一切都在这时涌上了我的心头，它古怪的氛围完全淹没了我、那些琐碎的回忆让我颤抖不已。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里的生活更清楚、更简单。”

久里的话语里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主人公对于常规感情态度及道德评判观点的疏离。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久里的讲述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非其本人的声音，在其评论言语里包含着各种视角的切换，甚至是与陌生视角的同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柯韦什·久里不像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人物形象，而更像是一个变动不拘的视角，承担着媒介的作用：主体实际上消融在一片陌生的声音中了。小说要传达给我们的寓意是：不仅命运无法选择，个体性也是无法选择的。

与角度切换密切相关的是人物的身份问题。《无命运的人生》与其说是一部奥斯威辛小说，毋宁说是一部无命运的小说。柯韦什·久里无命运的人生在家的时候就开始了：一方面，他不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家庭中的亲人，另一方面，在犹太人身份的问题上他也被剥夺了决定权。后来混杂在集中营的囚徒群体中，柯韦什·久里的犹太人及匈牙利人身份仍旧是个问题。像父兄一样关照着久里、帮助他在集中营里生存下来的柠檬邦迪执著于自己的匈牙利人身份，并以此作为自己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而久里却不能够从匈牙利人的身份中获取力量。但那些同样来自匈牙利、总在做着买卖、遵奉犹太教教义的‘芬兰人’(注 对集中营里的正统犹太教徒的戏称）也让他感到陌生，这些人则对他的犹太人身份表示了质疑。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医院里，语言与命运上的相同显现出相对性，身份的交叉、沟通的无法实现成为了突出的问题。柯韦什·久里感到，此时他不是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是因匈牙利人的身份而受到了歧视，但他对于这种身份的排斥却又只

能通过“杀人犯们的语言”进行传达。在自我身份确认的问题上，有一点值得一提，在小说中，读者从未“听到”过柯韦什 · 久里亲口说出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每次都只出现在引语里：一次是他爸爸与他亲妈通电话时提到了他的名字，还有一次是他在工作通知书上读到了自己的名字，第三次是在集中营的医院里，他很困难地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又经护士用“集中营的语言”改写成了“克维什杰尔德”，至此他的名字及其中所包含的民族性已经变得不可辨认了。重返布达佩斯后，久里在与邻居们的一番谈话中指出，“犹太人”的没有命运其实并非必然：“现在我已经能够告诉她，‘犹太人’有何含义 没有任何含义,至少对于我来说,起初它并没有任何含义，直到开始走那些路为止。全都不是真的，没有别的血统，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一定的境况以及存在于其中的一定的新境况。我也从头至尾地把一个一定的命运经历了一遍。那不是我的命运，但我从头至尾地把它经历了一遍……”

《无命运的人生》采用了日记式的叙述角度，在叙述过程中大量使用了准现在时。叙述的我不是站在后来的角度阐释被叙述的我的经验，而是通过尽量地靠近并与被叙述的我同一的方法来重现当时的观点。准现在时的运用隔绝了后来的知识视野，限定了主人公的历史渐进经验，同时消除了读者预先的（准确地说是后来的）意识形态的考虑，逐步将其“领进”了奥斯威辛的机制中。凯尔泰斯本人将《无命运的人生》称作“语言批判小说”,因为它颠覆了奥斯威辛的意识形态话语。同时，作者也很清楚，语言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并不试图寻找到一种恰当的奥斯威辛情节形

式，也不企图直接为读者提供真理，而是尝试着在（语言的）运动中、形成中捕捉到一种可怕的机制，并使之为读者理解。

《无命运的人生》这部小说以其出人意料的主题和形式、不同的准则、开放性以及充满疑惧的玩笑给它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为匈牙利及欧洲历史记忆的更新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匈牙利语专家龚坤余教授、匈牙利专家郝伊纳尔 · 拉斯洛(Hajnal László)先生的指导与莫大帮助，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加尔 · 盖尔盖伊（ Gaál Gergely ）先生对我无处不在的支持与鼓励。匈牙利语是一个小语种，由于条件所限，在翻译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加之时间仓促，虽然译者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书中谬误与不妥之处仍在所难免，恳请广大的读者与匈牙利语界同行们不吝指正。

译 者

2003 年 10 月于北京

①

今天我没有上课。也就是说我去学校了，但只是请班主任允许我回家。我把我爸爸的信也交给了他，信中称“家里有事”，请老师准我的假。他问，家里到底有什么事？我告诉他说，他们召我爸爸去服劳役了；于是他不再追问下去了。

我没有回家，而是急忙朝我们家店铺的方向赶去。我爸爸说，他们在那儿等我。他还补充了一句，要我快点儿，因为可能会需要我。事实上，他是因此才给我请假的。也有可能是为了让我“在他离家之前的这最后一天能够待在他的身旁”：因为这句话他也说过，不过，的确是在另外一个时候说的。是对我妈妈说的。我记得，是在早上他给她打电话的时候。要知道，今天是星期四，在这一天，以及在星期天，严格地说，我的下午是属于我妈妈的。但我爸爸告知她：“我今天无法让久尔吉到你那里去”，这时他提出了这个理由。不过，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有点儿瞌睡，因为夜里有空袭警报，也许我记错了。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说过这句话。如果不是对我妈妈说过，那就是对别人说过。

我也和我妈妈说了几句话，但已经记不起来说的是什么了。我觉得，她生我的气了，因为当时有我爸爸在场，我被迫简慢了她：毕竟，今天我应该照顾他的心情。当我已准备好要出门时，我的后妈还同我在前厅里讲了几句私密的话。她说，在这样一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不幸的日子里，她希望“能够看到我有合适的表现”。

我不知道,对此该说些什么,后来什么也没有说。但或许她误解了我的沉默,因为她马上说道,她的这番提醒并不是要触动我敏感的神经,她知道,那也是多余的。因为她不怀疑,作为一个快十五岁的大男孩，我自己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所遭遇的沉重打击。我点了点头。我看到，对此她就已经满足了。她还朝我这个方向抬起了手臂,我已经开始害怕了,她不会是想拥抱我吧。但后来她还是没有这么做,而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声音有点发抖。我发现,她的眼睛也湿润了。真令人难堪。随后我走了。

我从学校走到了我们家的店铺。这是一个明净的、温暖的早晨,尽管现在还只是早春。我本打算将衣扣解开,但转而想到风会把外套的前襟吹得翻转过去,盖住我的黄星①,那是不符合规定的。如今在有些事情上，我得考虑得周全些了。我们的木材储藏室就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我沿着陡峭的楼梯走到了下面的一片昏暗中。我爸爸和我后妈都在办公室里:一个狭小的、鸟笼般的玻璃亭子间,就在楼梯旁边,里面的照明和鱼缸里的一样。苏多先生也和他们在一起。我起初认识他时,他还是我们家雇佣的会计,也是我们另外那个露天仓库的保管员，现在那个仓库已经被他买了过去。至少我们这么说。因为苏多先生在种族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不戴黄星,而所有这一切,据我所知,实际上只是一种商业把戏,目的是让他看守住我们在那儿的财产,此外,在此期间我们也

① 1944年4月5日起,所有年满6岁的匈牙利犹太人都必须在上衣左前胸佩戴鲜黄色的六角星。

不必完全失去收入。

但我同他打招呼的方式还是和以前有了一点儿不同，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地位毕竟是比我们的高了我爸爸他们和他在一起时也比过去注意了。然而，他却更加固执地继续称呼我爸爸为“老爷”,称呼我后妈为“亲爱的、尊贵的夫人”,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也从不忘记吻她的手。他招呼我时也是用过去那种半开玩笑的声音。我的黄星他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之后我就待在了原地,站在门边,而他们则接着忙他们的。我发现,我的到来正好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一开始，我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我把眼睛闭了一会儿,由于上面的阳光的缘故,我这会儿仍有点儿目眩。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我爸爸已说了一番话,在苏多先生的棕色圆脸上(他留着窄细的髭须,两颗大白门牙中间有一条缝隙)布满闪动的橘红色光圈，好似溃烂的脓包。下面的一句话又是我爸爸说的,他的话里提到了什么“货物”,它“最好”由苏多先生“马上带走”。苏多先生没有表示异议；于是我爸爸就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来一个包裹,是用绢纸包着的,还扎上了细绳。这会儿我才看清那到底是什么货物了,因为从它扁平的形状上,我立刻辨认了出来：里面包的是一只盒子。那盒子里装着我们家的首饰细软之类的东西。我甚至还认为，他们就是由于我的缘故才把它称为“货物”的，以免我认出来了。苏多先生立即把它放进公文包里。然而,随后在他们之间却发生了一点儿小小的争论苏多先生取出了他的钢笔,无论如何要给我爸爸开一张“货物”的“收条”。他坚持了许久,尽管我爸爸已经告诉他说“不要这样小孩子气了。”还

说“: 你我之间不需要这个。”我发现 ,此话颇令苏多先生受用。他马上说道“: 我也知道您信任我 ,老爷 ;但在实际生活中 ,一切都有自己的秩序和规矩。”他想让我后妈也帮他的忙“: 不是吗 ,尊贵的夫人 ?”而她 ,嘴角带着一丝疲惫的微笑 ,只说了句 这个问题她完全交给他们男人们去处理了。

这事儿已经让我有点厌烦了，但最终他还是把钢笔收了起来。此时他们又开始絮叨起这儿的这个仓库的事儿：该怎么处理这里的许多木板。我听到我爸爸说 ,得抓紧 ,以防政府‘ 万一把商店占了去 ”，他请苏多先生利用他在生意上的经验和专业方面的知识，在此事上多关照我的后妈。苏多先生立即转身对我的后妈说：“ 这是不言而喻的 ,尊贵的夫人。我们终归也是会经常联系的 ,因为结算的缘故。 ” 我想，他指的是他那儿的那个仓库。过了许久，他终于开始告别了。他脸色沉郁地、长久地摇动着我父亲的手。尽管如此 ,他认为“ 此时已不容我们讲太多的话了 ”,因此他只有一句临别的话语要对我爸爸说“: 早日再见 ,老爷。”我父亲带着一丝苦笑答道“: 但愿如此 ,苏多先生。”与此同时 ,我后妈打开了手袋 ,从里面取出一块手帕 ,径直举到了眼前。她的喉咙里发出了某种特别的声音。周围一片沉静，场面十分难堪，因而我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做些什么。但是这件事来得太突然，我脑子里一下子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我看到，苏多先生也很窘困。“ 尊贵的夫人 ,”他说道“ 不要这样 ,真的不要这样。”他看上去有点儿受到了惊吓。他弯下腰来，嘴几乎快要凑到我继母的手上去完成一贯的吻手礼了。之后 ,他连忙朝门口走去 ,我几乎来不及从他的面前闪

开身去。他甚至忘了和我告别。他出去后，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还听得到他沉重的脚步落在木楼梯上的声音。

一阵缄默过后，我爸爸说“：我们又轻松一些了。”我后妈听到这话后，用仍有些沙哑的嗓音问我爸爸，刚才是不是应该收下苏多先生的那个收条才好。但我爸爸回答说，这样的一个收条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而且藏着它甚至比藏着盒子本身还要危险。他对她解释说“：我们得‘孤注一掷’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完全信任苏多先生，因为除此之外，我们目前别无选择。”听到这里，我后妈不作声了，但随后她指出，我爸爸或许是对的，可她还是感觉到‘手里有一张收条’会保险一些。然而，她却解释不清楚这是为什么。这时我父亲催促说，赶快着手做该做的工作吧！因为，他说，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想把账本转交给她，这样他不在时她也能了解情况，也别让生意因他在劳动营里而停下来。其间他还同我讲了几句话。他问我在学校里请假顺利不顺利等等。最后他让我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待着，等着他和我后妈把账本的事情处理完。

只是这一等就是很长时间。我耐着性子待了一会儿，努力去想我爸爸，准确地说，是想他明天就要走了，他走后我也许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他了；但一段时间过后这种想法令我感到疲倦了。这时，由于不能为爸爸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我开始觉得无聊了。老是坐着也让我感到很累，为了有点儿变化，我站起来，去水管那儿喝了口水。他们没说什么。后来我还走到后面的木板中间去小便。回来之后，我在瓷砖水池的生了锈的水龙头下洗了洗手，然后从书

包里取出我的点心，把它吃了，最后我又去水管那儿喝了一次水。他们没说什么。我坐回到原来的位子上。然后我感到无聊得要命,就这样还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们走到街道上面的时候，中午也已经过去了。我又感到了目眩，这回是由于光亮的缘故。我父亲摆弄那两把灰色的铁锁好半天,我几乎觉得他是故意的。之后他把钥匙交给了我后妈,因为他已经再也用不着它们了。我听到他这么说。我后妈打开了手袋,我怕她又要取手帕,但她只是把钥匙放了进去。我们赶忙上路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要回家,但不对,我们还得先去买东西。我后妈把我爸爸在劳动营里所需要的各种东西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其中一部分东西昨天她已经采购好了。剩下的就得我们现在去买。和他们一块儿走着,像这样三个人在一起,三个人都戴着黄星,让我感到有点儿别扭。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的话,倒是有点好玩儿。然而,与他们同行,我几乎发窘了。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但后来我就不在意它了。所有的商店里都挤满了人，只有我们买背包的那家例外：这里只有我们几个顾客。空气中充满了防水帆布刺鼻的味道。店主是一个皮肤变黄了的小老头，却有着发亮的假牙,一只胳膊上还戴着袖套,他肥胖的妻子对我们也很热情。他们将各种各样的商品堆放在我们面前的柜台上。我注意到，店主人称呼老妇人为‘ 老婆 ”,而且总是让她去取货。我知道这家店,因为它离我们家很近，但这里面我还从未来过。它实际上是一个体育用品商店,但也卖别的东西。最近他们这儿还卖自制的黄星,因为黄色的布料现在自然是很紧缺的。（我们需要的，我后妈已经

及时地备好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他们的发明是把布料贴在硬纸板上,这样自然就漂亮多了,而且星星的角也不会像有些人自家做的那样裁剪得很可笑。我发现，他们自己的胸前也佩戴着自家的产品，看上去他们就像是为了促销才佩戴似的。

老妇人已经把货拿来了。此前,店主人曾问道:他能否打听一下，我们是不是在采购去劳动营所需要的东西？我后妈说是的。老头儿难过地点了点头。他还举起了长了老年斑的双手，做了一个表示遗憾的动作后，又让它们无力地落回到了自己面前的柜台上。这时我后妈对他说,我们需要一只背包,问他有没有。老头儿犹豫了一下,随后说道“:如果你们要的话,那是有的。”然后他对妻子说“:老婆,给先生从仓库里取一只来!”背包正好合适。店主又让他妻子去取了另外几样东西来，他认为这些都是“ 我爸爸要去的那个地方不能不备的 ”。他在同我们讲话时始终很注意分寸、很体谅,并且尽可能地避免使用‘ 劳役 ’这个词。他拿给我们看的全都是用得着的东西,可以密闭的饭盒、刀鞘里带有好多种工具的小刀、挎包等等,据他讲,这些都是人们‘ 在类似情况下 ’一般要从他这里购买的。我后妈给我爸爸买下了那把小刀。我也很喜欢它。我们把一切都采购完毕之后，店主人朝妻子喊了声：“ 结账!”老妇人闻声将裹在黑衣里的、软绵绵的身体艰难地塞进了收款机和包了棉垫的扶手椅中间。店主人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在那儿他说道“:希望本店下次仍有此幸运,”然后他凑到我爸爸耳边，轻声地补充了一句：“ 是我们，先生，是您和我所想的那种幸运。”

现在我们终于该回家了。我们住在一幢大公寓楼里，离广场很近,附近还有有轨电车的车站。我们已经上了楼,这时我后妈又忽然想起来：她忘了用面包票买面包。我得再去买面包。排了一会儿队后,我才进到了商店里。我先得到金发的、大胸脯的老板娘那儿去 她把面包票剪下来,然后再去面包师傅那儿,他会称面包给我。我向他打招呼,他没答理,因为附近这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不喜欢犹太人。因此他给我扔过来的面包也少了点儿分量。然而,我还听说,这样他这儿就能从定量中剩下来不少面包。从他那生气的眼神和熟练的动作中,我一下子理解了他思维的合理性,即他不能够喜欢犹太人的原因 因为那样的话,他会有一种欺骗了他们的、不舒服的感觉。这样他则是在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他的行动有了一种指导思想,而我也洞悉,这当然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从面包店里出来,我急匆匆往家赶,因为我已经饿坏了。一路上我只停下来和安娜玛利亚说过一句话 当时我正要上楼,而她正好蹦蹦跳跳地从楼梯上下来。她住在我们那一层的史泰依奈家里，最近我们每晚都要和史泰依奈一家人在老弗莱施曼家聚会。以前我们不大注意到邻居 现在知道了,原来我们的种族相同,它需要大家每晚小聚一番，就共同的前景交换交换看法。我们两人在这一段时间里则聊点儿别的事情,这样一来我得知,史泰依奈夫妇实际上只是她的叔叔和婶婶 她的父母离婚了,由于他们至今还没有就她的问题达成一致,因此决定干脆让她待在这儿,不跟着他们中的任何一方。此前她住在教养院里，也和我那时的原因一样。她大约也是十四岁。脖子长长的。在她的黄星下面，胸脯已经开

始隆起。她也是被他们派去买面包的。她还问我下午想不想打牌,四个人一起打,有她,还有那一对姐妹。她们俩住在我们楼上。安娜玛利亚和她们是朋友,我只是见过她们几面,在走廊上,以及在防空洞里。那个小一点儿的看上去只有十一二岁的模样。大的听安娜玛利亚说和她同岁。有时我正好在面朝院子的房间里，能够看到她急匆匆地出门或回家的样子，她在对面的走廊上行走。有几次,我还在门洞里遇见过她。我想,现在我就可以近距离地认识她了 我倒是希望如此。但在同一时刻,我又想起了我爸爸,便对女孩说 今天不行,因为他们要召我爸爸走了。这时她也马上想了起来,在家听她叔叔说起过我爸爸的事情。她说了句“当然。”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问“那明天呢 ?”但我对她说“还是后天吧。”并且又马上补充道“或许吧。”

我回到家时，我爸爸和后妈已经在桌子旁坐好了。我后妈一边忙着给我摆盘子,一边问我饿不饿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饿极了。”因为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她便给我盛了满满一盘,但她给自己的盘子里却几乎没盛什么。这还不是我，而是我爸爸发现的,他问她 为什么 她的回答是 此刻她什么都吃不下去,这时我也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的确，我爸爸说她这样不对。他的理由是她不应该不顾惜自己,尤其是在这会儿,正是最需要她的力量和坚持的时候。我后妈没有回答,但我听到了一点声音,我抬眼一看，明白了这是什么声音：是她在哭。又是极令人难受的场面，我尽量只盯着自己的盘子看。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我爸爸伸手去抓她手的动作。一分钟过后,我听到他们十分沉静,当我又小心翼翼

地朝他们瞥去时,他们正手握着手坐着,深深地凝望着对方,就像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那样。我从来就不喜欢这种场面，现在它也让我感到不舒服。然而我也想到这事从根本上来说是很自然的。可我还是不喜欢。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当他们重新开始谈话时，我马上感觉轻松多了。他们又提到了苏多先生，当然还有那只盒子和我们另外一个仓库 我听到,让我爸爸感到放心的是,至少这些东西,他说,现在都在‘ 可靠的人的手里 ”。我后妈也表示和他一样感到安心,但她又提了一句‘ 保障 ’的事,说那毕竟只是些口头承诺,问题是,仅有这种东西到底够不够。我爸爸耸了耸肩,回答道,不单是在生意场上,就是在‘ 生活的其他领域 ’也都不再会有任何保障了。我后妈立即以一声颤抖的叹息附和了他的说法：她已经后悔提起这件事来了,她请我爸爸别这么说,也不要这样想了。但他又想到,我后妈如何担负得起肩上的这副重担,在这种艰难的时期,没有他在,就她一个人。但我后妈回答说 她不会是一个人的，因为有我站在她的身边。她接着说，我们俩会相互照应，直到我爸爸重新回到我们的中间来。她还转向我，把头微微偏向一边问道：是不是？她微笑着，但她的嘴唇却在颤抖。我对她说：是的。我爸爸也看着我,眼神很温柔。这让我受了感动,我想再为他做点儿什么,于是我推开了面前的盘子。他发现了,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说“: 我没有胃口。”我看到,这很令他受用 :他从后到前地摸了一遍我的头。这种触摸使我的嗓子今天头一回像是被某种东西堵住了 ;但那不是哭泣,而是某种类似于反胃的感觉。我希望我爸爸已经不在这里了。这种想法让人很难受，但我是如此清

楚地感觉到，关于他我想不到任何别的什么了，那一刻我窘极了。我本来马上就能哭出来的,但没来得及,因为客人们来了。

我后妈刚才提到过他们。“只有几个最亲近的家庭成员要来,”她说。看到我爸爸的某个动作后,她又补充道“:他们想和你告别。这很自然!”门铃已经响了,来的是我后妈的姐姐和她的妈妈。很快我爸爸的父母、我爷爷和我奶奶也到了。我们赶忙立刻让我奶奶在沙发上坐下来,因为她的身体情况是,即便透过放大镜一样厚的眼镜片也几乎看不见东西，而且她耳聋的程度也至少与此相当。然而,她很想参与周围发生的事情,想帮个忙什么的。这种时候围着她就会有不少的工作，因为一方面得不断地对着她的耳朵大喊,事情进行到哪儿了,另外一方面还得巧妙地阻止她掺和进去,因为她的帮忙只会添乱。

我后妈的妈妈到了,她戴着一顶圆筒状的、好斗外形的有檐帽子,前面还横插着一根羽毛。然而她很快就把它脱了下来,这时一下子露出了她那漂亮的、稀疏的、雪白的头发和由细小发绺盘成的、衰微的发髻。她有着狭窄的黄脸和两只深色的大眼睛,从脖子上垂荡下来两片萎蔫的肉皮,样子很像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经过改良的猎狗。她的头有些不住地抖动。他们把为我爸爸打背包的任务交给了她，因为她对此类工作十分在行。我后妈交给她一张清单,她当即便干了起来。

至于我后妈的姐姐，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派不上用场了。她比我后妈年纪大得多,看起来仿佛不是她的姐姐,小不点的个儿,圆滚滚的身体，面孔与一个表情惊奇的木偶的脸一样。她不停地絮

叨着,还哭了,并拥抱了所有的人。我也是好不容易才从她那软绵绵的、香粉味道很浓的胸脯中挣脱了出来。当她坐下来的时候,身上所有的肉都堆落到了她短短的大腿上。别忘了还有我爷爷：他一直待在那儿、站在我奶奶的沙发旁,耐心地、毫无表情地听着她的抱怨。她先是为我爸爸的事儿哭了一阵子；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她自己的各种麻烦开始让她忘掉了这个烦恼。她说她头疼,抱怨着由高血压引起的耳鸣。我爷爷早已习惯了,并不答理她,但他也始终没离开她的身边。我一直没听到他说一句话，但每当我的目光扫到那个方向时,我总能看到他在那儿,总在那个角落里,随着下午的逝去,那里渐渐变得昏暗了,只有他光秃秃的额头上和高高隆起的鹰钩鼻子上还有些许暗黄的光线，他的眼窝和脸的下半部分则已经陷入了阴影里。只看得见他的小眼睛在一闪一闪，他还在注意着房间里的一举一动，旁人察觉不到这一点。

除此之外，我后妈的一个表姐也来了，是和她丈夫一起来的。我叫他威利叔叔,因为他就叫这个名字。他走路稍有点儿跛,所以他的一只脚上穿着厚底子的鞋，然而他也因此有了可以不去劳动营的特权。他的头呈梨子形状,头顶宽阔、隆突、光秃秃的,但脸颊和下巴的部位却比较窄。他的意见在家族里很受尊重，因为在开办赌马事务所之前，他还从事过新闻工作。现在他也立刻就有一些有意思的消息,想要告诉大家,他称这些消息、是从“内部渠道”获得的,具有“绝对的可信度”。他坐到了一把扶手椅上,把他那只坏腿僵直地伸向前方,并搓着双手告诉我们大伙儿,很快“我们的形势就要发生决定性的转变了”,因为“在德国人和盟军之间,通

过中立方的斡旋”已经开始就我们的事情举行“秘密的磋商”。“德国人,”威利叔叔解释说,“如今也看到了他们在前线的无望处境。”他的看法是,我们这些“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几乎正中他们下怀,他们正想“利用我们从盟军那儿赚得一些利益”,而盟军自然是会为我们尽最大努力的;在这里,他提到了一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因素”,这还是他从自己的记者生涯中知道的,他称之为“国际舆论”;他说,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使这一点“遭到了质疑”。他接着说,谈判自然是艰苦的,这也正好可以解释对我们制定的种种措施所带来的暂时的压力,但这些都只是“大较量”的自然的结果,“我们在其中实际上充当了巨大的国际讹诈之工具”然而他,一个十分清楚这期间“在幕后所发生的事情”的人,仅仅将这一切看作是“一种虚张声势”,其目的在于得到一个更高的价码,他请我们稍稍再耐心一点儿,等待“事态的发展”。我爸爸就问他,明天能不能盼到结果,或者能不能把他的被征召也看作“仅仅是一种虚张声势”,甚或明天他根本就不必去劳动营了。听到我爸爸的话,他有几分慌乱地回答:“不,当然不。”然而他又说,他完全相信,我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们现在已是在子夜了,”他如是说,同时愈发不停地搓着手。他又补充了一句:“要是我在随便哪一桩赌注中能像这事儿上拿得这么准的话,那我现在就不是一个穷鬼喽!”他还想继续说下去,但我后妈和她的妈妈正好把背包装好了,我爸爸从他坐的地方站了起来,去试背他的背包了。

最后来的是我后妈的长兄,劳约什叔叔。他在我们家族里占着某种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我也说不大清楚那是什么地位。他

立刻就要求同我爸爸单独谈话。我注意到，这令我爸爸有些光火，尽管我爸爸十分注意分寸，但还是要求他快点儿结束。而后他又冷不防抓住了我，说是想和我‘ 谈一谈 ”。他把我拉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让我和他面对面站在一个柜子旁边。他一上来就说，正如我所知道的，我爸爸明天‘ 就要离开我们了 ”。我说，我知道。于是他想听我说我是否会想念他。他的问题有些令我恼火，我回答说“: 当然会想念他的。’由于觉得这似乎还不够，我立刻又加上了一句“: 非常。’听到我的话后，他长久地点着头，脸上带着烦恼的表情。

随后我却从他那里听到了几件令人惊奇的有趣的事情。例如，我生命中的某一个时期，即他称之为‘ 无忧无虑的、幸福的童年时代 ’的那个时期，在今天这个不幸的日子里，对于我来说，已经宣告结束了。他说，我肯定还没有这样想过这个问题。我承认：没有。但他接着说，他的话一定也还是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惊奇。我又答道 没有。这时他告诉我，我爸爸离开后，我后妈将失去依靠，尽管家族‘ 会照应我们的 ”，然而，今后她主要的依靠将会是我。他说，没错，我得早早地明白‘ 什么是烦恼，什么是放弃 ’了，因为我今后的命运显然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好了。关于这一点他并不想对我隐瞒，因为他是在用‘ 成人的方式 ’和我谈话。“ 现在，”他这样说道“; 你也是犹太人共同的命运的一部分了。’然后他又详说了这一点，他提起，这个命运是‘ 几千年来不间断的被驱逐 ”，然而这也是犹太人 “ 应该顺从地、以牺牲者的忍耐精神来接受的 ”，因为那是上帝对于他们过去罪行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他们

只能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宽恕,而他则期望,我们在此之前,在这艰难的处境中,我们大家都能够站稳脚跟,站在那个他为我们指定的地方“量力而行”。就我来说,我从他那儿得知,今后我应该站在一家之主的位子上。他问我是否感觉到了这种力量和有否心理准备。尽管我不大明白他的思路,尤其是他关于犹太人、关于他们的罪行以及他们的上帝所讲的那些话，但我还是受到了感染。于是我便说“:是的。”他看起来很满意。“很好,”他说。他一向都认为我是一个有头脑的孩子,具有‘深沉的情感和严肃的责任心”,正如他所说的,在许多的打击中,这给他带来了一丝安慰。现在他用指背覆盖着一团汗毛、指肚汗津津的手指捏住我的下巴,把我的脸抬了起来,并用很轻的、有些发抖的声音说道“:你爸爸明天就要出远门了。你为他祈祷过了吗？”他的目光里有着某种严厉的东西,或许是它唤醒了我内心对于爸爸的一种负疚感,因为我自己确实没有想到这一点。而现在,由于被它唤醒了,我忽然感觉到它是一个负担,就像欠着的一笔债,为了摆脱掉它,我向他承认“:没有。”“跟我来,”他说。

我跟着他走到面朝院子的那个房间里。我们在这里的几件破旧的废弃家具中间做了祷告。劳约什叔叔先拿出一顶黑色的丝光小圆帽戴在头上，盖住了稀疏的灰色头发下面已经有些光秃的部位。我也得从门厅里取来我的帽子。然后他从外套的内袋里拿出一本黑色包皮、红色套边的书来，又从胸前口袋里取出了他的眼镜。然后他开始诵读祷文,我则跟在他后面念,他读多少、我就念多少。一开始进行得很好,但很快我就对这项工作感到厌倦了,而

且让我烦恼的是,我们对上帝所说的那些话,我一点也听不懂,因为我们是用希伯来语向他祈祷的，而我却不懂这种语言。这样一来,为了能跟得上,我只得不停地留意劳约什叔叔的嘴形,因此最终实际上只有这两片湿润而肉感的嘴唇上下牵动的景象以及一种外语的毫无意义的杂音（我们自己喃喃念出来的）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噢,对了,还有一幅画面,那是我越过劳约什叔叔的肩膀,透过窗户看到的：两姐妹中的那个大一点儿的正好在我们楼上对面的悬廊上朝着她们家的方向急匆匆走过去了。我觉得我的念经也有些被扰乱了。但祈祷结束时,劳约什叔叔看上去很满意,他脸上的表情甚至让我也觉得，终归我们还是为我爸爸做了些什么。果真,它比刚才那种沉重的、欠债般的感觉还是要好一些。

我们回到了临街的屋子里。夜幕降临了。我们把防空纸①糊的窗户关住,把蓝色的、潮湿的夜晚关在了外面。房间就变得很狭小了。嘈杂声已使我疲倦。香烟的雾气也开始使我的眼睛感到有点刺痛。我打了不少哈欠。我后妈的妈妈把桌子铺好了。晚饭是她放在一个大手提包里带来的。她还从黑市上搞到了一些肉。这是刚才她一进门时就说过的。我爸爸当时也从他的皮夹子里取出来钱付给她了。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已在晚饭桌前就座的时候，史泰依奈和弗莱施曼大叔突然来了。他们也想和我爸爸告别。史泰依奈大叔说的头一句话就是"：诸位不必客气。"他说"：我是史泰依奈,请坐着不要起身。"他脚上现在也穿着那双破旧的拖鞋,敞

①一种为遮挡夜间灯光以免遭敌机轰炸而用的黑色或蓝色的纸。

开的马甲里露出了圆滚滚的肚子,嘴上也叼着他那永不离嘴的、味道难闻的雪茄烟头。他有一颗红色的大脑袋，孩子式的分头让他的脸看上去很是古怪。在他的身旁，弗莱施曼大叔几乎就黯然失色了,因为后者是一个小个子,外表十分考究,白色的头发,皮肤有些发灰,戴着猫头鹰式的眼镜,脸上的表情总有些忧心忡忡的。他默不作声地在史泰依奈大叔旁边不住地欠着身子，并揉搓着双手，好像是在为自己开脱罪责,又仿佛是在说,这全是由于史泰依奈大叔的缘故。然而对这一点我却不敢肯定。两个老头儿老是在一起,影形不离,尽管他们之间永远都有争论,因为在任何问题上他们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分别和我爸爸握了手。史泰依奈大叔还拍了拍他的后背。他称我爸爸为‘老男孩”,还搬出了他的那句老笑话“:低下头来、永远不要丢掉绝望。’他还说,弗莱施曼大叔也不住地点着头，他们今后仍会继续照应我和“年轻的夫人”（他这么称呼我的后妈）。他的小眼睛眨巴了几下。然后他把我爸爸拉到他的肚子跟前,拥抱了他。他们走后,一切都淹没在餐具的叮叮当当响声、嘈嘈的谈话声、饭菜的热气和浓重的香烟雾气中了。呈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个别的脸和个别的片段，彼此毫无关联，犹如一个个断裂的部分，仿佛从我周围的雾气之中分离出来似的。除了我后妈的妈妈那不住抖动的、黄色的、骨瘦如柴的头,以及她仔细摆弄所有盘子的样子外，还有劳约什叔叔表示拒绝而举起的两只巴掌,他不要肉,因为那是猪肉,是教规禁食的;我后妈的姐姐那圆鼓鼓的腮帮子、活动的下颌和带着泪水的眼睛;然后是威利叔叔的光头伸到了灯光下,呈现着粉红色,我又听到了他鼓舞士气的

一些新的只言片语；我还记得一片静默中劳约什叔叔庄重的话语，他请求上帝的帮助，以使“全家人不久能祥和地、充满爱心地、健康地重聚于餐桌前”。我很少去看我爸爸，至于我后妈，我也只记得大家对她照料得极为周到，甚至超过了对我爸爸，还有一次她说她头疼，立刻就有几个人围住她，问她要不要吃一片药，或敷一下头，但她全都拒绝了。我还得不时地去注意我奶奶，她老是到处走动，每次我都得重新把她领回到沙发那儿去，还得注意她许多的抱怨以及她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在那厚厚的、被泪水覆盖住的、雾气蒙蒙的老花镜后面，它们看上去就像两只特别的、分泌着汗水的昆虫。后来，所有的人都从桌边站了起来。这时开始了最后的告别。我爷爷和我奶奶是单独离开的，比我后妈家的人要早一些。这一整晚给我留下最特别印象的恐怕就是我爷爷的唯一一个引人注意的举动：他把他那尖尖的、小鸟一样的脑袋在一瞬间，但完全是以一种狂野的、近乎荒唐的方式，往我爸爸的外套上的胸前贴了一贴。他正痉挛的身体也抽搐了一下。随后他急忙朝外赶去，胳膊上挽着我的奶奶。所有的人都给他们让了道。之后我也被许多人拥抱过了，脸上还留下了许多张嘴贴压过的感觉。终于，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因为所有的人都走了。

这时，我也和我爸爸告了别。或者说是他和我告了别。确切情况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我已记不大清楚了：我爸爸好像是送客人们出去了，因为有一段时间只剩下我一个人待在堆满了残羹剩饭的桌子旁边，我爸爸回来的时候，我才突然惊醒了。他一个人。他想和我告别。“明天一大早就没有时间了，”他说。他也给

我讲了一通关于我的责任和我的长大成人之类的话，这些话今天下午我已经听劳约什叔叔讲过一遍了，只不过他的话里没有上帝，没有那些漂亮的词语,而且要简短得多。他还提到了我妈妈 ;他认为，她现在可能会设法把我“ 从家里引诱到她身边去 ”。我看到，这个想法令他十分担忧。因为他们两人曾经为了争夺我而相互较量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法院最终作出了对我爸爸有利的判决 ;这么一来,他不能仅仅因为不利的处境而失去对我的权利,我认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并没有提及法律，而是说让我自己拿主意。他说到了我后妈和我妈妈之间的差别：一个为我“ 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 ”,而另一个却‘ 抛弃 ’了我。我开始注意他的话,因为有关这一部分内容,我从我妈妈那里了解到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她认为错误在于我爸爸。因此她才不得已给自己重找了一个丈夫，一个叫作什么狄尼(实际上是 ;德内什)的叔叔,他上周刚走,也是去了劳动营。但事实上,我从未能了解到准确的情况,我爸爸现在也是马上又把话题转回到了我后妈的身上,他提到 ;我从教养院里出来应该感谢她,我的位置是‘ 在家里,在她的身边 ’。关于她,我爸爸还说了很长时间,现在我已经猜到了,他说这些话时我后妈为什么没有在场：她一定会感到窘促的。而我对此却已经有些厌倦了。我已经记不得，当我爸爸希望听到我的承诺时，我都说了些什么。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我却忽然发现自己在他的臂膀之间了，在他说过那番话后,他的拥抱令我感到很突然,因为我毫无思想准备。我不知道,我的眼泪是因此而流下来的,还是仅仅由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或许是因为自从我后妈最初的、早上的提醒以来,我

一直在作着准备,在此刻它是一定要流下来的!但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这事已发生了,毕竟是好的,而且我感觉到,我爸爸能够看到这一点，心里也很受用。然后他就让我去睡觉了。我已经累极了。但我想，至少我们毕竟是用一个美好的一天的记忆送可怜的人去劳动营的。

②

我们送走我爸爸已经有两个月了。夏天来了。学校早在春天就放了假。他们宣称 打仗了。飞机经常来轰炸城市，对犹太人也制定了新的法律。我也已经被召去工作两个星期了。他们是用正式文件通知我的：“你获得了长期的工作岗位。”收件人写的是“柯韦什·久尔吉受训青年辅工”，从这一点上，我一眼就看得出，此事是童子军操作的。况且我也听说了，如今工厂一类的地方开始让那些由于年龄的原因还不能被算作具有完全劳动力价值的人去工作，比方说像我这种人。和我一起打工的大约还有十八个男孩，也都是由于类似的原因，都在十五岁左右。工作地点在切佩尔岛上，在一家名为“壳牌炼油厂”的股份有限公司里。这样一来，我实际上还获得了一种特权：本来戴着黄星的人是禁止出城的，而我却得到了正规的、盖有军工厂司令印章的许可证，证上写着：“我可以通过切佩尔海关”。

工作本身其实并不算很累，像这样和男孩们一起干活还挺好玩儿的 我们给人当帮手，干的是泥水活儿。由于油库成了轰炸的牺牲品，我们得赶紧挽回飞机所造成的损失。管我们的泥瓦匠领班对我们也相当不错 周末还给我们结算工钱，就像对他的正常工人一样。但令我后妈最高兴的是那张证件，因为在那之前，每次只要我一出门，她总是极为担心，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我该如何证明自己呀。而现在则没有什么可以让她感到不安的了。因为这张证

件证明，我不是仅为自己而活着的，而是在工厂里创造着军需利润，这自然就完全是另外一种评价了。家族的看法也是这样的。只是我后妈的姐姐有些埋怨，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得从事体力劳动了，她几乎是含着泪水地问我：难道我上中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对她说，我认为这只会对健康有好处。威利叔叔也立即表示赞同我的观点,劳约什叔叔也提醒说:我们应该接受上帝为我们作出的安排。听到这话后，她不吭声了。而后劳约什叔叔还把我叫到了一旁,和我讲了几句严肃的话:他提醒我不要忘记,在工作场所我不仅仅代表我个人,还代表了“整个犹太人的集体”,因此为了他们,我也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人家会从这方面对所有的犹太人下评语的。这一点我还真是没有想到。但我明白，他的话当然是对的。

我爸爸从劳动营里寄来的信也都准时地收到了:感谢上帝,他身体健康,干活儿也不成问题,他写道,对待他们的方式倒是人道的。家族对这些信的内容也感到很满意。劳约什叔叔的看法是：上帝到目前为止是和我爸爸在一起的，他提醒大家要每天作祷告，以便上帝今后能够继续照应我爸爸，因为他拥有主宰我们所有人之生死的大权。威利叔叔则鼓舞大家说：我们现在只是需要捱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性的时期”,因为,照他的说法,盟军的登陆已经“最终决定了德国人的命运”。

到目前为止，我和我后妈之间也未曾发生过任何意见的分歧。而她呢,正好相反,已被迫变得懒惰了:他们作出了规定,商店得关门，因为血统不纯正的人不能从事贸易活动。我爸爸把宝押在苏

多先生身上,看来是幸运地押对了,这样他每周都忠实地把我们托他管的那个仓库的利润中属于我后妈的一部分给我们送来，就像他当初对我爸爸所承诺的一样。上一次他也准时来了，把算给我们的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放在桌子上。他吻了吻我后妈的手，对我也说了几句友好的话。他还和往常一样详细询问了“老爷”的情况。正当他准备告别时，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包裹。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儿窘“但愿,尊贵的夫人,”他说道;“这包东西家里能用得上。”包裹里装的是猪油、糖之类的东西。我怀疑,他是从黑市上弄来的,或许因为他也读到了说是今后在食品供应方面要减少给犹太人的定量的那个规定。我后妈一开始想推让,怎奈苏多先生一再坚持,当然,她终究也是不能够拒绝别人的细心周到的帮助的。当只剩下我们自己的时候，她问我是否也认为她接受下来是对的。我认为接受下来是对的，因为她不能以拒绝去伤害苏多先生：毕竟他是一番好意。她也是这个观点，她还说,她认为我爸爸也会赞同她的做法的。的确,我想也应该是这样的。况且，她对此总是比我更清楚。

每周我去看望我妈妈两次,在属于她的下午,与正常的时候一样。她的麻烦就比较多了。正如我爸爸事先所预言的那样，真的，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我的位置是在我后妈身边的事实。她说，我是‘属于’她——我的亲妈的。但据我所知，法院把我判给我爸爸,这样他的决定才应该是有效的。然而,我妈妈在这个星期天也不停地追问我,我想要怎样生活,因为她认为只有我的意愿才是唯一重要的,还问我,是否爱她。我对她说 我当然爱她 !但我妈妈

解释说,爱意味着‘我们执著地忠于某个人”,而她看到的却是,我执著地忠于我的后妈。我试图使她理解,她看错了,因为终究不是我不愿执著地忠于她。她也知道这是我爸爸的决定，但她却回答说,这是关于我和我的生活的大事,它应该由我自己来作决定。她还说,爱‘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来证明的”。从她那里离开的时候,我心事重重 我当然不能够让她真的以为我不爱她,但另一方面,她所说的关于我的意愿的重要性的话,以及我应该对自己的事情作决定的话，我也不能太当真。毕竟，这是他们之间的争论。让我对此作出评判是一件很为难的事。况且，我不能对不起我爸爸,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可怜的人还在劳动营里。我上了有轨电车后,心里还是感到很不舒服,因为我当然执著地忠于我的妈妈,今天我也没能为她做些什么，这当然让我觉得难受。

也许是由于这种难受的感觉，我没有急于和我妈妈告别。反倒是她在催促我 时间不早了—— 戴着黄星的人只能在晚上八点以前出现在大街上。但我向她解释说,我现在已有证件,可以不必那么严格地对待所有的规定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上到有轨电车最后一节车厢最末尾的露天平台上，规规矩矩地遵守了这方面的规定。我回到家的时候大约是八点钟,尽管是夏日的夜晚,天还没黑,但有些人家已经开始关上黑色和蓝色的窗户了。我后妈已经等得心焦了，但那也只是出于习惯,因为毕竟我是带着证件的。和往常一样,夜晚我们是在弗莱施曼大叔家度过的。两个老头儿都很好,依旧总是争论不休,但对于我去工作的事,他们也一致表示赞同,他们自然也是因为那证

件。由于激动，他们甚至还争了起来。因为我和我后妈对切佩尔那一带不熟，因此头一回去之前我们向他们问了个路。老弗莱施曼建议我坐郊区有轨电车，而史泰依奈大叔却认为我应该坐公共汽车,因为公共汽车正好在油库旁边有一个站头,如果坐郊区有轨电车的话,下了车还得走一段路——事后证明的确如此。但当时我们都还无从知道,弗莱施曼大叔很有些气恼,嘟哝着说:"每次都得让你占了理儿。"最后还得靠两个胖妻子出面才解决了问题。我和安娜玛利亚为此笑了好半天。

我和她之间的关系现在变得有些特殊了。那事是在前天——星期五夜里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发生的,在防空洞里,准确地说是在通向防空洞的一条幽静的、半昏暗的地下室走廊里。一开始我只是想指给她看，从这里观察外面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但一分钟后,我们听到附近也有一颗炸弹爆炸了,这时她的整个身体开始颤抖起来。我能很清楚地感觉到,因为她在惊恐之中抓住了我 她的胳膊绕着我的脖子,她的脸埋在了我的肩上。后来我只记得,我在寻找她的嘴。一种温暖的、湿润的、粘乎乎的模糊体验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还有一种惊喜，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吻一个女孩子，而且当时我根本也没有料到它。

昨天,在楼梯间我得知,她也很吃惊。她认为,一切都是由炸弹引起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之后我们又相互吻了对方，这时我从她那里学会了,怎样让我们的舌头在此时也起到一些作用,以便使这种体验变得更加回味无穷。

今天晚上我也和她去了另外一间屋子里，去看弗莱施曼家的

金鱼。的确,我们平时也常去看金鱼。现在我们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去的。我们还使用了舌头。但很快我们就回来了，因为安娜玛利亚害怕了:大叔们可能会看到的。后来,在交谈中,我还从她那里了解到了她对我的一些有意思的想法:她说,以前她从未想到过“有朝一日我对她来说还可能意味着别的什么”,而不仅仅是“好朋友”。刚认识我那会儿，她只当我是一个平常的男孩子。后来,她向我透露说,她开始更多地留意我了,在她的内心里也对我产生了一些理解,她认为,也许这是由于在与父母亲的关系方面我们的处境相似,从我个别的话语里,她还得出了结论,我们两人在有些事情上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但除此之外当时她并没有多想什么。她沉思起来,这真奇怪,她还说:“看来,这事就应该是这样发生的。”她脸上浮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几乎是严肃的表情,我没有和她争论,不过我更同意她昨天的说法,起因是那颗炸弹。当然,或许我并不了解情况,而且我看到,她更乐意是这个样子的。后来我们很快就告别了，因为明天我还得去工作。当我和女孩握手的时候，她用指甲在我的手心里轻轻地掐了一下。我明白了,她是在暗示我们的秘密,她脸上的表情似乎也是在说:“一切都好好的。”

然而第二天她却表现得相当特别。下午下班后，我先洗漱一番,换了衬衣和鞋,还用湿梳子把头发梳理了一下。我们去了两姐妹那里——在此之前安娜玛利亚已经按照她原先的计划把我介绍给她们了。她们的妈妈也热情地接待了我。（她们的爸爸也在服劳役。)她们家的房子挺气派,有阳台,铺着地毯,有几个大房间和

一个专门给两个女孩住的小房间。里面摆着钢琴、许多洋娃娃和其他一些女孩子们所喜欢的东西。我们通常是在一起打扑克，但两姐妹中大一点儿的那个今天没有心情打牌。她想先和我们说一说她的一个烦恼,一个她最近常常思考的问题 要知道,她的黄星让她有些头疼。事实上，是人们的目光使她意识到了变化——她发现人们对待她的态度改变了,从他们的目光中,她看出他们‘ 憎恨 ”她。今天上午她妈妈让她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也发觉了这一点。但我认为,她是有些过于敏感了。至少,我个人的体验就不完全是这样的。比如说,工作单位里也有几个泥瓦匠,大家都知道他们不喜欢犹太人，然而他们还是和我们这些男孩交上了朋友。同时,这当然并没有使他们的观点发生任何改变。接着,我又想到了面包师的例子。我试着对女孩解释说，实际上他们憎恨的不是她,或者说不是她这个人,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认识她,而仅仅是那个思想意识,即‘ 犹太人的思想 ”。这时她说道,她刚才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说,她还搞不大清楚那是什么东西。安娜玛利亚对她说,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宗教。但她想要知道的不是这一点,而是‘ 它的意义 ”。‘ 毕竟一个人应该知道别人为什么憎恨自己,’她认为。她承认,一开始她对于这一切一点儿也不明白,当看到别人鄙视她时,她心里难受极了‘, 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 ”。她说，当时她第一次感觉到，有某种东西将她与人们分开了,她和这些人不一样,她属于另类。从那以后她开始思考,开始在书本里和交谈中探究这个问题,最终她认识到了 牠们憎恨的正是她身上的这种东西。她的看法是，“ 我们犹太人和别的人不一

样”,根子就在于这一区别,人们因此而憎恨犹太人。她还说“意识到这种不同之后”,生活变得多么特别,有时她会因此产生一种骄傲的感觉，有时却又会产生某种类似于耻辱的感觉。她想知道该怎样对待自己的这种不同,所以她问“:我们究竟是该为它骄傲呢,还是应该为它羞耻?”她的妹妹和安娜玛利亚都不大知道。我自己至今为止也没有看到产生这些感觉的理由。况且，一个人自己并不完全能够决定这种区别 据我所知,正因为如此才需要用这个黄星。我向她指出了这一点,但她执拗地说,区别“是我们自身所带来的”。我却认为我们身上佩戴的这个东西才是更加主要的。我们为此争论了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老实话,我并不觉得这个问题有多重要。但她的思路中有某种东西令我有些气恼 我认为这一切其实要简单得多。除此之外,当然,我想在争论中取胜。有一两次安娜玛利亚似乎也想说话，但她一次机会也没有得到，因为我们两个人已经不大注意她了。

最后我给她举了一个例子。有几次,纯粹为了消磨时光,我思考了这个问题,因此这时我想了起来。此外,不久前我还读过一本书,是一部小说 有一个乞丐和一个王子,他们两人除了这一区别之外,在长相和身材方面几乎毫无差异,仅仅出于好奇,他们互换了命运,最后乞丐成了真正的王子,而王子则成了真正的乞丐。我对女孩说，试着设想一下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时的情况吧。当然,这不大可能,但说到底,其实很多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这种事情发生在她十分年幼的时候,那时她还既不会说话,也没有记忆,不管它是怎么发生的,总之,我们假设,她与另一家的小

孩被互换了,或是搞混了,那家的孩子在种族方面的证明材料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在这个假想的事例中,现在就是另一个女孩感觉到区别,当然也得戴黄星了,而她却会因拥有另一个女孩的材料而把自己看成是和其他人完全一样的人，别人当然也会这样看她的，而她压根儿就想不到，也根本不会知道这整个儿区别的。我看到，这故事对她触动不小。一开始她只是沉默不语，她的嘴唇慢慢地、但很柔和地(这一点我几乎已感受到了)分了开来,仿佛想要说些什么似的。但后来发生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而是另一种特别得多的情况 她哭了。她趴在桌子上,把脸埋在胳膊肘里,肩膀则不住地微微抖动着。我大吃了一惊，因为我的目的并非如此，此外，本身这种景象也令我有些不知所措。我试着朝她弯下腰去，碰碰她的头发、肩膀和胳膊,恳求她别哭了。但她沮丧地、泣不成声地叫喊道,如果说我们自己的本性在其中没有任何作用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纯粹是一种偶然,如果说她也可以是另一个人,而不必是她被迫去当的那个人的话，那么“ 整个这一切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她认为这种说法是‘ 无法接受的 ’。我发窘了,因为这都是我的错,但我并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于她来说这么重要。我的话几乎已到嘴边了,我想说 别去管它,因为在我眼里,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我不会因为她的种族而鄙视她的。但我马上就意识到了,如果我这么说的话,就有点儿可笑了,因此我后来什么也没说。只不过,我还是为没说而感到心里不舒服,因为在那一刻我的确感觉到了它 ——一种完全超脱于我之外的境地，几乎可以说是自由的境地。当然,也有可能,在另外一个处境中,我的观点或许也会

是另外一个样子。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我还明白，我无法进行尝试。但这还是令我感到有些窘困。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此时我头一回产生了某种有点类似于羞耻的感觉。

我在楼梯间里才得知,我的这种感觉伤害了安娜玛利亚 当时她表现得很奇怪。我和她说话，她一句也不答理。我试着去抓她的胳膊,她却从我的手中挣了出去,把我一个人扔在了楼梯上。第二天下午,我白白等了她半天,结果她却没有来。这样一来,我也不能去两姐妹家了,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总是一块儿去的,如果我一个人去的话，她们肯定会盘问我的。我现在倒是领悟了女孩星期天所说的那番话的意思了。

晚上,她到弗莱施曼家里来了。一开始,她只是非常矜持地和我搭讪几句,后来她说,她想我在两姐妹那里一定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则对她说,我没去楼上。直到此时,她的脸色才有所缓和。她想知道我为什么没去,我回答道,没有她作伴,我一个人不想去—— 这倒是大实话。我看到，我的这个回答令她很开心。过了一段时间后，她表示愿意和我一起去看金鱼—— 从那里面出来时我们已经完全和好了。后来,在这个晚上,女孩关于这事只再提到过一次“: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争吵,’她说。

③

第二天我遇到的事情有些奇怪。早上，我早早地起了床，和平常一样出门去上班。看来这是个大热天，今天公共汽车上也挤满了乘客。我们已经把郊区的房屋甩在了身后，也过了那条通往切佩尔岛的没有任何装饰的短桥 从这儿往前,有一段道路延伸在一片开阔的地带上,周围是原野,左边有一个外观像飞机库的低平的建筑物,右边是散布的温室园圃。就在这里,公共汽车猛然间刹住车,而后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从外面传来了一声指令,随后乘务员和其他乘客又把它传达到了我这里：车上的犹太人全都下车吧。咳，我想，他们或许是，肯定是要检查通行事宜和核准一下证件。

在国道上，出现在我对面的果真是一个警察。我一句话也没说,马上就把我的证件递给了他。但他做了一个短促的手势,先让公共汽车开走了。我还以为,他可能没看清楚证件,正打算向他解释,正如他所见到的,我是军工厂的员工,是不能够在这里耽误工夫的。然而，此时在我周围的路面上却突然充满了声音，男孩们——我的壳牌炼油厂的同伴们从路堤后面冒了出来。原来，警察把他们从前面几辆公共汽车上拦截了下来。看到我也来了，他们一阵大笑。连警察也微微笑了一笑,就像是有点儿疏远地、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入了欢乐的队列；我马上看出他对我们没有意见——自然也不可能有。我还是问了问男孩们，这是 怎么回事，但

暂时他们也都不知道。

警察把随后从城市方向开来的公共汽车也全都拦截了下来。他的做法是，从一定距离之外朝汽车走去，同时把手高高地举起：在此期间他让我们都待在路堤后面。接下来，每回都要重复同一幕场景 新到的男孩们先是吃惊 ,后又转而笑了起来。警察看上去很满意。这样大约过去了一刻钟。这是一个清爽的夏日早晨，我们躺在路堤的侧坡上，感觉得到太阳已经开始把草烘热了。稍远处 ,在蓝色的雾气间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油库肥胖的油罐。再远一点是工厂的烟囱，更远的地方是一座教堂的看上去已经有些模糊的尖顶轮廓。男孩们或成群结队 ,或独自一人 ,接二连三地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了。来了一个很受欢迎、十分活跃的、长着雀斑的男孩 ,他的黑发理成了寸头 :是“ 皮艺匠 ”,大家都这么叫他——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他们都是各个学校里的，而他却选择了这个行当。他还是个抽烟的男孩 ;几乎看不到他不抽烟的样子。的确 ,一般来说其他的人也都抽烟 ,为了不落伍 ,最近我也尝试了一下 ;但我发现 ,他的那种方式完全不同 ,他简直就是狂热而贪婪地对待这一嗜好的。他眼睛里的表情也是非常古怪和狂热的。这人的性格属于沉默寡言、比较难以接近的那种；在男孩们中间他不大受欢迎。但有一次我还是问起了他，抽这么多烟有什么好处。他只是随随便便地答道“: 比吃零食便宜。”我有些骇异 ,因为我的确没有想到这个理由。发现我的窘态后，他目光里所流露出的那种戏谑的、甚至是批评的神情则令我更为吃惊 ;实在是尴尬 ,于是我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但现在我就比较理解其他人对他所持有的那种

谨慎态度了。另一个人到来时气氛就轻松一些了，大家欢呼着迎接了他，他的所有哥儿们都只管叫他“奶油小生”。我觉得这个称呼与他倒也真相符，因为他有着顺滑光亮的深色头发、灰色的大眼睛，而且就整体而言，他整个人也是那么地顺滑舒服，讨人喜爱。后来我才听说，这个词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们之所以送给他这个外号，其实是因为他据说很会讨女孩子们的喜欢。一辆公共汽车把“罗斯”也带来了，实际上他的名字叫“罗森佛得”，但他们都这么地把它给简化了。因为某种原因，他在男孩们中间很有威信，在有关大伙儿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我们一般都向他的观点看齐，在泥瓦匠领班那儿也总是他代表着我们。我听说，他就读于贸易学校。他那聪慧的、稍嫌过长的脸，金色的波浪卷发，以及神情有点儿刻板的水蓝色眼睛总是让人联想起博物馆里的那些标有“王子与灰狗”或其他类似标题的古旧画作。一个个子矮小的莫斯科男孩也到了，他的脸就不匀称得多了，甚至可以说相当难看，而且在他宽扁的鼻子上还架着一副几乎和我奶奶那种一样的、厚厚的、显微镜似的眼镜。就这样，其余的人也一个接一个地到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基本上和我的差不多，即总的来说这件事有些不平常，但这肯定是个误会或某种类似的情况。“罗斯”在得到几个男孩的委托之后，还专门询问了警察，如果我们上班迟到了，该不会有问题吧？还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放我们走和让我们去工作。警察一点儿也没有因为他的问题而生气，但他的回答是，这不取决于他，不是他所决定得了的。实际上他知道的也不比我们多多少，他提到了一个“下一道命令”，它将取代旧的命令，而在此之前他和

我们一样,暂时都得等候着—— 他大体上就是这么解释的。这一切,尽管听上去不是很清楚,但我们认为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况且,我们终归是要服从警察的。尤其是因为我们有证件,还有军工部门盖的印章,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警察的事看得太过严重,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从他的话里得知，他也认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些“有头脑的男孩们”，他补充说，希望我们能够继续遵守纪律。我觉得,他是喜欢我们的。他本人看上去也挺讨人喜欢:他是一个个头儿很矮的警察,既不老也不年轻,在他那被阳光晒成棕色的脸上长着一双非常明亮的眼睛。从他的个别话语里，我听出来他是个外地人。

七点了：油库那里这会儿该上班了。公共汽车现在已经不再运来新的男孩了，这时警察问道：我们之中还有谁没有到。“罗斯”数了一下人数，向他报告说：我们全都齐了。警察的意见是，我们还是不要待在国道边上。他看上去心事重重,我的感觉是,实际上他对该如何处置我们这一问题的思想准备和我们对该如何看待他这个问题的想法一样少。他问：“我现在该拿你们怎么办？”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无法帮他的忙。我们十分放松地围绕在他的周围,说笑着,就像是郊游时围绕在一位老师的周围,而他则站在我们小组的中央，沉思着，不停地抚摩着下巴。最后他决定：我们去海关办事处。

我们跟随着他走到了一幢破旧的、孤零零的平房前,就在国道边上:这就是“海关办事处”—— 它上面的一个饱经风霜的标牌也这么写着。警察把钥匙环掏了出来，在许多叮当作响的钥匙中选

出一把插进了锁眼儿。那是一个凉爽、宽敞，但稍有些空荡荡的房间，里面摆放着几条长凳和一只做工粗劣的长桌。警察又打开了一扇门，走进了一个小得多的、像是办公室的房间。透过门缝我看到：里面有地毯、办公桌，桌上有电话。我还听到了警察打电话的声音，通话时间很短，但他说的话我就听不清楚了。我猜想，他刚才是在设法催促那边下命令，因为出来的时候（他仔细地把身后的门锁上），他说道："没信儿。全都白搭，得等着。"他鼓励我们摆出一副舒服的姿势待着。他还问我们会不会玩什么游戏。有个男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皮艺匠"，建议大家玩叉烧肉[1]。警察对此却不是很感兴趣，他说，他原以为我们这些"这么有头脑的孩子们"会想出一种更好的游戏呢。他和我们开了一会儿玩笑，其间我始终觉得，他是在想方设法逗我们开心，也许是为了避免我们空闲下来后不遵守纪律，他在国道边曾提到过这一点；但他在这种事情上实在是不怎么在行。很快他便丢下我们走了，走之前他还说，他得去照应一下工作了。我们听到，他出去后从外面把门给我们锁上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看来，得等好长时间命令才能到。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事儿一点儿也不着急；说到底，我们浪费的也不是自己的时间。这一点上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在这里的阴凉处待着，要比干活流汗舒服得多。油库那儿没有

①一种游戏，游戏的一方迅速出手击打另一方的手掌，另一方则尽量避免被击中。

太多的阴凉地方。“罗斯”还曾专门去了趟泥瓦匠领班那里，请他允许我们把衬衫脱下来。的确，这并不完全符合规定上的条文，因为如此一来我们身上佩戴的黄星就看不见了，但泥瓦匠师傅出于人道还是同意了。只有莫斯科人那白纸一样的皮肤有些遭了罪，因为他的后背很快就变成龙虾的颜色了，看到他从那上面撕下来的长条皮肤，我们好笑了一阵子。

我们找到了舒适的姿势，在长凳上或者干脆就在海关办事处的地上待着，但要让我说出来我们是靠什么打发时间的，就不那么容易了。笑话我倒是听到了不少，随着时间的流逝，香烟和干粮包也都被拿了出来。我们还想到了泥瓦匠领班：大家说，今天早上我们没去上班，他一定惊讶得不得了。马掌钉也被掏了出来，那是玩“公牛”游戏用的。这个游戏我是在这些男孩中间学会的：把一根钉子往高处一抛，在重新接住这根钉子之前，谁从自己面前的钉子里抓的数最多，谁就是赢家。“奶油小生”用他那细长的手指赢得了每一局游戏。“罗斯”还教了我们一首歌，我们唱了好多遍。这首歌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歌词可以翻译成三种语言，但总是用相同的词语：如果我们给它们加上 –esz 的后缀，听上去就是德语，如果加上 –io，是意大利语，而加上了 –taki，就成了日语。当然，这全都是些无聊的玩意儿，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消遣。

后来我看到了一些成年人，他们也是被那个警察从公共汽车上拦下来的，用的也是对我们的那种做法。由此我也明白了，当那个警察没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在国道上做着与早上相同的工作。这样慢慢聚集起来的人已经有七八个了，全都是男人。我

看到，这些人可没少给警察找事儿：他们表示不解，摇着头，向他解释，展示他们的证件，拿问题烦扰他。我们也被他们抓住问个不停：我们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后来他们还是待在了自己的圈子里。我们让给他们几条长凳，有些人蜷缩着坐在上面，有些人则在凳子的周围来回走动。他们谈论了很多事情，但我并没有太注意听。他们更多的是在揣度警察采取行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以及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会有什么后果。然而，就我所听到的，有多少人，大约就有多少种观点。总的来说，这主要看谁手里拿的是什么样的批文，因为我听到他们说，他们身上当然也都带着纸条，也都急于要赶到切佩尔去，有的是要去办私事儿，有的则和我们一样是要去干公家活儿。

在他们当中我也记住了几张有意思的面孔。譬如我发现，有一个人没有参与到他们的交谈之中：他自始至终在读一本书，看来，那正好是他随身带着的。此人是个瘦高个儿，身上穿着黄色的风雨衣，脸上的胡子没刮，在两道表示出心情不好的深深的皱纹之间，是一张线条分明的嘴。他在窗户旁一条长凳的最边上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翘着腿，侧身背对着其他人。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让我想起了火车车厢里那种阅历丰富的老乘客，他们认为，任何话、任何问题以及在偶尔乘车的旅客们之间惯有的搭讪结识，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是厌倦地、漠然地等待着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刻——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一个已经上了些年纪、两鬓斑白而又谢顶的、外表体面的人在刚一到的时候，大约是在上午，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警察把他

请进来的时候，他表现得极为不满。他还问警察，这里有没有电话“，是否可以使用？”但警察告诉他说，非常抱歉，这是“办公用电话”，于是他不吭声了，脸上一副悻悻的表情。后来，对于别人的询问，他也只是简短地应答，我从中得知，他和我们一样，也是切佩尔的某个工厂的员工：他说他是“专家”，具体的细节并没有讲。他看上去相当自信，依我看来，他的观点和我们的大体上相似，所不同的是，他似乎因被拦截而觉得受到了侮辱。我发现，说到警察的时候，他总是使用一种轻蔑的、有些鄙夷不屑的语气。他说，他认为警察“接到的是一项一般性的任务”，可能是“执行的热情有些过于高涨了”。他还认为，这件事显然最终将由“专门负责此事的人员”来处理，他补充道，他希望不久就能够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后来他的声音我就不大听得到了，我已把他给忘了。只是到了下午，我的注意力又再次被他吸引住了片刻，但那时我自己也已经累了，我只是看到，他是多么地不耐烦：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两臂一会儿交叉放在胸前，一会儿又交叉放在背后，要么就是在看表。

另外还有一个古怪的小个儿，长着一只很特别的鼻子，背着一只大背包，穿着“高尔夫裤”，脚上穿着一双特别大的矮筒靴，就连他身上的黄星似乎也显得比一般人的大。此人就要焦虑得多了。尤其是他在向所有的人抱怨他那“倒霉的运气”。他的事儿大致上我都已经记住了，因为经过很简单，而且他又重复了许多遍。他本来是要去切佩尔县看望他那“患重病的”母亲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设法从当局那里搞到了一个专门的批文，它就在他身上，

他拿出来给大家看了一下。批文是今天当日有效的，一直到下午两点钟。但在此期间他又临时有一点事要办，他说是一件“ 不容耽搁的 ’事情 ,他补充道“: 是为了工业 ”。可是 ,那个办公的地方还有其他一些人，于是等了很久才轮到他。那时他已经觉得这次行程有点儿危险——他如是说。但他还是急忙上了有轨电车，按照原计划前往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在车上，他把来回路上所需要的时间与批文上面的时间期限放在一起比照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 现在上路还真的是很冒险。但在终点站上 ,他却看到 ,中午的那趟车正好还没开走。于是他又想到：“ 这张小纸条给我添了多少麻烦 !’我们听到他补充说“: ……而且可怜的母亲也在等着我。 ” 他提到，老太太可没少让他和他妻子操心。他们老早就求她 收拾收拾搬到他们那儿来 ,即搬到城里来住。他妈妈却是一个劲儿地不情愿，一直拖到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他使劲地摇着头，因为他的看法是，老太太“ 不顾一切 ”，只是要守着那房子。“ 可是那房子里连正常的设备也没有， ” 他评说道。但他接着又说“: 但也应该理解她 ,因为她是他的母亲。”“ 可怜的人儿 ,’他补充说“; 还生着病 ,而且年纪也大了。’他说 ,他感觉得到 ,如果错过了这一次机会 ,他恐怕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的。于是 ,他还是上了公共汽车。说到这里时 ,他沉默了一分钟。他把手举起来 ,然后又慢慢地放了下来 ,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与此同时他的额头上出现了上千条表示疑问的细小皱纹 他有点儿像一只悲哀的、掉进陷阱里的啮齿类动物。“ 你们是怎么认为的 ,’他随后问其他的人“; 这件事该不会有什么麻烦吧？他们是否会考虑，超过了准许的时间

并不是由于我的过错？我妈妈会怎么想呢？因为我把要去看望她的消息告诉了她,如果到了两点钟我还没回家,我妻子和两个小孩子又会怎么想呢 ?”循着他的目光看去 ,我发现他似乎主要是期待着能够得到刚才那个有着体面外表的“ 专家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或意见。可是我看到，这个人并不大注意他：他手中正拿着一支烟,是不久前刚取出来的,此刻他正用香烟的尾端敲打着银光闪闪的烟盒上那只有着凸起的字母和镌刻的线条的盒盖。他的脸上是一副陷入沉思的表情，思绪仿佛已经飘到了很远的地方。看上去，他根本就没有听到整个的故事。于是提出问题的那个人又把话题拉回到他那倒霉的运气上去了 :他只要晚五分钟到达终点站,他就不会碰到中午的那辆公共汽车了 ;如果他没在终点站上看到它 ,那么下一辆他就不会等了 ;这样一来 ,假设所有这一切的发生“ 只在于五分钟的区别 ”,那么现在“ 他就不是坐在这里 ,而是坐在家里了 ”——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着。

我还记得那个长着一张海豹脸的人 :他是个大块头儿,蓄着浓密的黑色短髭，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不断地要找警察“ 谈谈 ”。还有一点也没躲过我的眼睛,他总是试图单独地、避开其他人、尽可能在某个角落里、或者在门边寻找这样的机会。“ 警官先生，”有时我听得见他那压得低低的、嘶哑的嗓音，“ 我是否能和您谈谈 ?”或者“: 警官先生…… 我只说一句话，如果您允许的话……”后来警察便问他到底有什么事儿。这时他却犹豫了起来，他那闪亮镜片后面的眼睛也先狐疑地迅速扫视了一下四周。尽管这回他们待在屋子的一个离我很近的角落里，但我还是无法从他那迟钝

的、瓮声瓮气的话语声中听出任何意思来 他似乎在努力证明着什么。随后他的脸上还出现了一丝隐密的、甜腻腻的微笑。与此同时,他先是稍稍靠近了警察,而后逐渐地弯下背去,最后几乎都趴到警察身上去了。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这动作让我觉得不大明白：一开始我看他似乎是准备把一只手伸到内袋里取什么东西，由于他的这个动作里包含着一些看得出来的不寻常的意义,我还以为,他兴许是要把某个重要的批文或某种极不寻常的特殊证明拿出来给警察看。只是我白等了半天，也没见到有什么东西被拿出来，因为他的这个动作后来还是没有完全完成。但他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它：它像是突然卡住了，被遗忘了，可以说是在快要到达顶点的时候却又一下子被悬搁住了。最后他的那只手就只是在衣服外面的胸前摸来摸去,抓挠一阵子,就像一只稀毛的大蜘蛛,或者应该说是那种海里的小型丑八怪,在急忙寻找着缝隙，好迅速钻进他的外套里去。而他本人在此期间仍说着话，那种微笑也始终停留在他的脸上。所有这一切这样大约持续了几秒钟。后来我只见到警察异常迅速地以某种明显的果断举动当即结束了谈话。我甚至发觉,警察还有点生他的气了 的确,虽然我对整个这一切其实并不大明白，但不知为什么却觉得他的举止是有点儿可疑。

对于其余的面孔、其余的事情我就不大记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这方面的注意力也已经越来越迟钝了。还有一点可以说的就是,警察对我们这些男孩仍然很关照。而对那些成年人,我发觉,他的热心程度就要低一些了。到了下午,他看上去也已筋疲

力尽了。于是他时不时到我们中间来，或是到他的房间里去乘凉，连开往那边的公共汽车也不管了。我听到，他还试着拨了几次电话，有一两回还通报了结果“：还是没信儿。”他的脸上已经明显地带着不满。我还记得另外一个片段。那还是在这之前——即午后的某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他的一个哥儿们，即另外一个警察，骑着自行车来看他了。那个警察先把车子在外面靠墙处停放好，然后他们进了警察办公的那个房间，仔细地锁上了门。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出来。分别的时候，两人在门口还紧紧地、久久地握了手。他们没有说话，但在握手的同时，他们点着头，相互看着对方，于是我回想起了，从前在我爸爸的办公室里，当商人们在一起讨论过艰难的日子和市场的不景气之后，我也看到过这种情景。自然，我也明白，警察们是不大可能讨论这种事的，但他们的脸部表情还是让我产生了这种回忆，同样是那种熟悉的、有些忧愁的郁闷神情，也同样是那种仿佛对无法改变的命运安排的被迫屈从。我开始感到疲倦了：在此后的时间里我只记得，我感到很热、很无聊，而且有些犯困了。

整体上可以说，这一天就算过去了。命令也终于到了，大约是在四点钟左右到的，跟警察保证过的时间一样。命令说，让我们出发到‘上级部门’那里去，那里要验证我们的材料——警察这样告诉我们。而他可能是从电话里接到通知的，因为此前我们听到了他房间里传出繁忙的、提示着出现了某种变化的声音：急促的电话铃声多次响起，之后他又联系了别的人，还通过电话简单地办理了几件事情。警察还说，尽管他们也没有告诉他十分准确的情况，但

他认为,至少像在我们这种从法律角度来看是如此清楚、毋庸置疑的事例中，这估计只是一次简单的例行公事。

队伍排成三人一排，掉头朝城市的方向出发了。在附近所有的地方上,人们都同时起程了 ——这一点是我在路上得知的，因为过了桥后，在一些转弯处或十字路口，我们还遇见了其他的队伍，也都是由或多或少的戴着黄星的人和一两个乃至三个警察组成的。在其中的一支队伍旁，我还认出了那个骑自行车的警察。我发现，警察们在这种时候相互之间总是使用一种办公事式的简短方式打招呼,好像事先就预计到会有这些见面似的,此时我才明白了我们的警察刚才通过电话办理的是什么事情 如此看来,他们可能就是在约定时间。到了后来，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在了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中间,警察们相互之间隔着较大的一段距离,从两侧包围着我们的队伍。

我们就这样一直在大马路上走着，走了很久。这是一个美丽、明净的夏日下午,街上到处是穿得花花绿绿的行人,和平日里这时候的情形一样，但所有这一切在我的眼前都显得有些模糊。我用来识别方向的线索也很快就找不到了，因为我们穿过的大多是我不认识的街道和马路。随后，街上越来越多的人流、繁忙的交通，尤其是一支封闭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前进所遇到的困难，极大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并使它很快就觉得疲乏了。关于整个漫长的路途，我实际上只记得街上的行人看到我们的队伍后所流露出来的一种匆匆的、犹豫的、几乎是偷偷的好奇(这一开始让我觉得挺好玩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不大去注意它了),以及后来有

点混乱的那一刻。我们正走在郊区的一条极其热闹的大马路上，周围是拥塞的交通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噪音。我不知道，一辆有轨电车是如何斜刺里插进我们队伍中来的，插入点正好是在离我不远的前方。我们被迫猛然停了下来，等待它开过去。就在此刻，我看到，在前面，在由灰尘、噪音和汽车尾气所交织成的云雾里有块黄布一闪而过：是“乘客”。他一个箭步蹿了出去，其身影立即就在一旁的车流与人群的旋涡中消失了。我大吃了一惊：我觉得，这一切与他在海关办事处的举止并不怎么相符。与此同时，我还产生了一种惊喜感，可以说是对一个行动的易发性感到惊喜：果然，我看到，前面还有一两个人也立刻跟在他后面逃跑了。我自己也看了看四周，而我可以说只是出于好玩，因为我找不到开溜的其他理由，我认为，我当时还是有时间开溜的；后来，诚实还是在我心里占了上风。随后警察们马上出面处理了，我周围的队伍又重新合拢了。

我们又走了一段路，此后的一切都发生得异常迅速、出人意料而又有些令人吃惊。我们拐弯走进了一个地方，我认为我们到了目的地，因为道路在两扇敞开的大门之间向前延伸着。这时，我才发现，警察已经被换下，从大门那儿开始，有另外一些人一下子走到了我们的两侧，他们穿的服装和军人的一样，但在带檐的帽子上插有花羽毛：是宪兵。他们带着我们在灰色建筑物的迷宫里不断往里走，直到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一个铺满白色砾石的大广场为止。我看，这像是一个军营的院子。与此同时，我马上看见了一个大高个儿的、有着发号施令者外表的人正从对面那个建筑物的方向径

直朝我们这里走过来。他穿着高筒皮靴和合身的制服，身上佩戴着金星，胸前斜挎着皮带。我还看到他的一只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马鞭子,他用它不断地敲打着漆光锃亮的靴筒。一分钟后,我们的队伍已经停在原地等候他了。我还发现,就其自身来说,他是一个漂亮的人,锤炼得一身强悍,整体上与电影里那些吸引人的男主人公有几分相似,他的脸部轮廓线很有男性味,棕色的短髭被修剪成窄细的时髦形状，这与他那晒得黝黑的脸庞极为相称。当他走近时，宪兵们发出的号令声一下子让我们所有的人全都僵住了。此后的一切只给我留下了两个快速衔接的印象：拿马鞭的那个人的与集市上小贩叫卖声差不多的尖利声音—— 在看到过他考究的外表之后,这声音令我大为吃惊,以至于他所说的话我反倒没记住多少。但我听懂了一点,对我们的‘ 检查 ’(他使用的是这个词)他打算明天再进行。随后他立即转向宪兵，用响彻全场的声音命令他们,在检查之前先把‘ 这一帮犹太人 ’带到他认为他们实际上该去的那个地方,也就是马厩里,夜里把他们关在里面。我的第二个印象是紧接其后的由此命令所引起的一片喧哗声，以及忽然来了精神的宪兵们驱赶我们的咆哮声。一时间，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转了,只记得在此期间我有点儿想笑,一方面是由于惊奇和混乱,由于感觉到自己仿佛冷不防置身于一幕荒诞剧中,并且不大清楚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另一方面还由于我的脑海里很快闪过了一个画面：那是我继母的脸，今晚在饭桌前她会发现，她肯定等不到我了。

④

火车上最缺的是水。至于食物，即使把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看起来也够吃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吃过东西后就没有什么可以喝的了,这种感觉委实不好受。火车上马上就有人说,最初的干渴感很快就会过去的。后来,我们眼看很快就要忘掉它了,但就在这时,它又重新出现了——只是他们解释说,这回就没法再忘记它了。那些懂行的人说,六七天是一个期限,在必要的时候,即便把天热的因素也考虑进去,人没有水也能活,前提是这个人身体健康,不大量出汗,尽可能不吃肉和调料。暂时他们还是说着些鼓舞的话“:还有时间。”“一切都取决于路途有多远,”他们补充说。

这一点我也想知道：砖厂里没人告诉过我们。他们只是宣布说,谁有兴趣,谁就可以报名去工作,而且是去德国工作。与别的男孩以及厂里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也立刻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况且,据那些戴着袖章的“犹太协会”的人讲,不管是用这种还是那种方式,不管是先礼还是后兵,反正厂里所有的人迟早都会被转送到德国去的,最早自愿报名的人能去好的地方,此外他们还可以得到六十人乘坐一节车厢的待遇，以后一节车厢里就得容纳至少八十人了,因为车厢的数量不够。他们这么向每个人解释道“: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考虑余地。”我看也是如此。

但对其他的理由我也无可争辩,他们提到了场地狭小,以及由此在卫生方面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和日益突出的食物问题：的确

如此，所有这些我都见证到了。我们刚从宪兵队到达这里的时候（成年人中有许多人还知道，这个军营叫做‘安德列斯宪兵营’），砖厂的各个角落就已经塞满了人。他们中既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各个年龄段的小孩以及无数的老人——男女性别的都有。不管我的步子迈到哪里，脚下都会被毯子、背包、各式各样的皮箱、包袱和行李绊住。所有这一切，以及许多小麻烦、苦恼和不愉快，看来都是伴随着这种集体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它们自然很快就使我感到疲惫了。此外还要加上无所事事地坐等的那种愚蠢的感觉和百无聊赖，因此我并不记得在这里度过的五天中的任何一天，即使把它们加在一起，也只记得少得可怜的几个片段。令我略感轻松的是，男孩们也都在我的身边：“罗斯”、“奶油小生”、“皮艺匠”、抽烟的男孩、莫斯科男孩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我发现，他们一个也不少：他们也都很诚实。到了砖厂后，我跟宪兵们也就再也没有什么私人交道可打了 我看到他们只是在围墙外面守卫着，还有一些警察也夹杂在其中。后来在砖厂里人们也谈起了这些警察，说他们比宪兵通情达理，而且也懂得人情世故，前提是双方要事先讲好条件，钱也好，随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行。我听说，许多人主要是托他们送信、捎话儿。还有几个人甚至很肯定地说，有的人还通过他们获得过逃跑的机会，不过这种机会十分少，也很冒险，而要想知道这方面确切的情况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时我回想起来了，也有些明白了，在海关办事处，那个海豹脸的人缠着警察到底想和他谈些什么。我还得知，看管我们的那个警察为人很诚实。这个事实可以解释后来的情景，当我无聊地在院子里游荡，或是排着队在公

共食堂附近等候的时候,在众多陌生的面孔中,有一两次我还认出了海豹脸的人。

倒霉的人我也见到了,也是海关办事处那群人中的一个 他经常到我们‘ 年轻人 ’中间来坐一会儿,说是这样可以‘ 变得快乐一点 ”。看样子,他也在其中的一个建筑物里给自己找到了住所,就在离我们不远的那个地方。院子里有许多一模一样的这种建筑物 木板的顶子,但四周全都是开放的,我听说,它们原本是用于烘干砖块的。他看上去有些憔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告诉我们说,这是宪兵队检查的纪念,因为他们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了药品和食物。他向他们解释说 这些东西全都是以前留下来的,他也只是要给重病的老母送去的,但任何解释都不管用,他们指控他显然是在利用这些东西从事黑市交易。他的批文也不管用,而且,如他所说,他本人一向都很遵守法律,连一条法规也没有违反过,但这也没用。“ 你们听到了什么消息没有？我们怎么办？ ” 他时常问起。他又提到了他的家庭，还有他的霉运。他带着苦涩的表情摇着头回忆说,为了这批文,他跑了多少趟,拿到手后他又是多么高兴,可是真没想到,这事儿竟会有‘ 如此的结局 ”。一切都因那五分钟而完全改变了。如果他不那么倒霉的话…… 如果当时那公共汽车……——我听他诉说着这些想法。至于那通教训，似乎整体上还是令他满意的“ 最后才轮到了我 ,这也许是一种幸运 ,’他讲述道‘ 那会儿他们已经急着要结束了。’总之‘ 我也有可能碰上更糟的情形，’他总结道。他说 ,他在宪兵营里‘ 还见到过更难堪的场面 ”,此话不假 ,我自己也有同感。宪兵们在作检查的那个

上午警告说，任何人都休想在他们面前把罪行、钱、黄金和贵重物品藏匿起来。轮到我的时候，我也得把钱、手表、小刀和其他一切东西都放到他们面前的那张桌子上去。一个膀大腰圆的宪兵还用迅速的、甚至是比较内行的动作把我浑身上下都搜了一遍，从腋下一直搜到短裤的裤脚。我还看见了坐在桌子后面的上尉——此前从宪兵们相互间的交谈中我们已经得知，拿马鞭的那个人实际上名叫撒卡拉上尉。我马上就发现，他的左手边还有一个穿着衬衫、留着两撇鲶鱼须胡子的、屠夫模样的宪兵像高塔一样戳在那里，手里还拿着一个辊子形状的工具，它的样子实际上挺可笑——能让人联想到厨娘们的擀面杖。上尉表现得相当友好：他问我有没有什么材料，随后我却发现，我的证件在他身上并没有起任何作用，连那种眼前一亮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我惊讶了，尤其是在看到鲶鱼胡须的宪兵做出一个朝外驱赶的、其中还包含着不服从就决不会有结果之承诺的动作后，我认为最好还是什么也别说了，这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宪兵们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押出了兵营。他们先把我们塞进专用的有轨电车里，在多瑙河岸的一个地方把我们装上船，然后在靠岸后又让我们步行了一段路——我就是这样到了砖厂，我在当地才得知，它的正式名字叫做“布达考拉斯砖厂”。

在报名的那天下午，我还听到了有关旅行的其他许多事情。带袖标的人也是无处不在，并且都很愿意回答任何问题。他们寻找的首先是年轻的、有工作愿望的、单身的人。但我听到他们还向问询者保证说，妇女、小孩、老人也都有去处，而且可以把所有的行

李都带上。但他们认为有一个问题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用比较人道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呢，还是等到宪兵们来执行针对我们的决定？因为，如同他们所解释的，火车是无论如何也要装满的，如果他们的单子上凑不齐人数的话，那就要由宪兵到我们中间征募了。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显然还是第一种情况对我们比较有利。

关于德国人的情况，我也马上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有经验的老人都承认，不管德国人对犹太人抱有什么样的看法，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德国人本质上是清洁、诚实的人，喜欢秩序、准确性和工作，如果别人也具有这些特点的话，同样也会得到他们尊敬的。这与我对他们的了解大致相符，我在中学里学习了一点儿他们的语言，我认为将来到他们那儿肯定能派上用场。最主要的是，通过工作，我终于可以盼到井然有序、有事可做的新生活了，说来有些可笑，总之，它是一种比这里的这种生活更有意义、更合我意的生活，如同他们所承诺的，自然也是我们这些男孩所设想的那种生活。此外，我甚至还想到，这样一来我还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老实说，如果我想一想这几日所经历的那些事，比如宪兵队，特别是我的证件、公理的话，如果压根儿还可以去想的话，那么即使是爱国热情(假若我还顾及到这种情感)也不大能挽留住我了。

也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德国人具有另外一些特点。于是就有人问他们对此有什么好的建议。还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参与此类争论，而是主张理智的言

语、标准的行为,以及在政府面前得体的表现。所有这些赞成的理由和反对的观点,再加上许多其他的消息、情况和须知,都在我的周围,在整个院子里,被一次次地解散和重聚的大大小小的人群无休止地争论着。其间我还听他们提到了上帝、“他那不可捉摸的意愿”——他们中的一个人如是说。和从前劳约什叔叔一样，他谈的也是命运、犹太人的命运,和劳约什叔叔一样,他也认为,“我们抛弃了主”，这也是我们蒙受灾难的原因。但他还是稍稍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此人显得十分坚定，并且拥有着强壮有力的身材,他的脸有点特别:一只细窄却又显得很大的鹰钩鼻子,一双异常明亮的、水汪汪的眼睛,漂亮的花白短髭与颌下的胡须连成了一个圆圈。我看到,许多人围住他在听他讲话。我这才知道,这是一位牧师,因为我听到别人尊称他“拉比先生”。我还记住了他的一些比较特别的用词和说法，例如他在一个地方作出了让步，因为“那观物之目与那感物之心”促使他作出这样的让步:“我们在这世间也许可以对审判的轻重程度进行讨论。”他原本清澈悠远的声音在这里卡住了一分钟，其间他的眼睛比平时又湿润了一点。不知为什么,我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觉得他本来是打算说些别的什么的，而这番话让他自己也感到有点吃惊了。但他接着说了下去,他承认“他并不想欺骗自己”。他很清楚,只需看看周围“这磨难之所和这些遭受磨难的面孔”(他如是说,这种怜悯让我有些惊讶,因为毕竟他也只是同样地在这儿),就足以明白,他的任务是何等的艰巨。但他的目的并不在于要“为永生的天主赢得心灵”,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所有人的心灵都是主给

予的。但他却提醒大家“: 你们不要与主争论 !’这主要还不是由于罪过 ,而是由于这条路会通向‘ 对生命之高尚意义的否定 ”,而他认为;‘ 内心带着这种否定 ”,我们是无法活下去的。也许这样的心灵更轻松 ,但那也只是因为它是空虚的 ,就像那沙漠荒原。他说 ,一条艰难的、却又是唯一能使人获得安慰的道路就是于灾难之中也要看到永恒的主那无尽的智慧 ,因为 ,他接着这么说道“: 他胜利的那一刻必将来到，而那些忘记了他的力量的人，将同受煎熬 ,并自尘土中向他呼叫。’因而 ,如果他现在说 ,我们应该相信主最终的宽恕一定会到来（“ 让这一信念作为我们在此次考验中的支柱和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那么他同时也就指出了我们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方法。他把这个方法称为‘ 否定之否定 ”,因为没有希望‘ 我们就会迷路 ”,而希望只能来自于信仰 ,来自于那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主会饶恕我们，我们将赢得他的仁慈。我承认，他的推理看上去是明白的 ,但我也发现 ,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我们到底能为此做点儿什么。一些人急切地想听到他的意见：该现在就报名上路呢，还是留在这里？他也没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好的建议。在这里我还看见了倒霉的人 ,而且还不止一次 ;他一会儿出现在这个小组里，一会儿又出现在那个小组里。我还发现，在此期间，他那双仍有点充血的小眼睛里射出来的不安目光还总是不知疲倦地在其他小组和其他人身上扫来扫去。有几次我还听到了他的声音 ,他拦住别人 ,脸上带着紧张的、探询的表情 ,同时揉搓着双手问道“: 对不起 ,你们是不是也走 ?”为什么 ?”如果可以问一下的话 ,你们是不是认为这样更好 ?’

正在这时，我还记得的另外一个我在海关办事处见到过的人——“ 专家 ”也来报名了。在砖厂的这段日子里，这个人我也见到过好几次。尽管他的衣服揉皱了，领带也没有了，还长出了满脸的灰色胡子楂，即便这样，整体上还是能看到他原先那体面形象的无可争议的全部痕迹。他的到来十分显眼，因为马上就有一大群激动的人把他给围了起来，他们没完没了地向他提问，他几乎来不及一一作答。我很快得知，原来他直接和一个德国军官说上了话。这件事发生在前面，即司令部、宪兵队以及其他侦察部门的办公室的附近，的确，在这儿的这些日子，我本人也几次见到过一两个穿德国制服的人匆匆消失或突然出现的情况。我听说，在此之前，他先找了宪兵。如他所说，他是想要‘ 联系上他的公司 ’。但我们得知，宪兵们‘ 始终拒绝给予 ’他这个权利。要知道‘ 这是有关军工厂的事 ’，‘ 生产没了他的指导是不可想像的 ’，这一点政府部门也是承认的，虽说有关的证明文件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一样都在宪兵队里 “ 被剥夺了 ” 。所有这一切我只是听了个大概，因为他的话老是被人打断，他还要回答许多相互重复的问题。他看上去相当气愤，但他说“：我不想过多地谈论这件事 ”。而另一方面，他也正是为此事才去找德国军官的。军官正准备离开这里。我们听他说，当时他碰巧也正好在那附近。“ 我站到了他面前，”他说。这儿的许多人都见证了此事，而且他们还提到了他的莽撞。他却耸了耸肩说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而他是无论如何都要找‘ 一个有关的人员 ’来谈一谈的。“ 我是一名工程师，”他接着说，“ 而且讲的是地道的德语， ” 他补充道。所有这一切他都对德国军官讲

了。他对军官说，在这里他们使得他在道义上与事实上都无法工作,而且用他的话来说“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的,即便在现行的各种规定范围内来看也是如此。”“但这又于谁有益呢？”他向德国军官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现在又把他当时对军官说过的那番话告诉了我们：“我并不是想争取什么好处和特殊待遇。但我大小也是个人物,多少也懂得些东西,我要工作,与我的能力相称的工作，这是我所有的追求。”他后来从军官那里得到的建议是，他可以去报名登记。军官并没有作出任何“了不起的承诺”，但他保证说,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德国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尤其需要的是这种专家的技术知识。这种“客观的态度”使他觉得,军官所讲的话是“恰当的和现实的”——他是用这两个词来形容的。他还特别提到了军官的“言谈举止”与宪兵们的“粗俗”表现正好相反,用他的话来描述,它们是“理智的、有分寸的、无懈可击的”。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他也承认“自然没有其他的保证”,只有他对军官的这一印象。可是他又说,暂时他应该对此感到满足了,他不相信自己会搞错“假定,”他补充说“我没有看错人的话。”至少从我这个角度看来，我也觉得，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还是非常小的。

嘿 就在他快要离开时,我突然看见了倒霉的人,他就像一个安装了弹簧的玩偶一样,一下子从人群中跳了出来,斜着冲向“专家”的身后,更准确地说是身前。看到他脸上的激动神情和些许决心,我还以为 嘿,这回他要招呼人家了,而不像在海关办事处那会儿。然而,匆忙间他撞上了一个手里拿着单子和铅笔、正好也往

那个方向走去的又高又壮的戴袖标的人。这让他立刻停了下来，他向后倒退了几步，从头到脚地打量了那人一番，朝前欠着身子，又问了些什么。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因为‘罗斯’碰巧来告诉我 轮到我们了。

后来我只记得，我和男孩们走到位于后面的我们的住处附近时，那已是一个分外安宁、炎热的夏日黄昏了，在那些小山丘的上方，天空已呈红色，这是在这里的最后一天。在相反的一侧，即河的那个方向，我正好看见准时经过这里的短途列车那一节节绿色车厢的车顶在栅栏上方飞驰而过。我感到累了，还有，报完名后也感到有些好奇，这也是很自然的。男孩们也一样，总的来说看上去都比较满意。倒霉的人也跑到了我们的中间，他带着有些庄重的、但又夹杂着几许探询的表情说，他也在名单上了。我们表示了赞同，我看到，这令他很惬意。此后我就不大注意听他的话了。在这里，在后面这片地方，砖厂也显得比较宁静。但我看到此处也有少数的人聚在一起商讨。有的人已经在准备过夜的东西，也有人在吃晚饭，或看守着行李，或者只是就这样在夜晚默默地坐着。我们正好走到一对夫妇跟前。我见过他们多次，已经很熟悉他们的长相了 面容柔美、身材娇小脆弱的妻子和戴眼镜、缺几颗牙齿、永远奔忙着、时刻处于预备状态、额头上总冒着汗的瘦瘦的丈夫。这会儿他也是非常地忙碌 他蹲在地上，在妻子勤勉的协助下，正急急忙忙地把他们的包裹收拢成一堆，并用带子把它们全都捆在一起，看上去他只专注于这项工作。但倒霉的人突然在他身后站住了，看来，他也认识他们，因为一分钟后他问道 这么说来他们也是决

定要走喽？这时那个丈夫也只是朝后望了一眼，眼睛在眼镜片之上眨巴了几下,脸上留着汗,即使在夜晚的光线下也看得见他皱起的眉头，他只是诧异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给倒霉的人的回答：“不是不得不走吗？……”我觉得,这观点既很简单,说到底也很有道理。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让我们上路了。火车在艳丽的夏日天气里，从大门前的短途列车的轨道上出发了。是那种全部由车顶和门都封闭的砖红色车厢组成的货车。里面装着我们六十个人、行李,还有戴袖标的人装上的供我们路上吃的东西：一大堆面包和一些大容量的肉罐头,我承认,以砖厂工人的眼光来看这的确是少有的好东西。但从昨天起我就得以感受到，他们自始至终都以非常周到的、褒奖的甚至可以说是尊敬的方式对待我们这些就要上路的人,我觉得,这些丰盛的食品可能也算是一种奖励吧。宪兵们也在那儿,带着步枪,表情阴郁,扣子一直系到了下巴颏,就像是看守着诱人的东西,但又不能去碰它们,我想,这一定是因为还有一个比他们更高的权威——德国人。然后他们关上滑动门，又在门外砸了几下,随后便是发信号、吹哨子、扳道岔,火车开始晃荡,我们出发了。我和男孩们一上车就找好了位子，在车厢居前的三分之一部位,两旁还各有一个位置相当高的、并用带刺的铁丝网包得严严实实的窗状开口。没过多久，我们的车厢里就出现了用水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旅途长短的问题。

总之，这一路上没有太多事可说的。就和先前在海关办事处，或后来在砖厂里一样，在火车上我们也得把时间打发掉。也许在

这里还要更难一些,这自然是环境造成的了。然而,另一方面,意识到已有了目的地,想到所有的一切,即使是有着那么多令人疲惫的颠簸、转轨和停靠站的缓慢行程，也毕竟让我离它越来越近时，我就能克服种种烦恼和困难了。男孩们也都没有失去耐心。“罗斯”不断地在鼓励大家 我们到达后,旅途也就结束了。“奶油小生”也没少被他们拿来打趣,因为据男孩们的了解,有一个和父母一起在这里的女孩,她还是“奶油小生”在砖厂里认识的,为了她，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他常常钻到车厢靠里的地方去,男孩们中间对此有各种传闻。抽烟的男孩也在车上。即使是在这里，从他的口袋中也时不时能掏出一小撮可疑的粉末、一张纸片儿或是一根火柴来,他像贪婪的猛禽一样把脸凑到那火焰的跟前,有时夜里也能见到他的这种样子。在莫斯科男孩那里（混杂有煤灰的汗水像小溪似的源源不断地在他的额头上冒出来,并顺着他的眼镜、扁平的鼻子、厚厚的嘴唇一路流淌而下—— 不言而喻,包括我在内的其他所有人也都是这副模样的),以及在其他所有人那里,一直到第三天都还能听到个别轻松快乐的话语。“皮艺匠”的舌头虽有点儿不利落,但也讲了一两个苍白无力的笑话。我不知道,有几个成年人是怎么打听到的，我们旅途的目的地准确地说是一个叫做“沃尔德塞”的地方 虽说我很渴,虽说我很热,但这名字里所包含的那种希望就足以使我立刻轻松下来了。许多人确实是很有道理地提醒那些抱怨地方狭小的人 他们应该想一想,以后每节车厢里要装载八十个人了。实际上,如果回想一下,我还在更狭小的地方待过,比如说宪兵队的马厩里,在那里我们只能够相互协商好,所

有人全都盘腿坐在地上，以此种方式才解决了安身的问题。在火车上我坐得要舒服多了。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以站起来，甚至走上几步，比如去痰盂那个方向：此物放在车厢后部靠右边的角落里。一开始我们做出的决定是，尽可能只在小解的时候才使用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中许多人被迫体会到，自然的命令还是比我们的承诺更为强大，并且被迫照此行事了。我们男孩们、男人们，甚至一些女人们，自然都是以很明显的方式方便的。

说实在的，宪兵并没带来太大的不快。一开始我有点儿被他吓了一跳：正好在我头顶上方的左窗口处，突然冒出了他的脸，不仅如此，他还用手电筒朝我们中间照了照。这是第一天的晚上，或许已是深夜，在火车又一次长时间靠站的当儿。不过，很快就弄清楚了，他是出于好意。“大家听着，”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个消息，“你们已经到匈牙利边境了！”此时，他向我们发出一个号召，也可以说是请求。他希望，我们之中不管谁的身上还剩下钱或者什么值钱的东西的话，全都交给他。“你们去了那个地方，”他说道，“就再也不需要钱了。”他要我们相信，我们身上的东西，反正将来也要被德国人统统拿走的。“那么，”他在上面的那个窗口继续说道，“为什么不把它交到匈牙利人的手里呢？”我感受到了几许庄严的气氛。一阵短暂的间歇后，他用一种突然变得温和的、非常亲密的、在某种程度上忘记并原谅了一切的语调补充道：“归根到底，你们也是匈牙利人啊！”经过一番窃窃私语般的小声商议后，车厢里的人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车厢后部传出来一个男人深沉的声音，说是大家同意，但前提是，作为交换宪兵得给我们水喝，

宪兵对此也表示了同意,尽管他说,这是‘违反禁令的”。然而,后来他们还是没能达成协议,因为那个声音想先得到水,而宪兵却要先拿到东西,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互不相让。最后,宪兵很是生气“:臭犹太人,连最神圣的问题也被你们拿来做交易!’这是他的看法。由于恼怒和厌恶，他只能够上气不接下气地送给我们一个祝愿“:那你们就渴死去吧!’后来这种情况也确实发生了,至少我们车厢里的人是这么说的。这是真事,从第二天下午开始,我也被迫地不断听到从我们后面的那节车厢里传过来的某种声音：可不怎么令人愉快。据我们车厢里的人说,有一位老妇病了,可能是发了疯，毫无疑问是渴出病来的。这种解释看来是可信的。我现在才懂得了一些人的真知灼见—— 刚一上路的时候他们就说：“真幸运，我们的车厢里既没有特别小的人，也没有特别老的人，好像也没有病人。”后来到了第三天的上午，老妇人终于不作声了。这时我们这里的人又说“:她死了,因为没水喝。’但我们也知道,她有病而且年纪也大了,因此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说到底,这事还是可理解的。

我可以断言,等待是不利于喜悦的。至少,当我们终于真的到达目的地时,这就是我的感受。也许是我累了,也许正是那份等待目的地的努力最终使我有点忘却了这种想法：我更像是麻木了。整个过程我甚至都有些错过了。我只记得自己突然醒了，估计是被附近疯狂的警报声吵醒的，从外面透进来的微弱光线表明这已经是第四天的黎明。我的脊柱末端，即那个和火车地板接触的部位,有点儿疼。火车停站了,平时也经常这样,有空袭警报的时候

则总是这样。窗口旁边也有人，也和平常这种时候一样。每个人都说自己看到了什么——这段时间以来也一直都是这样的。过了一会儿我也走到窗口旁：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外面的黎明凉爽而又清香，广阔的原野上弥漫着灰色的雾霭，突然，就像是响起一声号角，一束锐利而又尖细的红色光线从我们身后的某个地方射来了，我明白：我看到了日出。很美，也很有意思：在国内时，这会儿我一般都还在睡觉。我还瞥见了一个建筑物，那是一个位于上帝背后的车站，也可能是一个大站前沿的建筑物，就在我的左前方。一幢小小的灰色房子，还没有任何人，小窗户全都关闭着，有着可笑的陡峭屋顶——类似的房子昨天我曾在这一带地区见到过：朦胧的晨雾中，它先是在我的眼前固化成真实的轮廓，随后，当第一抹阳光洒落下来时，它又由灰色变成了紫色，与此同时，那些窗户上也忽然一下子闪亮起棕红色的灯光。另一些人也发现了，我也把它告诉了我们身后那些好奇的人。他们问我有没有看到地名。我看到了，而且在晨曦中，在建筑物相对狭窄的、正对着我们列车行驶方向的这一侧屋檐下，我看到了两个词："奥斯威辛——比克瑙"——这就是我所读到的，它们是用德国人那种线条尖细的花哨字体写成的，并且是用双波浪线形的破折号连接起来的。然而，从我这方面来说，用尽我所有的地理知识也不知其所以然，其他人看来也不比我知道得多。后来我干脆坐了下来，因为后面的人已经请我让开位子了，由于这会儿还很早，我也很困，没过多久，我又重新睡着了。

后来是一种活跃而又兴奋的声音把我吵醒了。外面的阳光现

在已经很耀眼。火车又在行驶了。我问男孩们,我们到哪儿了,他们说,我们还在原先的地方,现在刚出发 看来,这一次是开车的晃动把我弄醒的。他们又说,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我们的面前可以看到工厂、居住区之类的地方。一分钟后,窗口那儿的人们报告说(我自己也通过光线一掠而过的变化感觉到了),我们正从一个大门样的拱顶下滑过。又过了一分钟,火车停了下来,此时那些人则是激动万分地告诉大家,他们看到了车站、士兵和人群。许多人立刻开始收拾东西,系扣子,有些人,尤其是一些女人,急忙开始梳妆打扮。外面,由远及近的咣当声、开启车门的响声、从火车里涌出的乘客的喧哗声混成了一片,现在我也看到了,毫无疑问,我们果真是到达目的地了。我高兴,这是自然的,但是我觉得,要是在昨天,尤其在前天,这种高兴会来得不一样。而后我们的车门也被工具敲击了一下,随后有一个人,或许是几个人,推开了那扇沉重的车门。

我先是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他们说的是德语或某种和德语极为相似的语言，是异口同声地说出来的。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是叫我们下车。然而,与此相反,他们却好像挤上了我们的车。暂时我还看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消息已经传来了 箱子、包袱都留在这儿。他们在做解释,有人在做翻译,在我周围被人们相互传递的信息是,以后每个人自然还会得到自己的物品,而现在这些东西得先消毒,我们则先要去洗澡 的确是该洗澡了,我也这么认为。此时,在推搡拥挤中,他们才与我接近了,我也终于看清了这里的人。我大吃了一惊，因为这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至少是这么近

距离地）看见真正的犯人，他们身穿犯人的竖条囚服，剃着光头，戴着圆帽。我自然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了几步。他们之中有几个在回答人们的问题,另有几个在车厢里东张西望,还有几个已经开始用老搬运工的熟练动作在卸行李了，这一切举动都带有一种古怪的、狐狸般敏捷的特点。在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除了平常的囚徒号码之外,我还看到了一个黄三角,尽管要猜出这种色彩的含义对我来说当然并不十分困难,但因事出突然,它还是扎了我的眼:一路上我几乎都有些忘却这回事儿了。他们的脸看上去也不大能给人以信赖感:向外支棱着的耳朵,突兀向前的鼻子,深陷的、目光狡猾的小眼睛。果不其然,从任何角度来看,他们都像是犹太人。他们让我感到很可疑，整体上让我觉得很陌生。看到我们这些男孩后,这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了。他们马上就快速地、有些匆促地小声说起话来,这时我才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看来,犹太人也并不像我从前所认为的那样只会讲希伯来语。他们用依地语（犹太德语)问:"会说依地语吗,会说依地语吗?"我慢慢地才明白了他们的问题。男孩们和我都用德语回答他们:"不会。"我看到,他们对此不是很满意。这时他们又全都一下子非常想知道我们的年龄（借助于德语我很容易就听懂了他们的意思）。我们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回答说,十四、十五岁。他们立即显得很不满意,还用手、头和整个身体比划着从四处悄声地说道:"太小,太小。"我感到很奇怪,还特意向他们中的一个人问道:"为什么?""你想要工作吗?"他问,他深窟窿般的眼睛里那仿佛空无一物的目光一直挖进了我的眼睛里。我对他说:"当然。"说到底,我就是为此而来

的,如果我仔细想一想的话。听到我的话后,他不仅用黄色的、骨瘦如柴的、坚硬的手一把抓住了我，还用它使劲地摇晃着我的手臂,并且说“: 太小了…… 你懂吗？太小啦！……”我发现他很生气,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似乎还非常重要,在与男孩们迅速商议一阵后,我带着一丝喜悦地表示同意了:那我就算是十六岁吧。此外,不管说什么都行,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也没关系,我们之中不要有亲弟兄，尤其是不要有双胞胎——这话使我感到十分惊讶;而最要记牢的是:任何工作都不是轻松的,都不是轻松的。从他们那里,我就了解到了这些情况。在两分钟里,或许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我被人家从我原先待的地方挤到了车门口,我终于纵身一跳,跳到了阳光里,跳到了外面自由的空气中。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片极其广袤的低平地。与这片平地一样突现眼前的白得刺目的明亮天空马上使我有些头晕眼花了。但我并没有时间观望;身边是一幅熙来攘往、嘈杂纷乱的情景,听到和看到的只是片言只语和一些事件的片断，还有人在指挥安排。我听说,暂时我们得和女人们小别一阵子,因为我们毕竟不能够在同一个屋顶下洗澡；而远处则有汽车等着老人们、体虚有病的人、带小孩的妈妈们以及由于旅途劳顿而精疲力竭的人们。这一切都是另外一些犯人们告诉我们的。然而,我发现,现在外面已经有一些戴绿帽和穿绿领衫的德国军人一边用会说话的手臂指示着方向,一边在他们的身后注意着一切。看到这些军人后,我感到了一丝轻松,因为他们仪表整洁漂亮,在这一片混乱中,惟有他们能够给人以稳定、镇静的感觉。我马上听到了我们之中许多成年人的

提醒,我也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 赶紧听从人家的指挥,让问询和告别尽量简短一些,我们要以理智的形象,而不是以这种乌合之众的样子展现在德国人面前。接下来的事情就较难讲述清楚了：我被一股稠粥般沸腾着的涡流裹着卷走了。我的身后自始至终有一个女人用尖叫般的声音在说一只“小手袋”的事，她告诉一个人，说她把‘小手袋’留在他那儿了。我面前有一个头发蓬乱、仪容不整的老妇人正好挡住了我的路，我听见一个矮个儿的年轻人在解释“: 听话,妈妈,因为我们很快还会见面的。”“是吗,军官先生,”他带着私密的、某种成年人之间相互意会的微笑用德语对一名正在那里指挥的德国军人说“: 我们知道不久又会再……’但我的注意力马上就被一阵震耳欲聋的尖叫声吸引过去了。只见一个抹成小花脸儿的、头上有着小卷毛儿的、被打扮得像橱窗里的玩偶似的小男孩正摆出一副古怪的前挺后弓的姿势，拼命地想从一个看上去是他妈妈的金发妇女的手中挣脱出去。“我要和爸爸一块儿走 我要和爸爸一块儿走!’他叫着、吼着、嚎着,用穿着白皮鞋的脚可笑地蹬踩着白色灰尘中的白色砾石。在此期间，我还要努力跟上男孩们,追随着‘罗斯’的呼唤和信号前进。与此同时,一个穿着印花无袖连衣裙的、身材肥硕的妇女气喘吁吁地从所有人的身边,也包括我的身边,挤了过去,朝着他们指引的那个有汽车的方向走去。而后有一阵子，一个戴黑帽和黑领带的小个子老先生在我面前打着转,被人流裹和推挤着,脸上带着搜寻的表情四处张望着,时不时地叫喊着“: 伊伦卡 我的伊伦卡!’然后是一个高个儿的、脸庞瘦削的男人和一个黑色长发的女人把脸、嘴和整个身体

都紧贴在一起,给大家造成了短暂的麻烦。最后,那个女人(也许是姑娘）还是被不断冲击他们的人流冲走和吞噬了，然而我仍看见她自远处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抬高身体，用大幅度的动作挥手告别。

所有这些画面、声音、事件都令我不知所措了,最后它们全都混成了一个古怪的、五颜六色的、给人以荒唐印象的旋涡,我置身于其中也有些眩晕了，因此对其他一些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我都没能够注意到。譬如说我很难讲清楚，究竟是我们自己、军人、犯人们的努力结果呢,还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反正最终还是形成了一支由清一色的男人组成的、整齐划一、五人一排的长队,它终于能够匀速地与我一起移动,一步一步缓慢地朝着前方挺进。他们再次强调,前面就有浴室,而我却得知,前面还有医生的检查等待着我们所有的人。他们说,这与征兵的体检差不多,自然是从工作的角度查查看身体是否合格，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在此之前，我倒是可以稍稍喘口气了。我与前后左右的男孩们时不时地相互打一声招呼，并挥手示意：我们在这儿。天气很热。我还可以环顾四周,大致辨认一下方向,看看我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车站很整洁。我们的脚下是这种地方常见的碎石子，往旁边看去，有一块种着黄色花儿的草坪，还有一条望不到尽头的、挑不出任何毛病来的柏油马路。我还注意到，这条路的后面有一大片一望无际的区域，是被一排有着相同弯头的柱子以及柱子之间的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带刺铁丝网隔开的。我很容易就猜到了：如此说来，显然那些犯人就住在那里。此时我头一回开始（也许

是因为我头一回有时间）真正地对他们发生了兴趣，而且我很想知道他们犯的是什么罪。

当我环顾四周时，这片平地的面积之大使我大为吃惊。然而，置身于许多人中间，处于这片晃眼的白光里，我却无法看清它的真正准确的图像：我勉强分辨得出远处那些贴着地面的类似于建筑物的东西、分布于各处的猎人瞭望塔般的高台、角楼、高塔、烟囱。我身边的一些男孩和成年人还指着天上的一样东西——一个一动也不动的、闪着金属光泽的物体插进了灰不溜秋的无云天空的白色雾气之中。是齐柏林飞船，真的。我周围的人们比较一致的解释是，它是用于防空目的的 此时我又想起了黎明时的警报声。然而，在周围的这些德国军人身上，我看不到丝毫慌乱或惊恐的神情。我还记得国内在这种时候一片恐慌的情景，这种蔑视一切的镇定、这种不可侵犯的样子一下子让我更为深刻地理解了国内人们谈起德国人时那种普遍的敬意。他们领子上两道闪电样的图案也是现在才印入我眼帘的。于是我能够断定，他们是著名的党卫队的人，对此我在国内也已多有耳闻。可以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他们是危险人物 :他们悠闲地在一长溜柱子之间来回巡逻，回答着人们的问题，点着头，还亲切地拍拍个别人的后背或肩膀。

在无事可做的等待中，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当然，在国内我也曾多次见到过德国军人。但那时他们总是行色匆匆，总是带着自我封闭的、若有所思的表情，总是身着无可挑剔的服装。在这儿他们则是另外一个样子，显得马虎和随便一些了。我还发现了一些更细微的差别 :他们的帽子、靴子和制服有的是柔软的，有的是挺

括的,有的是锃亮的,有的只是工作时穿着的。他们的身边都带有武器,归根结底,这对于军人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根棍子,是那种普通的弯柄手杖,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他们毕竟个个腿脚都没有毛病，看上去都是些身强体壮的男人。后来我得以近距离地仔细端详了这个东西,因为他们中的一个人站在我前面,半个背部对着我,一下子把它呈水平状地放到髋后,并握着它的两端开始无聊地来回弯弄起它来了。队伍离他越来越近了,这时我才看清,它不是木头的,而是皮革的,不是棍子,而是鞭子。这种感觉有点怪,但我并没有看到他们使用它的例子,而且我也明白,毕竟我们周围还有许多犯人。

在此期间,我还听到过一些召唤声,但对它们并不太在意。我记得，有一次需要有人去干钳工的活儿，让那些懂行的都站出来，还有几次要找身体有残疾的双胞胎,令大家觉得好笑的是,甚至还要看看我们中间有没有侏儒,后来又要找小孩,据说他们将被特殊地对待,等待他们的不是工作,而是学习,是各种优待。队伍里有几个成年人也鼓动我们：不要错过机会。但我还记得火车上那些犯人的提醒,况且我本人自然也更愿意工作,而不是像小孩那样地生活。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往前走了一大段路。我忽然发现,我们周围的军人和犯人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我们五人一排的队伍在某一地点上变成了单行的鹅队。同时他们让我们把外套、衬衫脱下来，并裸露着上身走到医生跟前去。我感觉到前进的节奏也加快了。

与此同时,我还看见,前面形成了两支不同的队伍。一个十分混杂的较大的人群汇集在我的右面，另一个较小的、似乎更好看一些的、此外我们中的几个男孩也已置身于其中的人群则聚集在我的左面。后一支队伍里的人一眼看上去（至少在我的眼里）就是合格的。其间,我已经是越来越快地、径直地朝着前面那个方向移动了,从那里,从许多熙来攘往的混乱的晃动身影中,已隐约显出一个固定点,那个点上有一身无可挑剔的制服,还有德国军官那种高高翘起的弧形大盖帽。后来，我就只觉得惊讶了：这么快就轮到我了。

检查本身其实只用去了两三秒钟的时间。我的前面刚好轮到了莫斯科男孩，但医生立刻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示他去另一个方向。我还听到他试图用德语解释“: 工作…… 十六岁…… ”但自某处有一只手伸向了他，紧接着我就站到了他刚才的位置上。对于我,医生看得就比较仔细了,他用严肃的目光留意地打量着我。我也挺直了身体,向他展示我的胸膛,我记得,我还微笑了一下。继莫斯科男孩之后的情况就是如此。医生也立刻使我产生了信任感,因为他有着相当整洁的仪表和一张讨人喜欢的、稍长的、胡子刮得光光的脸,他的嘴唇有些薄,眼睛是蓝色或灰色的,总之目光是明亮的、善意的。我能够仔细地端详他,他正用戴着手套的手从两侧支起我的脸颊，用大拇指把我双眼下面的皮肤稍稍往下拉了拉。动作与国内医生们一样。同时他还用轻轻的、但仍十分清晰的、透露出有着良好教养的声音问道“: 你几岁 ?”但几乎也只是顺便问一句似的。我告诉他“: 十六岁。”他微微地点了点头,但似乎

只是针对合适的回答，而不是针对事实的——至少在当时那一瞬间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我还有一点看法，或者应该说是一种瞬间的感觉，它也可能是错误的：他看上去似乎很满意，几乎像是松了一口气，这使我觉得，他喜欢我。接着，他一只手顺势推着我的脸，另一只手同时指示着方向，让我到路对面的合格的人中间去。男孩们已经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欢笑着在那里等着我了。看到这些兴高采烈的脸庞，我也许知道了把我们这群人和对面那群人分开来的区别：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那就是成功。

这时我穿上了衬衫，还和男孩们说了几句话，然后又开始等待。现在我从这里看路对面所进行的全部工作时，已经换了一个角度。人流不间断地向前涌动，挤进狭窄的河床，加速，然后在医生的面前分成两股支流。男孩们也接二连三地到了，现在我自然也加入了迎接他们的队伍。再远一点有另外一列长队：我看见女人们都排在那里。她们的周围也有军人、犯人，她们的前面也有一个医生，那里所进行的一切也和这里完全一样，只不过她们不用脱掉上衣，如果我想一想的话，这自然是能够理解的。一切都在动，一切都在运转，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准确地、愉快地、顺当地干着自己的事情。我在许多张脸上看到了微笑，有腼腆的，也有自信的，而不是怀疑的或预先已猜出结果的，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样的，和刚才我在自己的脸上所感觉到的差不多。一个从我这儿看过去长得很美的、戴着圆耳饰的棕发女人带着这种微笑，双手把白色的雨衣握在胸前，在向一个军人提问。同样微笑着走到医生跟前的是一个相貌英俊的、黑发的男人：他是合格的。医生的工作

我也很快就明白了。一个老人来了，检查结果很清楚：到另一边去。一个年轻人——到这边来，到我们这里来了。另一个人长着一个啤酒肚,却拼命地挺直身体:全都白搭——不对,医生还是让他到这边来了,对此我不是很满意,因为我个人认为他已经有些老了。我还发现,男人们大多胡子拉碴,给人留下的印象可不怎么太好。像这样用医生的眼光去看他们,我不得不承认,他们之中有很多老人和由于其他原因而无法利用的人。一个人太瘦，另一个又太胖,还有一个人不停地眨巴着眼睛,像兔子嗅东西似的翕动着嘴唇和鼻翼,做着怪相,我断定他是个精神病人。然而,这人也清楚自己的义务,起劲地微笑着,同时迈着古怪的鸭子步一摇一摆地急忙朝不合格的那群人那边走去。又有一个人已经把外套和衬衫拿在手里,背带裤的带子落在大腿上,胸前和臂膀上随处可见已经开始松垂下来的皮肉。他走到了医生面前，医生自然立刻指示他到不合格的那群人中去，于是这张胡子拉碴的脸上露出了一种表情，这张干涸得开裂的嘴上现出了一种尽管也是同样的，但对我来说还是更为熟悉的微笑,它们稍稍牵动了我的回忆:似乎他还有什么话要对医生讲。只是人家现在注意的已经不是他，而是下一个人了。这时便有一只手,估计就是刚才拽走莫斯科男孩的那只手,现在把他从路当中拽了出去。他做了一个动作,回过头来,脸上是一副愕然与不满的表情:没错,正是“专家”。

后来我们又等了一两分钟。医生的面前还有很多人，在我们这边，把男孩们和男人们加在一起，我估计已经有四十人左右了。这时有人来通知:让我们洗澡去。一个军人朝我们走来,匆促间我

甚至都没看见他是从哪里过来的，他是个矮个儿，年纪已经不轻了，外表平和，挎着大步枪——我看他像是个列兵。“快，去前面!’他发出了诸如此类的命令,据我的判断,这种说法与语法书上的规则并不完全相符。但不管怎么样，它对我来说是十分悦耳的,因为我和男孩们已经有点儿不耐烦了,自然,老实说主要还不是因为肥皂，而是因为水。道路穿过一个铁丝编结的大门通往里面,通往围栏后面的那片地区,看来,浴室也是在那个地方。我们三三两两、不紧不慢地一边聊着天,一边东张西望地出发了。在我们的身后,士兵一言不发、表情漠然地缓步徐行。我们的脚下又是一条宽阔的、无可挑剔的白色公路,我们面前是一大片宽广得令人有些厌倦的平地，四周的空气在炎热中颤抖着，如波浪般涌动着。我甚至曾有过一些担心 不会太远吧。后来我知道了,浴室离车站总共只有步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在这短短的路途上所看到的周围环境总体上也是令我喜欢的。尤其是一个足球场让我感到异常高兴,它就在路右边的一大片草地上。绿色的草皮、比赛所需的两个白色的球门、白粉划的线一应俱全,而且都是新整修过的,保养得极好,极正规,极引人注目。我们这些男孩立刻说 嘿,工作之余我们可以在这儿踢球了。更令我们喜悦的是,走了几步后,我们在路左边看见了一样东西——毫无疑问,它是水龙头,是那种路边的按压井。它旁边的一块写着红字的牌子试图提醒我们：“非饮用水。”然而，此刻它自然是不大能够拦住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士兵很有耐心,可以说,水很久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喝了,不过它后来还是在我嘴里留下了某种化学药物的一股刺激性很强的、令

人恶心的怪味道。接着往前走时,我们还看见了房子,就是我刚才在车站所看到的那些房子。真的，从近处看这些建筑物的形状也很古怪,长长的、扁平的,说不清楚是什么颜色,房顶上有一长溜拱出来的某种通风或照明的装置。每个建筑物的周围都有铺着红色砾石的小径，在公路与每个建筑物之间都有修理得很整齐的草坪将它们隔开。我惊喜地发现,草坪与草坪之间都有小菜园,还种着甘蓝,花床里则养着各种颜色的花儿。一切都非常干净、整齐、漂亮—— 果然如此,我发现,我们在砖厂里所想的还是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有些欠缺,我明白了 在我们周围,我没有看到活动的痕迹、生活的气息。但我想,这可能是自然的,因为现在毕竟是居民们工作的时间。

在浴室里（向左拐，又过了一道铁丝网，再过一个铁丝大门，在一个院子里）我也看到，他们已经事先做好了迎接我们的准备，并且殷勤地、详细地为我们解释了一切。我们先到一个石板地面的、前厅模样的地方。这里的人已经相当多了,我认得出他们是和我们同乘一辆火车来的。从这一点上我也明白了，此处的工作估计也是毫不懈怠地进行着的,看来,他们连续不断地从车站把一批又一批的人带到这里来洗澡。这里也有一个犯人帮助我们，我发现他是一个外表极为考究的犯人。这人穿的也是囚犯的条纹衫，但肩部垫高了,腰身也收了进去,我可以斗胆说,它是按照最时髦的、甚至是最惹眼的样式剪裁的,还经过了熨烫。此外,他还有一头梳理得十分整齐的、黑亮的、正常的头发,几乎就和我们这些自由人一样。他站着迎接我们，在大厅的另一头，一个军人的右边，

而那人则坐在一张小桌子的后面。他本人也是个小个儿，看上去兴致很好,很胖,肚子从脖子那儿就开始了,下巴上的赘肉一直挤到领子上。他那长了皱纹的、没有胡须的黄脸上长着一双引人发笑的、总共只有一条缝那么大的眼睛 有点儿像在火车站上他们在我们中间寻找的那种侏儒。然而，他的头上却戴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帽子,桌子上放着一只崭新锃亮的公文包,包旁放着一根白色的皮鞭子——我不得不承认，它非常漂亮，这显然是他的私人物品。所有这一切我都可以透过许多头和肩的缝隙轻轻松松地看到，在此期间我们这些新到的人也尽量挤身进去，在原本已经满满登登的地方寻找着落脚点。在这段时间里，犯人蹑手蹑脚地从对面的一扇门出去了,而后又蹑手蹑脚地从那里匆匆赶回来,然后他对军人极其私密地、简直趴到他耳朵上似的说了几句话。军人看上去很满意,说了几句话作为对他的回答,我们也立刻听到了他那刺耳的、上气不接下气的、一种小孩或女人才会有的尖细声音。于是,犯人直起身来,并举起一只手,开口说话了,他请我们‘ 安静下来注意听 ”——我现在也第一次经历着人们常提起的那种体会，即在异国他乡听到家乡味儿的匈牙利语时的那种意外惊喜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儿 这么说来,对面站着的是我的同胞。我立刻有些同情他了,因为我看到,他还很年轻、人很聪明,尽管是犯人,但我不得不承认他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我非常想问问他,他是从哪里来的，到底犯了什么罪，怎么会成为囚犯的。但暂时他只是告诉我们,他想讲一下我们要做的事情,告诉我们‘ 大队长先生 ’对于我们的期望。他补充道,如果我们也同意的话,事实上他们也希望我

们这样,那么一切都会进行得‘ 又快又顺利 ’的,尽管他认为这主要是对我们有利,但他还是向我们保证说,这同时也是‘ 队长 ’的希望——现在他已经撇开正规的形式,使用了这种更为简短的、令我感到更为亲密的称呼。

随后我们从他那里得知了几件简单的、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的事情,其间军人也不住地点着头表示赞同,仿佛是在向我们证实,他虽然是一名犯人,但说的话还是确凿可信的,并且带着友好的表情用愉快的眼神一会儿看看犯人，一会儿又看看我们。我们得知,比方说,在接下来的一个地方,也就是‘ 更衣室 ’里,我们要把衣服脱下来，然后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挂在那里的衣架上。我们还会在衣架上找到号码。在我们洗澡的时候，有人会对我们的衣服进行消毒。他认为，现在他恐怕已经无需再解释为什么说让每个人牢牢记住衣架的号码是非常重要的事了，我同意他的这一观点。对他的另一项提议,我也不难看出其益处,即‘ 建议 ’我们把鞋子成双地系在一起,“ 以免搞混 ”。在这之后,他保证说,会有理发师来照料我们，最后就轮到洗澡了。

然而,他接着说,在此之前,请那些身上还有钱、金子、宝石或其他贵重物品的人站出来，自觉地把这些东西交给“ 队长先生保管 ”,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现在‘ 还可以无罪地 ’从这些东西中‘ 解脱出来 ”。他解释说,从事贸易、进行各类买卖活动,以及保留和携带贵重物品在“ 集中营里都是最严厉禁止的 ”—— 他使用了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但意思却是清楚明白的德语说法。我们从他那里得知，洗完澡后要对我们每个人“ 进行透视 ”，

而且是用一个“专门的仪器”。军人也点着头,心情显见不错,他还以明确的赞同表情强调了“透视”这个词,显然这一点他也听懂了。我心里想到，这么说来，宪兵所了解的情况看来还是准确的。犯人说,他个人还有一点要补充的,企图走私会使罪犯本人冒着受到“最严厉的处罚”的风险,也会使我们大家都冒着在德国当局面前荣誉受损的风险,他的看法是,这样做是“徒劳无功和毫无意义的”。无可置疑,尽管这个问题与我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我想,他应该是对的。接下来是一小段的沉默，到末了我觉得它几乎有点儿令人不舒服了。而后前面有了动静:有个男人请别人让开路,从人群里走了出来，把一件东西放到桌面上，然后又匆匆走了回去。军人对他说了几句话，听上去像是表示赞许。那东西是一个小物件,从我这里看不大清楚,它马上被他收进了桌子的抽屉里,在此之前他还看了看它,仿佛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它的价值。看上去,他很满意。接下来又是一段沉默,但时间比上一次短,然后又有了动静,又出来了另外一个人。从这以后,人们已经开始不间断地、越来越大胆、越来越迅速地从人群中出来,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桌子跟前,把一个个闪闪发亮、咣当有声、嗡嗡颤动或是哗哗作响的东西放到鞭子和公文包之间的一小块空着的桌面上,所有这一切,除了脚步声、物件的窸窣声以及士兵有时发出的尖细而短促的、每次都是那么快活的鼓励声之外，都是在一片寂静中进行的。我还发现，军人处理每一件物品所使用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像这样，即使有人一下子把两件物品放到他的面前,他也是专门先察看第一件,偶尔还会赏识地点点头，专门为它拉开抽屉，专门把它放到里面去，

然后把抽屉重新关上(大多数是用肚子把它顶上的),以便转而接收下一件东西，对它也重复着完全相同的程序。我简直目瞪口呆了:在宪兵没收过东西之后,竟然还拿得出这么多东西。人们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匆忙的卖力表现也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承担了保留这些物品所带来的种种麻烦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看到,从桌子那里返回来的那些人的脸上都带着同样的既有些惭愧又有些庄重的、总的来说却又似乎是有些轻松的表情。毕竟我们现在已站在新生活的门槛上,而且我明白,与在宪兵队那会儿不同,这自然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所有这一切,即整个这件事,如果说得准确一点的话,大约用去了那么三四分钟的时间。

接下来的事情我就没有太多可说的了：基本上都是在犯人的指引下进行的。对面的门打开了,我们走进了一个地方,那里果然摆着一溜长凳,长凳上面有一排衣架。号码我也马上就找到了,还在心中默念了数次，以免不小心把它忘掉。我把我的鞋也系在了一起,就像犯人所建议的那样。接下来走进一个天花板很矮的、被许多盏灯照得通明的大房间:沿着四周的墙壁,剃须刀已经飞舞起来,电推子在嗡嗡作响,理发师们在忙碌—— 他们全都是犯人。我走到了其中一个的面前，在右边。请坐在矮凳上,——我估计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听不懂他的话。他已经把机器压到我的脖子上了,并且已经把我的头发理了下来,但居然理得一丝不留,剃了个精光。随后他抓起剃须刀,比划着让我站起来和抬起胳膊,然后他用剃须刀在我的腋下刮了刮。此后，他正对着我坐到了矮凳上,一句话也不说地一把抓住了我最敏感的那个器官,然后用剃须

刀把它周围的全部冠形毛都刮掉了，这些毛是我作为男性仅有的一点骄傲，而且还是不久前才刚刚长出来的。也许，这毫无道理，但失去它比失去头发更令我心痛。我感到吃惊也有些气恼，但我明白，纠缠于这种从根本上来说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也是挺可笑的。况且,我也看到,其他所有的人,包括男孩们,也都和我差不多。我们马上问‘ 奶油小生 ”嘿,现在女孩们该怎么办 ？

但人家对我们说，接下来是去浴室。门口有一个犯人正把一小块棕色的肥皂塞到排在我前面的‘ 罗斯 ’的手里,并且边说边比划着：这是供三个人用的。在浴室里，我们的脚下是滑溜溜的木条,头顶上是管道网,上面有无数只喷头。这里已经有了许多光着身子的、体味并不怎么好闻的人。我发现有意思的是，水是自动地、令人毫无准备地突然喷下来的,在那之前,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徒劳地四处寻找水龙头。水流并不怎么粗，但水温凉爽，在这大热天气里正合我的心意。首先我大喝了一口，我又尝到了那种味道,就和刚才在井边时一样 在这之后我的皮肤只是稍稍享受了一下那种水。我的周围到处都是欢愉的窸窣声、击水声、鼻嗤声、喘息声 这是快乐无忧的一刻。我们这些男孩子相互取笑着对方的光头。那块肥皂令人很遗憾,原来它不怎么起泡沫,里面还有许多划皮肤的尖利的小颗粒。然而,我身边站着一个胖胖的人,他的后背和前胸上有着黑色的卷毛，看来，这些地方他们给漏掉了，他还是长久地用肥皂擦着自己的身体，动作犹如举行仪式般庄重。在我的眼里，除了他的头发之外，他身上自然还缺了点儿什么东西。仔细地看过后,我这才发现,他下巴和嘴的周围确实比别处要

白,那儿的皮肤上还布满了红色的新伤口。原来是砖厂的拉比,我认出来了:这么说他也来了。没有胡子的他就不再显得那么令人看不惯了:一个普通的、鼻子有点儿大的、从根本上来说外表很平常的人。他还正在往腿上抹肥皂,这时,水却如同它的突然到来一样突然一下子干枯了。他吃惊地抬头看了看,马上又低下头朝自己的面前看了看,但有点儿任人摆布的样子,就好像他已获知、理解并顺从上帝的意志似的。

可是我自己也无能为力:已经有人把我往外拉,往外推,往外挤了。我们到了一个照明很差的地方,这里有一个犯人递给每个人一条手绢,也递给了我一条(不对,原来是毛巾),并示意:用完后还给他。与此同时,另一个犯人用一把扁平的刷子往我的头上、腋下和那个敏感部位涂抹某种颜色可疑、令人发痒、气味像消毒水般刺鼻的液体,他的动作虽出人意料,却异常迅速而又灵巧。接下来是走廊,右边有两个亮着灯光的窗户,最后是第三个没有门的地方,里面都各有一名犯人站着分发衣物。我就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领到了一件估计原先是蓝底白条的、我爷爷那个年纪的人所穿的那种脖子上既没扣子也没领子的衬衫,以及一条同样也顶多只适宜于老年人穿的、脚踝处有开衩的、还有两根真正的扎裤腿绳的裤子。不管我怎么看,这总是一身已经破旧的衣服,是犯人们身上所穿之物的完美翻版,是麻布的、蓝白条的——一身标准的囚服。然后在一个敞开的地方已经是由我自己在一大堆古怪的、木底麻布衬的、没有鞋带而侧面却有三个扣子的鞋子中进行挑选了,它一下子就基本上合我的脚了。别忘了还有两块灰布,我认为,这显然

是当手绢用的。最后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配件：一顶软沓沓的、破旧的、横条纹的圆形囚帽。我有些犹豫，但在四处响起的催促声和人们手忙脚乱的更衣热潮中，如果我不想落在别人后面的话，我自然也无法多待一会儿。裤子太大，而且缺少腰带或背带之类的东西，我只得胡乱地把它系成一个大疙瘩，而鞋子却有一个事先没看出来的特点：它的鞋底不能弯曲。在此期间，为了腾出手来，我把帽子也戴到了头上。男孩们也全都穿好了：我们只是相互望着，不知道是该笑呢，还是该惊奇。但全都没有时间：我们已经出来了，又到了外面。我不知道是谁在指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有种压力落到了我身上，有股力量挟带着我，推动着我，穿着新鞋子走路还有点儿磕磕绊绊，在尘雾与身后像是有人背上挨打所发出的奇怪的扑扑闷响声中不断地向前走去，朝着新院子、新铁丝门、铁丝网、围栏的方向走去，它们时而展开，时而关闭，最后在我眼前已经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混乱的画面。

⑤

我认为，恐怕没有一个新囚犯在乍一看到此种境况之时会不感到有些惊奇的：在我们从浴室出来后最终到达的那个院子里，我们这些男孩起初还相互端详着，惊讶地对望着，久久地转动着对方的身体。不过，我也注意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就在我们附近长久地、全神贯注地，又似乎有些迟疑地上下研究并触摸着整身衣服，仿佛只是想确定衣料的质地、衣服的真实性似的。随后他抬起头来，好像突然有什么话要说，但又一下子发现自己的周围也全都是这样的衣服，因此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至少这是当时那一刻给我留下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印象。即使他被剃成了光头，还穿着与他很高的身材不相称的、显得有点儿短的囚服，我也能够从那张瘦削的脸上认出来，他就是那个恋爱中的人，大约在一个小时前（从我们的到达一直到我们的转变估计就用去了这么多的时间），他曾那么艰难地从手中放走了那个黑发姑娘。有一件事却令我在这里异常地懊悔。那还是在家时，有一回，我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一本我记得是藏在犄角旮旯里的、不知多久没人读过的、积满灰尘的书。作者是一个囚犯，后来我也没有把它读完，因为我不大理解他的思路，而且书中的人物都有着长得吓人的、让人无法记住的名字，有时一个人甚至有三个名字，最后是因为我对它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还有，老实说，犯人的生活也令我有些反感。结果，到了需要的时候，我便一无所知了。有关全书的内

容我只记得一点 根据那个犯人,即这本书的作者的说法,他对囚禁之初的、也就是离他已遥远的那些日子记得比后来的、也就是离写作时间终归更近一些的日子更清楚。当时我觉得这话很值得怀疑,几乎就是一种夸大其辞。然而,我现在认为,他写的东西还是真实的,因为我自己对第一天的记忆也是最为准确的,如果我细想一想的话，比对后来的日子的记忆更加准确。

起初,在囚禁中,我觉得自己只是个客人,这很好解释,而且我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也是因为我们大家的本性中,说到底也就是人类的本性中,都有着一种自欺的习惯。这个院子、这个被强烈的阳光照射着的地方看上去有些光秃秃的,甚至连足球场、菜园、草坪或者花儿的影子我也看不到。这儿总共只有一个毫无装饰的、外表像个大农具棚的木头建筑物：显然它就是我们的家。我得知,只能到夜晚安歇的时候才可以进去。它的前面和后面全是类似的农具棚,长长的一溜,望不到尽头。左边也有着与此完全一样的一长溜。这些农具棚前后左右彼此间都保持着标准的距离和间隔。再往前是那条宽阔的、晃眼的公路——或者是又一条这样的公路,因为至少在我眼里,从浴室一路走来,相同的道路、空地、建筑物在这片极其广大的低平地方是多得已经再也无法让人将它们区分清楚了。在这条大路将要与农具棚间的一条横行的道路交叉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玩具般的、非常漂亮的、不堪一击的红白相间色交道横竿挡住了去路。右边则是已经很熟悉的带刺的铁丝网，我吃惊地获悉,那上面带着很强的电流,真的,我这才识别出那些水泥桩子上的许多白色陶瓷螺丝来，就和国内电线上以及电线杆子上的

一样。有人保证说,被它打一下会死人的。事实上,只要我们的脚一迈到它跟前那条小径的松软的沙子上，就会有人既没有半点儿声响也没有一句警告地从岗楼里（有人还特意把它指给我们看，我也认出来了，它就是我在车站上误以为是猎人瞭望塔的高台）将我们击毙。那些已经了解一些情况的人在炫耀地、起劲地提醒着大家。不久,志愿者们就在丁丁当当的响声中到了,那些砖红色的饭盆几乎能将他们压垮。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条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了整个院子,人们不断地提到它,谈论着它“:很快我们就有热汤喝了!”没错,我也认为该是吃饭的时候了,然而这许多张兴奋得容光焕发的脸、这种感激之情、这份近乎孩童般的特大喜悦,还是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惊奇。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似乎引起这种反应的主要还不是热汤，而是经许多个初次意外后终于才获得的这份照料的本身,至少我觉得是这样的。此外,我认为这个消息很有可能是从那个男人,即那个犯人那里传来的,在此地一看就明白,他是我们的向导,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主人。如同浴室里的那个犯人一样,他也穿着合体的衣服,留着对我来说几乎已经不习惯的头发,戴着一顶用深蓝色厚呢子做成的、在国内被称作“巴斯克”①的帽子,脚上穿着一双漂亮的黄色鞋子,胳膊上戴着一只红色袖章,其地位一望可知。于是我明白,看来该修正一下我们在国内被灌输的一个思想——即“使人出众的不是罗衫”。他的胸前还有一个红三角,这也立刻告诉大家,他不是由于血统,而是

①一种无檐的、有皮滚边的帽子。

由于思维方式的缘故才在这里的，不久后我就得知了这一点。也许,他有些和我们保持距离,话也很少,但对我们还是友好的,对于一切我们想要了解的情况他都很乐意解释给我们听，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我心里想到的是,毕竟他来这儿的时间比我们要长。他是个高个儿,略瘦,有一张长了些皱纹的、有些憔悴的、但总体上还是讨人喜欢的脸。我还发现，他经常退到一边,有一两回我还在远处捕捉到了他射出的一种疑惑不解的奇异目光,以及他嘴边的一种可以说是表示反对的微笑,似乎他对我们感到有些诧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有人说，他是斯洛伐克人。我们中有几个人会讲他的语言，他们经常在他的身边聚成一小堆。

汤是由他本人分给我们的，使用的是一种形状和漏斗差不多的怪模怪样的长柄勺子。另有两个看上去像是他助手的、同样也不是我们中间的人分发着红色的搪瓷盆子和破损的勺子—— 两人合用一套,他们告诉我们说,这是由于用品不足。因此,他们补充说,餐具一用完,我们得立刻归还给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后也轮到了我。汤、饭盆、勺子是我和‘ 皮艺匠 ’共用的,对此我并不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从不习惯与别人共用一套餐具吃饭,但我明白,有时也会出现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他先尝了一口，随后立即把勺子递给了我。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儿怪。我问味道怎么样，他说你自己尝尝吧。这时我已经看到,周围的男孩们也是有的愕然,有的忍俊不禁,一个个面面相觑。于是我也尝了一口 很遗憾,我不得不说,确实没法吃。我问‘ 皮艺匠 ’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尽可以

把它倒掉,他不会反对的。与此同时,我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愉悦的声音,它解释道:“这叫乡下菜汤。”我回头看见了一个矮墩墩的、已经上了些年纪的人,他鼻子下面原先蓄过方形胡须的那块地方的皮肤较白，脸上露出满腹经纶者的那种善意。我们的周围还站着几个表情显得有点不大情愿的人，手里拿着饭盆和勺子。他对他们说,在此之前的那次世界大战他也参加了,而且是作为军官参加的。他说，当时曾经有过很多机会使他得以充分了解了这种食物,而且还是在前线,在德国战友们中间了解到的,“那时我们在一块儿打仗，”他如是说。他认为这其实就是一种“脱水蔬菜泥”。他带着一种表示理解的、可以说是宽容的微笑补充道,对于匈牙利人的胃来说,它自然是不习惯的。但他又说,我们可以,甚至应该去习惯它,因为这里面有许多“营养成分和维生素”。他解释说,这一点可以通过特殊的脱水方法得到保障,德国人在这方面特别在行。“况且,”他又带着微笑说道,“一个好兵的第一条法则就是:今天给的,全部都要吃掉,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人家还会不会给你。”他说了这么一番话。随后，他果然把自己的那份舀着吃完,平静地、动作均匀地、不露出一丝怪相地吃到一滴也不存为止。然而,我还是把自己的那份汤倒在了棚舍的墙根底下,就像几个成年人和男孩一样。但随后我就感到不好意思了，因为我远远地看到了我们长官的目光,我怕他会因此而感到难过,但我匆匆一瞥又在他的脸上见到了那种独特的表情和那种说不清楚的微笑。后来我把饭盆送了回去,并得到了一片厚面包,上面有一块外形很像积木、大小也和积木差不多的白色东西:大概是黄油吧。不对,他们

说是人造黄油。这个我全都吃掉了，尽管我也从未见过这种面包：四方形的,皮和瓤好像全都是用黑泥烤出来似的,里面有麦秸,还有在齿间嘎吱作响的沙土粒。但它毕竟也是面包，走了这么长的路后,毕竟我也饿了。在没有更好的工具的情况下,我就用手指涂抹人造黄油,采取的可以说是鲁滨孙的方式,我发现别人也全都是这么做的。随后我想找点儿水喝，但令人不快的是哪儿也找不到水。我有些恼火，因为过一会儿我们又得像在火车上那样受干渴的折磨了。

这会儿我们才开始真正注意到那股气味了。很难说清楚它：有点儿发甜,而且好像黏乎乎的,那种已经熟悉的化学药物的气味也夹杂在里面,这一切几乎让我有些害怕了 刚才下肚的面包可千万别反刍到我的喉咙里来。我们很容易就得出了结论：罪魁祸首是一个烟囱,就在左边的公路那个方向,但离公路很远。一看就知道那是一个工厂的烟囱，大家从我们的长官那里得知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它还是皮革厂的烟囱,这一点许多人也立刻获悉了。果然如此,我也想起来了,从前有时在星期天,我和我爸爸去看新佩斯队的足球比赛，我们乘坐的有轨电车也要从一个皮革厂旁边驶过,当时在那一段路上我也总得捏住鼻子。还有消息说,实际上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在这座工厂里工作。有人安慰大家说,如果一切都很顺利,如果在我们中间不爆发伤寒、痢疾或别的什么传染病的话，接下来我们很快就会到其他比较令人愉快的地方去的。也正因为如此,在那之前,我们的衣服上,主要是皮肤上,才不带有号码，而不是比方说像我们的司令——“营房司令”(现在大家已经

这么称呼他了）那样。这个号码许多人都亲眼见到过。据说是用浅绿色的墨水写在他的手腕上的,是用专门的针刺进去的,是洗不掉的。大约与此同时，我的耳朵里还传来了送汤的志愿者们的谈话。他们也见到过号码,也是刺在老囚犯的皮肤里的,是在厨房看见的。尤其是有一个答案被大家传来传去，人们不断地重复着它，探究着它的含义，据说那是一个囚犯用德语对我们中的一个人提出的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 ?’所作的回答‘ Himmlische Telephonnummer”—— 即‘ 天上的电话号码 ”。我看到,此事让大家普遍陷入了沉思,尽管我猜不大出它的意思来,但毫无疑问,我也认为这词语很奇怪。总之,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围住营房司令和他的两个助手穿梭往来,缠着他们没完没了地提问题,所获得的消息在人们中间被迅速地传递着,比如说,有没有传染病 ?答案是‘‘ 有 ”染病的人会怎么样 ?‘ 会死 ”那死了的人呢 ?我们得知的答案是‘‘ 烧掉 ”。事实上(慢慢搞清楚了,但我并不大明白是怎么搞清楚的),对面的这个烟囱并不是皮革厂的，而是“ krematórium” ,即火化用的——他们给我们解释了这个词的含义。于是我又仔细地端详了它一番 :这是一个矮墩墩的棱柱状大口烟囱,顶端仿佛被人猛砍过一刀似的。可以说,除了某些敬意,自然还有那味道之外(我们简直已经如同陷入某种类似于沼泽的粘绸东西之中般地陷入于其中了),我就没有什么别的感觉了。然而,我们不断惊奇地发现,远处也有一个,然后又是一个,甚至在那朗朗的天际也有一个和它一模一样的烟囱，其中有两个正大口地向外喷吐同我们这儿相似的烟雾。也许有些人已经开始起疑心是有道理的，看到远处一个长

着矮小树木的丛林后面正在往上冒起的一团团烟雾，他们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传染病竟会如此大范围地存在,以至于死这么多人吗？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无道理的。

我可以宣布说,还没有到第一天的晚上,我已经大体上把一切都搞清楚了。是的，这期间我们还去了厕所棚——一个类似于厕所的棚子，里面有三个讲台样的长台子，每个台子上面有两排坑洞,即总共有六排坑洞,要蹲在上面或对准它们方便,视不同情况而论。总之,方便的时间并不宽裕,因为很快出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囚犯，他戴着黑色的袖章，手里拿着一根看上去是沉甸甸的棍棒，不管你进行到哪儿都得离开。另外还有几个比较普通的老犯人也在那里溜达,这些人则温和得多,并且也乐意给我们解释一两句话。在营房司令的引导下，我们一个来回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这条路经过一个有意思的居住区：铁丝网后面是那些惯常的农具棚，它们之间有一些奇怪的女人（看到其中的一个后我立刻把头转了过去,因为从她敞开的衣衫里刚好有样东西露了出来,一个光头被太阳照得发亮的小家伙正痉挛地紧贴在那上面），还有一些更为奇怪的男人,他们大多穿着破旧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终归是人们在外面，也可以说是在过自由生活时所穿的。后来在回来的路上我也弄清楚了,这是吉卜赛人的营地。我有些惊讶:自然,在国内,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对吉卜赛人持有谨慎的看法,但迄今为止我还从未听说过,他们也是有罪的。正在这时,一辆马车出现在他们的铁丝网后面,小孩子们拉着它,肩上搭着缰绳,样子就像是矮种马，他们的身边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不紧不慢地走

着,手里拿着鞭子。货物上盖着毯子,但从许多缝隙和破洞里偷偷地向外张望的是面包，而且是白白的圆面包，那是不可能被认错的。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看来他们比我们还是高出了一个等级。这次散步在我的脑海里还留下了另一幅景象：在另外一个方向,路上走着一个人,他身着白衣、白裤,裤子的外侧有宽宽的红色竖条,头戴一顶大大的、黑色的、艺术家的帽子,和画上的那些生活在中世纪的画家们所戴的帽子一样,手里还拿着一根粗粗的、绅士们用的弯头手杖。他一路上不断地左右顾盼着。我很难相信，然而他们却说，这样一个尊贵的人也只不过是个囚犯，就和我们一样。

我甚至可以发誓说，这一路上我没有同任何陌生人说过话。然而,我真正准确地了解到一些情况,还是要从这个时候算起。此刻对面被焚烧的正是我们火车上的那些旅伴，即那些请求上汽车的人，以及那些由于年老或其他原因在医生面前被证明不合格的人，还有那些小孩和同他们在一起的现在或未来的那些身上已经能够看得出这种迹象的妈妈。从车站出来后，他们也去了浴室。他们也被告知了衣架、号码的事儿和洗澡的方法，就和我们一样。据说，同样也有理发师给他们理发，而且他们手里也拿到了肥皂。然后他们也进入了洗澡的地方。我听说,那儿也有管道和喷头,只不过从其中给他们放出来的不是水，而是毒气。所有这一切并非一下子,而是一点点地为我所获知的,并且不断有新的细节补充进来,有些情况引起了争论,另一些情况保持原样,还会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我听说,在此期间,那里的人自始至终对他们很好,他们

一直处于关爱、照料之中,孩子们玩着球,唱着歌,那个让他们窒息的地方非常美丽,坐落在草坪、树林和花床之中,因此这一切也最终使我产生了一种在开玩笑的、好像是在搞那种学生式的恶作剧似的感觉。此外,如果我想一想的话,那么还要加上,譬如他们也曾何等巧妙地仅仅通过衣架以及那上面的号码这种点子就让我换了衣服，又譬如他们曾怎样使用透视这一招把那些身上带有财物的人给唬住了，最后它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自然，我心里明白,如果从别的方面来看的话,所有这一切还不能说是玩笑,因为我自己的眼睛，尤其是我那不断翻腾的胃都足以使我确信其结果；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而且至少我想到的是,从根本上说,它也不大可能有什么太不一样的方式。说到底，他们在这儿也是坐成一圈,可以说,很有可能也把头凑在一处,尽管他们并不是学生,而自然是成年人,也许只要我再稍许想一想,那就甚至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一些长官,穿着气派的服装,吸着雪茄,佩着勋章,有可能全都是司令，是那些此时此刻不能被人打扰的人——这就是我想像出来的情景。后来他们中的一个想到了煤气，另一个马上就想到了浴室,第三个想到了肥皂,第四个又补充了鲜花,以此类推。有些主意可能被长时间地讨论和修改过，而另一些主意却立刻让他们感到十分高兴,他们跳了起来(我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我坚持这一点:他们跳了起来),并相互击掌—— 所有这一切都很好想像，至少对我来说是很容易想像得出的。司令们的设想后来通过许多双勤勉的手,在一片忙碌中变成了现实。我看得出,演出的成功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毋庸置疑，就这样从车站上走掉的有

那个听从儿子话的老妇人、那个穿白鞋的小男孩及其金发的妈妈、那个身材肥硕的女人、那位戴黑帽的老先生以及医生面前的精神病人。我还想起了“专家”:他一定非常地惊讶,可怜的人。“罗斯”也带着惋惜的神情摇着头说道:“可怜的莫斯科男孩!”我们大家的观点都和他的一样。“奶油小生”也叫了起来:“耶稣马利亚!”我们从他那里得知,男孩们的猜测是对的:他和砖厂的那个女孩之间真的“一切都发生了”。现在他想到的是,他的这个行为有可能会在女孩身上造成一种将来看得见的后果。我们承认,他的焦虑是有理由的,然而除了忧愁之外,他的脸上似乎还有另一些很难描述的感情的流露,在那一刻男孩们都带着某种敬意望着他,这对我来说自然一点儿也不难理解。

那一天的另外一件事也使我陷入了沉思。事实上,据我了解,这个地方、这个机构存在于此,坐落于此,在这里日复一日地运转已达数年之久,而且我还觉得它好像是在等着我似的,不过我也明白这种想法可能有些夸张。不管怎么说,许多人都曾带着一种特别的、可以说是不寒而栗的神情提到过,我们的营房司令四年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这时我回想起来,那一年对我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我正是在那一年进入中学的。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开学典礼时的情景:我自己也坐在那里,身穿匈牙利式的、门襟上有盘饰的深蓝色“博奇卡”装。校长的讲话我也记住了。现在回想起来,他也有着司令员那样的尊严外表,戴着一副式样庄重的眼镜,蓄着漂亮的白胡子。我记得,作为结束语,他引用了一位古代先哲的话:“吾辈求学不为学堂,乃为生活也”。我认为,既

然如此,我就应该自始至终只学习奥斯威辛。他们本该坦率地、认真地、清楚地把一切都讲解给我听的。然而,在学校整整四年的时间里，与它有关的事我连一个字也没有听到过。自然，我也承认，那样教育会令人感到尴尬,况且,它也算不得什么学问,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但这种教育法的不利之处是，我只能在这里学习和获取知识了,比如说,我们住在‘ konzentrationslager ’里就是住在‘ 集中营 ’里。然而,他们解释说,这些东西也并非都是一个样的。比如说,这里就是‘ Vernichtungslager”,即‘ 毁灭营 ”。他们马上又补充说,而‘ Arbeitslager”,即劳动营,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那里的生活比较容易,据说,环境和饮食同这里的也不能相比,这是自然的，因为毕竟那里的目的也和这里的不一样。现在我们也将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去了,只要在出发之前不出现什么情况,而这些情况在奥斯威辛却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这一点我周围的人都承认。他们继续讲解道,万万不能言病。医院就在那里,正好在一个烟囱(那些熟知内情的人彼此间只是简称它为‘ 二号 ’)的脚下。危险隐藏在水里,尤其是未经煮沸的水里,比如在从车站去浴室的路上我自己也曾喝过的那种水，但归根到底我也无法事先得知此事呀!自然,那儿有牌子,这无可争议,但我认为,那士兵或许还应该提醒我们一下。我想起来了,哈哈,自然,我真的应该看清那个目的;感谢上帝，我感觉还好，而且至今为止我也没听到男孩们抱怨有何不适。

这一天,还有许多其他的情况、情景和习惯也都是我初次所闻所见的。总的说来,到了下午我听到的消息更多了,我周围的人们

更多的是在谈论与我们的未来有关的前景、一些可能性和希望,而不是这儿的这个烟囱。有时仿佛它根本就不在那儿，我们压根儿也注意不到它:一切都取决于风向,许多人已经很了解它了。当天我还首次见到了女人们。是那些激动地聚集在铁丝网前的人指给大伙儿看的：她们果然在那儿，就在我们眼前这片粘土地的另一头，在远处，不过很难看清楚，尤其是难以辨认出她们是女人来。我差点儿被她们吓了一跳,我发现,在最初的惊喜与激动之后,我周围的人们也全都变得异常地沉默。只有一个有些颤抖的低沉的声音在我耳际回荡:"她们是秃子。"在这一片沉寂中,我第一次分辨出了夏日傍晚的阵阵微风所送来的声音,它虽然细小,而且还是吱吱扭扭的,几乎听不见,但毫无疑问是安宁、欢快的乐曲声,它像这样配着这幅景象，令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惊讶不已。同样也是第一次,我站在我们棚舍前十人一排的队伍的靠后的队列中,当时还不知道在等什么,就像旁边、前头、后头、我视力所及范围之内其他所有棚舍前的其他所有囚犯一样地等待着，第一次听到命令后,我从头上摘下了帽子,这时外面的主路上有三个骑自行车的军人的身影在黄昏的软乎乎的空气中缓慢无声地滑行。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也感受到了 这真是一幅肃穆的美景。此时我又想起 嘿，我实际上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军人了。但我只是瞪大了眼睛瞧着。这些人淡漠地、冷冰冰地、仿佛是高高在上地听着(其中的一个还在长长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我们的营房司令（他也把帽子拿在手上）从交道横竿的这一侧对他们说的话。既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或点一下头，这些人就继续在空荡荡的主

路上滑行而去了。在这些人身上，在这些几乎已成为不祥之兆的大人们的身上，想要辨认出今天早晨在火车旁迎接过我们的那些话语友好、神情愉快的团体成员是多么困难的事。与此同时，一个轻微的声音传到了我耳边，我看到我右边有一张向前挺出去的脸的侧面轮廓、一条鼓鼓的胸膛的弧线：是从前的军官。他嘴唇几乎纹丝不动地悄声说道："这是晚点名。"他微微地点着头，脸上带着微笑，露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表情，似乎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很好理解的、非常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是有些正合其心意的。这时我还因夜幕的降临而第一次见到了这里的夜景——真是一个奇观：焰火，在整个左半边天际由火焰与火花组成的真正的火的游戏①。我周围许多人在悄声低语，喃喃念叨，不断重复着："焚尸炉！……"但可以说，这仿佛已仅仅是一种对自然现象的惊叹了。然后是"上厕所"。我有点儿饿了，但我得知，我们的晚饭实际上就是那份面包，可它已经被我在早上吃掉了。至于那棚舍，即"营房"，我进去后才知道，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家具、设施，甚至也没有灯，只有水泥地板，所以又只能像在宪兵队的马厩里那样解决夜里安歇的问题了：我把后背靠在我后面的一个男孩的腿上，而我前面坐着的男孩则靠在我的膝盖上。许多新的经历、体验和印象已让我感到疲惫而又困倦，所以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接下来的日子则与砖厂里度过的那些日子差不多，留在我脑海里的细节就不多了，留下来的只是它们的色彩、一种感觉，也可

①在匈牙利语中，"焰火"一词是由"火"和"游戏"两词合成的。

以说是一种总的印象，但我又很难把它说清楚。这些日子仍不断有新的见闻和体验。这些日子里，仍有过一两回，那种陌生的冷冰冰的特别感觉又触及了我，和我第一次看见女人们时的感觉一样；仍有过一两回，我发现自己的周围满是些拉长了的惊愕的脸和面面相觑而又呆若木鸡的人们，他们不停地相互问着：“你们怎么看？你们怎么看？”此时没有任何答案，或者只有一个词的答案：“恐怖。”但就我而言，这自然并非是我能够真正用来形容奥斯威辛的那个词，也不完全是那种经历。我们的营房里有几百个居民。原来那个倒霉的人也在其中，晃里晃荡的囚服和不断滑落到他额头上的大帽子使他看上去有点儿古怪。“你们怎么看，”他也在问，“你们怎么看？……”我们自然也说不出任何看法来。接下来，他语无伦次的混乱讲述已无法让我听清楚了。不能够不想，也就是说还是可以，而且也应该不停地去想一件事，去想那些“被他抛在家里的人”，即那些“为了他们他也应该坚强起来”的人，因为他们——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正等着他回去，这大体上就是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的主要内容。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这里也仍旧同海关办事处、火车上或砖厂里一样，那就是度日如年。每一天都是在仲夏的太阳刚升起没多久就早早地开始了。这时我才知道，奥斯威辛的早晨有多么寒冷。我和男孩们坐在棚舍面向铁丝网的一侧，紧紧地相互依偎一起取着暖，正好面对着还只是斜挂在半空的、红红的太阳。几个小时后，我们却更愿意找个阴凉地方待着了。不管怎样，这里也有的是时间，这里也有“皮艺匠”和我们在一起，也能够听到一两个笑话，这里虽然没有马掌

钉,但有砾石,也通通被‘奶油小生’从我们手里赢了过去,这里也时不时能听到‘罗斯’的话“: 现在我们用日语把它唱一遍!’此外,每天好上两趟厕所，早上的那趟还要顺路去盥洗处（一个和厕所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此处没有台子,而是平行地设有三长排白铁池子,每排池子的上方各安装着一排铁管,水就是从这些管子上的细密小孔里流出来的),接下来是分配食物,晚上有点名,自然还能听到一些消息——就是这些了，这就是一天的安排。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历 ;比如说第二天晚上的‘营房戒严’事件,那是我头一回见到我们的司令感到不耐烦了,甚至可以说是恼怒了,此时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一些混乱的声音,如果仔细去听的话,我们在棚舍里的有些令人窒息的黑暗中还是能分辨出尖叫声、狗吠声和枪声的 ;还比如说有一幅景象是铁丝网后面的一队人,据说,那是些下班回家的人,我不得不相信,因为我也看到了,走在后面的人抬着些临时搭起来的担架,正如我周围的人所说的那样,躺在担架上的无疑都是死人。所有这一切自然也总是在一段时间内占据着我的想像。然而,另一方面,可以说想要消磨掉整个漫长而无所事事的一天,这些事仍然显得还不够多。由此我也发现,即使是在奥斯威辛,倘若你受到的是特殊的待遇,看来也会感到无聊的。我们等待着,期盼着——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其实我们所期盼的正是什么事也不要发生。我想，这种无聊加上这种奇怪的等待大约就是我的总体印象了，是的，实际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奥斯威辛——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

还有一件事我得承认 ;第二天我喝掉了那汤,到了第三天我甚

至已经盼着它早一点送来了。总的说来，我不得不认为奥斯威辛的膳食安排得很怪。早上很快就送来了一种液体，据说是咖啡。午餐,即那种汤,早得出奇,大约九点钟左右就送来了。然而,此后在这方面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一直要等到黄昏时分,即直到晚点名之前才会送来面包和人造黄油 这样一来,到了第三天,我对那种令人恼火的饥饿感已经相当熟悉了，男孩们也都对此抱怨不迭。只有吸烟的男孩在一旁说,这种感觉对他来说一点儿也不新鲜,他只想抽烟。除了他一贯的那种随随便便的说话方式，他的脸上还带着一种简直可以说是称心遂愿的神情，这在当时有点儿激怒了我,我想,男孩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立刻摆摆手让他住口的。

我扳起指头来一算才发现，我在奥斯威辛实际上总共只待了三个整天,尽管这一结果令我大为惊讶,但这的确是事实 第四天的晚上,我已经重新登上火车,坐在已不陌生的货车的一节车厢里了。我们得知,目的地是‘布痕瓦尔德”,尽管对这一类美好的名字我现已持有较为谨慎的态度了,但我还是觉得,在为我们送行的犯人中有几个人的脸部表情是丝毫也不会被人认错的，是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温情脉脉的,那种有些温柔、有些向往、有些嫉妒的感情色彩也不大可能仅仅是个误会。我还看到，这里有不少阅历丰富的老犯人,还有不少是长官,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袖章、帽子以及鞋子上看出来。火车旁也全是他们在忙碌，只有在远处的月台边上可以看见一些军人，是那种军衔比较低的军人。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在这个安宁之夜的柔和月色中,除了它的规模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回想起我曾于某个时候（准确地说是三

天半前)下车的那个因沉浸于兴奋、光线、活动和声音之中而显得热闹非凡的、每一个点都在颤抖和跳动的车站。

关于旅途，这回可说的就更少了：一切都按照习惯的方式进行。我们这次一节车厢不是坐六十个人，而是坐八十个人，但我们这次没有行李，而且也不用照顾女人们。这儿也有痰盂，在这儿我们也很热，在这儿我们也很渴，但在这儿我们所面临的诱惑也少了，我指的是食物方面：口粮是比平常大一点儿的面包、两块人造黄油，还有一块从外表上看有点儿像国内的萨发拉德香肠①的、德语读音为'武斯特'的香肠——这些东西是在火车旁分发给我们的，我就地即把它们吃完了，首先是因为我很饿，其次是因为在火车上我也无处可存放它们，最后还因为他们也没有告诉我，这一次的旅途需耗时三天之久。

我们也是在一个早晨到达布痕瓦尔德的。空中挂着太阳，但飘浮的云朵和阵阵轻风让天气显得温和而又干爽。至少在看到过奥斯威辛车站后，这里的火车站给人的感觉只是那么一种亲切的乡村月台。迎接的场面也不够热烈：在这里不是由犯人，而是由军人拉开车门的。我甚至想起来了，这实际上是第一次真正的、也可以说是毫无遮拦的机会，它使我能与他们有如此近的关系和如此密切的接触。我只是看着，这里的一切都进行得何等迅速、何等规范，而且又准确无误。几声短促的高喊："全都出来！""快！""五个人一排！""动起来！"几下扑扑的闷捶声，几下劈啪的脆击声，一两

①　一种价格较低廉的、8—9 厘米长的、比较粗的香肠。

只皮靴的摆动声，一两下武器尾端的撞击声，几许低沉的哎哟声——我们的队伍就已排好,就已前进,就像是月台尽头有根线在牵着我们似的。我注意到，五人一排的队伍每到第五排（也就是说每到二十五个条纹衫的人）处都有两名军人。他们总是采用同样的后转身动作,分别从两侧走到队伍旁边,和队伍保持着大约一米远的距离，同时他们的目光一刻也不垂下，但此时他们已默不作声,仅通过步伐调控着方向和节奏,好像要让这条与我童年时用纸条和小棍引入火柴盒里的毛毛虫十分相似的、每一排都在不断地蠕动着的、如波浪般滚动着的长队始终保持着运动的状态。所有这一切甚至使我感到有些眩晕，并且完全把我迷住了。我还微微笑了一下，因为我忽然想起了那一天国内警察在去宪兵队的路上的那种漫不经心的、也可以说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陪送方式。但我承认，即便是宪兵们种种夸张的表现，在与此类鸦雀无声的、所有细节都衔接得极完美的专业水准相比之下，也只能算是一种虚张声势。尽管我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脸、他们的眼睛或头发的颜色、一两处特征、甚或是小毛病,以及他们皮肤上的一两个粉刺，但我还是无法完全记住这些东西，我还是几乎不得不有些怀疑：不管怎么说，走在我们旁边的这些人也是与我们根本相似的人,说到底,他们本质上大概也是由同样的那种造人材料所构成的吧？但我马上想到,我看问题的角度可能是错误,因为我自然不是由同样的那种造人材料所构成的。

即使是这样我也注意到了，我们正在逐渐爬上一个越来越陡的斜坡,这又是一条顶刮刮的国道,但与奥斯威辛的那条国道不一

样,不是笔直的,而是迂回曲折的。在这一带我见到了许多天然的植物、漂亮的房子,以及远处掩映于丛林中的别墅、公园、园圃,整个这一片地区的规模及其比例都很适中,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至少对于看惯了奥斯威辛的眼睛来说，这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地方。我突然惊奇地发现路的右边有一个地道的小动物园，里面养着鹿、啮齿类动物及其他种类的动物，其中的一只毛已经有点儿秃掉的棕熊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后兴奋异常，立即坐下来摆好了讨食的姿势，还急忙在笼子里做了几个滑稽的动作——但这一回它的努力自然毫无结果。随后我们打从一尊雕像旁边走过，道路从这里开始分成两条岔路，雕像就坐落在两条岔路夹着的草坪上。这件作品安放在一个白色的石头底座上，也是用与底座相同的质地细密柔软的无光白色石头雕刻出来的，据我的评判，做工有点粗糙，构思也颇为仓促。那刻在衣服上的条纹、那光头,尤其是人物的整个动作造型都让人一望便知，它要表现的是一个犯人。向前低着的头和向后摆起的一条腿摹拟的是小跑步姿势，胸前有一块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方石头，两只手臂痉挛地自下面把它抱在怀里。一开始我只是以一种艺术欣赏的眼光去看它的，也可以说是像我在学校里学到的那样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地去看它的，后来我才想到,它一定还有它的意义,而且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的话,那实际上可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兆头。但我马上看到了细密的铁丝网，随后是设在两个矮墩墩的石柱之间的一扇敞开着的、带装饰花纹的铁门,门上面是一个安装上玻璃的、有点像轮船驾驶舱的结构,随即我从它的下面穿过：我到达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布痕瓦尔德位于一个冈峦起伏的地区，坐落在一道小山梁上。这里空气清新,四周丰富多彩的景观、郁郁葱葱的层林,还有下面山谷里的农舍红瓦顶都是那么地令人赏心悦目。浴室在左边。俘虏们大多比较友好，但方式与奥斯威辛那儿的有些不同。到达之后,这里迎接我们的也是浴室、理发师、消毒液和囚服。那一套衣物和奥斯威辛的完全一样。只不过这里的浴室要暖和一些，理发师的活儿干得比较小心一些，衣物仓库的管理员尽管只是很快地瞄你一眼，但也尽可能准确地估摸出了你的尺寸。随后你走到一条走廊上，在一扇装有玻璃的推拉窗前，有人会问你有没有金牙。然后有一个留着头发的、早就居住在此地的、你的同胞把你的名字写进一本大书里,并发给你一个黄色的三角形和一根宽布条,两样东西都是麻布做成的。三角形的中心有一个大写的 U ,作为一种标志,它说明你终归是个匈牙利人;在布条上你可以读到印刷的号码,比如说我那块布条上印的是 64921 。我被告知，最好尽早学会用德语清楚明白地把它说出来,还要注意在正确的地方断开,要说成“六十四,九,二十一”,因为从今天起,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身份，我的回答将总是它。然而，在这里他们并不把这个数字写进你的皮肤里,如果你刚才因有所顾虑而在浴室附近问及此事的话,老俘虏就会举起双手,两眼望着天花板,用德语表示抗议“:哎呀,小家伙,上帝保佑你们!我们这里可不是奥斯威辛呀!”可是,号码和三角一样,都必须在晚上之前缝到衣服的胸前,而且是在针线的垄断者——裁缝的帮助下完成的。如果你实在对排队等到天黑感到厌烦的话，可以拿出一部分面包或人造黄油来给他们制造些好情

绪,但即便不这样做,据说,他们也很愿意做这件事,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的义务。布痕瓦尔德的天气比奥斯威辛的凉，天色总是灰蒙蒙的,空中经常飘着细雨。在布痕瓦尔德,早餐时就送来滚烫的面汤,这会让你感到惊奇:我在这里还得知,每个人的面包定量一般是三分之一只,在个别的日子还可能是二分之一只,而不像在奥斯威辛那样一般是四分之一只,个别的日子里则是五分之一只:午餐的汤里有稠的底料,底料里有红的肉糜,运气好的时候甚至还会有一两块完整的小肉。我还知道了德语中的' 津贴 '这个概念,你可以在每回都有的人造黄油之外以一段香肠或一勺果酱的形式领取到它——这种说法出自于那个也在这里的军官之口，他在说这话时看上去总是非常满意的。在布痕瓦尔德,我们住的是帐篷,德语中叫做' 帐篷营房 ',或者叫做' 小营房 ',睡在铺上麦秸的地上,虽说彼此没有隔开,贴得也比较紧,但还是能平躺着的。帐篷后面的铁丝网是不带电的,但他们警告说,如果有谁敢在夜里迈出帐篷一步,马上就会有狼狗把他撕成碎片,这警告即便是乍一听也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但你也千万别怀疑它的真实性。在另一侧的铁丝网附近,朝着山丘的上面、两侧以及各个方向延伸出去的实际上才是真正的大营地,那些铺着小方石块的街道、漂亮的绿色棚舍,还有两层楼的石头房子即从这里开始。每天晚上都能碰到当地的老居民、老囚犯在那里卖便宜货,有勺子、刀子、饭盆以及衣服等货物。其中有一个人还想卖给我一件毛衣，总共只要半只面包，他比划着、示意着、解释着,但我后来还是没有买,因为夏天我不需要毛衣,而冬天,我认为,毕竟离我们还远。此时我才看到,有多少种不

同颜色的三角形,三角形里又有多少种不同的字母,以至于有时候我已经识别不出到底谁的祖国在哪里。在我们的住处附近，我已经听到过各种外地口音的匈牙利语，就连我最初在奥斯威辛和在火车上从迎接我们的那些特殊犯人的口中听到过的那种奇怪语言,也多次传到过我的耳中。在布痕瓦尔德,对于帐篷营里的居民们来说是没有点名的，盥洗处设在露天，准确地说是在一片树荫下,它的构造其实和奥斯威辛的一样,但水池是石头的,最主要的是,管子的小孔里整天都有水流在向外淌着,或者至少是在往外渗透着。自从我到达砖厂的那一天起，我在这里第一次遇到了奇迹：如果我渴了,我就可以喝,甚至只要我想喝,就可以喝个够。布痕瓦尔德自然也有焚尸炉，但总共只有一个，而且我可以大胆地说，它在这里不是营地的目的所在，也不是其本质、灵魂及意义所在，还可以说，那里面只焚烧那些在集中营正常的生活环境下死去的人。在布痕瓦尔德最要小心对待的是石矿—— 估计这说法源自于那些老犯人们,并且也传到了我耳中。不过,他们还补充说,它现在几乎已不运营了,不像从前他们那会儿。我得知,此营地已运转了七年，然而这里还有一些人是从另一些更老的营地里转过来的，我听到其中有一个营地叫‘ 达豪 ’,还有叫‘ 奥拉宁堡 ’和‘ 萨克森豪森 ’的 此时我也理解了铁丝网对面的几个穿戴整齐、身上带有一两位、甚至三四位数字号码的长官见到我们后脸上所露出的那种微笑的宽容意味。我还得知，文化名城魏玛就坐落在离我们营地不远的地方,自然,它的盛名我在国内就学到过 众多在此生活并创作的人中,有一个人,他的那首以‘ 谁在深夜里顶风飞驰 ?’开

头的诗作我也背诵得出，据说我们营区内的某个地方有一棵树是他亲手种植的,后来它长得枝繁叶茂,旁边还竖有一块纪念牌,并有围栏将它与我们犯人们隔开，以便对它加以保护。以上种种情况使得我一点儿也不难以理解奥斯威辛的那几张脸庞 可以说,我也很快喜欢上了布痕瓦尔德。

蔡茨,准确地说是以这个地方命名的集中营,从布痕瓦尔德赶到那里，先要坐货运列车赶一夜的路，然后还要在军人们的陪同下，在良田齐整、屋舍井然的乡间国道上再步行二十至二十五分钟,就像我所亲身经历的那样。他们向我们保证说,现在的这个地方至少将是我们最终的定居地了，这是对我们之中的姓氏开首字母在字母表中位于 M 之前的人来说的,至于其余的人,他们的目的地则是一个因其历史名气之大而于我更为耳熟的马格德堡①劳动营。这些情况我们还是在布痕瓦尔德的时候得知的，那也是在第四天的晚上,在一个有弧光灯照明的、大得吓人的地方,由那些手中拿着长长的名单、担任着不同尊职的犯人们告诉我们的,让我感到痛心的是,这样一来我就得和许多男孩,尤其是和‘ 罗斯 ’最终分别了。他们就根据姓氏开首字母那不可捉摸的排序让我们坐上火车,而且也把我和其余所有的男孩都分开了,真遗憾。

可以说，再也没有比每到一个新的集中营都得经历一回恼人的疲惫感更折磨人和更耗人精力的了——继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之后,至少在蔡茨我也体验到了这一点。一到这里我就发现,蔡

①中世纪的城市法就是在该城诞生的。

茨集中营只是一个并不大的、有些穷酸而又有些偏远的乡下集中营。浴室，甚至于焚尸炉，我在这里想找都找不到，看来这些东西只有在比较重要的集中营里才会配备。这一地区也是单调的平原，只有朝营地的后方望去，才依稀可见蓝色的远山 我听到有人在说，那是“图林根山区”。有刺铁丝网直接就架设在国道边上，营地的四个角上设有四个岗楼。营地本身是四方形的，实际上是一大片土场地。对着大门以及稍远的国道的那个方向是敞通无阻的，其余三面则被一些同飞机库或马戏团的帐篷差不多大小的巨大帐篷所包围 长时间的点名、指挥、驱赶与推挤原来只是为了给所有的帐篷—— 按照他们的说法是“营房”—— 指定出未来的居民，并把他们排成十人一排的队伍。我本人也被裹挟到了其中的一个帐篷旁边，准确地说是后面一排最右边的一个帐篷旁边，这是就我们面对大门背靠帐篷而言的，我就是这么站着的—— 已经站了很久，浑身都已麻木，再加上这一天没完没了的精神负荷已变得越来越不愉快了。我试着用目光搜寻男孩们却毫无结果：我周围全都是陌生人。站在我左边的是一个瘦高个子，神情有些古怪，嘴里不停地喃喃念叨着什么，同时还有节奏地前后摆动着上身 而我右边的那个人则个头儿不高，有副宽肩膀，他消磨时间的方式是，每隔一段时间将便一小口唾沫准确地啐射到自己前方的灰土里去。他也在看我，一开始只是匆匆地瞟我一眼，第二回，他那斜视的、目光犀利的黑眼睛已经是在打量我了。他有一个小得可笑的、看上去简直像是没有骨头的鼻子，囚帽被他快活地歪戴着。“嗨，你是从哪儿来的？”第三回他开始向我打听，我发现，他前排的牙

齿全都没有了。我告诉他说，我是从布达佩斯来的。他一下子来了精神,马上就问了起来,大弯路还在不在,还有没有六路有轨电车,是否一切都像他“离家前的那样”。我对他说,自然都在,一切都还在。他看上去很满意。他还想知道,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说:“很简单。有人把我从公共汽车上叫了下来。”“然后呢?”他问。我告诉他,没别的了,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到这里来了。他似乎有些诧异,仿佛对国内的情况不是很清楚,我还想问他……但已经来不及问了,因为就在那一刻,我从另一面挨到了一记耳光。

实际上,我已经跌坐到了地上,方才听到了“啪”的一声,它的重量也开始使我的左半边脸燃烧了起来。一个人站在我面前，从头到脚裹着一袭黑色的骑马服，戴着黑色的艺术家帽子，有头发，肤色较暗的脸上还留着细窄的黑色短髭，浑身笼罩着一种让我吃惊的气味:毫无疑问,是真的香水的甜腻腻的气味。从他含混的叫喊声中我只能分辨出一个被多次重复的词“Ruhe”,即“肃静”。没错,他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大的官儿,胸前显赫的低位数号码、标有“Z”字母的绿三角和另一侧胸前的金属链子上垂挂着的银哨子，以及打老远就看得见的、胳膊上鲜明的白色字母“La”也都在强调着这一点。但我终归还是十分愤怒，因为我毕竟还不习惯于被别人打,不管他是谁,即便我只是坐着,只能通过面部的表情,但我仍尽量表达着这种愤怒。而且我认为,他也看到了,因为我发现,尽管他仍不断吼叫，但他那双仿佛游弋于油中的又大又黑的眼睛里的目光慢慢地有了越来越柔和的、到了最后几乎是为自己开脱的神情，同时它留意地滑过我的全身，从我的脚上一直滑到我的脸

上 :那是一种有些令人不舒服的感觉。随后,他从给他闪开道的人群中冲了出去，风暴般迅速，就如同刚才突然出现时一样。

我从地上爬起来后,右边的邻居马上问我:疼不疼?我有意抬高了声调说“:一点儿也不疼。”“那么,”他建议说“:你最好把你的鼻子擦一擦。”我把手放到那儿去一摸：果然，我的手指染红了。他向我示范如何把头向后仰过去,以便止住流血,对于那个黑衣人他评说道“:吉卜赛人。”沉思了一小会儿后,他又断定“:那家伙准是搞同性恋的。”我不大明白他在说什么，便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笑了一下说道“:就是搞鸡奸的!”关于这个词的含义,我想,我大概就比较清楚了“。顺便自我介绍一下,”他说着把一只手从侧面伸了过来“:我叫柠檬邦迪。”于是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

后来,我听他说,他是从劳动营转到这儿来的。他们一开战就把他召了去,因为他当时正好二十一岁,在年龄、血统、健康方面都符合服劳役的条件,四年来他还没有回过国。他还到过乌克兰,在那里扫过雷“。你的牙齿呢?”我问“。被他们打掉了,”他答道。这回轮到我诧异了“:怎么回事……?”他只说了句‘说来话长’,并没有过多地解释原因。总之,他‘和排长发生了争吵’,除了其他一些麻烦，他的鼻梁骨也是在那个时候被打断的——我从他那里听到的就是这些情况。关于扫雷,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了句:需要的是铲子、一根铁丝,还有运气——这是他的原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到最后由德国人接替匈牙利兵的时候“,惩罚连”里已经没有剩下多少人了。他们对这一变化感到很高兴，因为德国人马上许诺要让他们干比原先轻松的活儿，并要给他们比原先好的待遇。

他们坐上了火车，后来自然也在奥斯威辛下了车。

我还想再接着问下去，但就在此时，那三个人回来了。方才，也就是大约在十分钟之前，对于前面发生的那件事，我主要只注意到了一个名字，准确地说是前面许多人异口同声的呐喊：“柯瓦奇博士！”一个身体稍胖、长着一张软绵绵的脸、头上周围的一圈头发是被推子推光的而中间则是自然秃顶的男人谦卑地推辞着，然后好像只是屈从于这催促的喊声似的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剩下的两个人就是由他来指定的了。这三个人当即就与黑衣人一道离去了，此后消息才传到我这里，即后面这几排，实际上，我们是选举出了司令（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块长”）以及“室长”（由于柠檬邦迪不懂德语，所以我随口给他翻译为“房间服务员”）。现在他们想教我们几个口令以及一些相配套的动作，别人警告他们，他们再警告我们，说是以后不会再教我们第二遍了。这些口令中有几个，像“注意！”、“脱……帽！”以及“戴……帽！”它们的意思实际上我已经知道了，而我未曾听到过的是“整理！”——指的是整一整帽子，自然还有“结束！”听此口令后我们要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啪”的一声把手“放回到大腿外侧”去。所有这些我们后来都进行了多次练习。我们得知，块长在这种时候还有另外一项工作：汇报情况，他还专门在我们的队伍前演练了几次，并且由其中的一个室长——一个矮胖的、长着红斑的、有着一张略带紫色的长条脸的人扮演军人的角色。我听他用德语说道：“五营集合点名。应到250人，已到……”从这里我也知道了，看来我也是人数为二百五十人的五号营房的居民。经过几次重复后，每个人都认为，所有这一切

都已被理解得很清楚了,可以被完美地表演出来了。接下来,又是一段无事可做的时间,在此期间我注意到,我们帐篷右边的空地上有一个土堆，上面有一根清晰可见的长杆，可以猜出后面有个深坑。我问柠檬邦迪,依他看,这到底有何用途。“茅坑,”他只瞟了一眼便立即宣布。他还轻轻摇了摇头：原来这个词的含义我也不知道。“看得出来，在此之前你是一直待在你妈妈身边的，”——这是他的观点。但他还是用一句简单的话给我解释了一下。他还作了点儿补充：“嗯,等我们把它都屙满时,我们就自由了!”我笑了起来,而他却保持着严肃,那神情使人觉得,这是他真正的信念，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决心。但是,关于这一想法,他后来还是未能多谈,因为在大门口的方向,刚好一下子出现了三个军人严肃而异常考究的身影。他们正不紧不慢地、但就像在自己家中一般极随意地、底气十足地、由远及近地走过来，块长见状马上就高喊一声：“注意!脱……帽!”但他的声音里有了某种新的、某种激越的、高昂的色彩,这是我在演练时一次也没有听到过的。此时,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一样，他自然也一把将帽子从头上拉了下来。

⑥

在蔡茨我才明白,囚禁中也有平常的生活,甚至可以说,真正的囚禁其实全都是乏味的平常生活。好像我大约已经置身过这一类境况了,那就是在火车上,在去奥斯威辛的路上。当时的一切也都取决于时间以及每个人的各自所能。只是在蔡茨，还是用我的例子来说吧,我不得不感觉到 火车停下来了。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如此迅疾地呼啸奔驰着，以至于我已跟不上我面前、我周遭、甚至我自身的许多变化了,这也是事实。有一点我至少可以说 从我自身来讲,我走过的是完整的全旅程,凡是这条路上能够出现的机会，我都认真地尝试过了。

不管怎么说,开始接触一个新事物时,无论在哪里,即使是在一个集中营里,我们最初都是带着良好的意愿的,至少这是我本人的体会。我的观点是,暂时当一个好囚犯就足够了,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我的生活方式就是以此观点为基础的,其实这与我在其他人身上所普遍看到的情况是相吻合的。不言而喻，我很快就发现,我在奥斯威辛时所听到的关于劳动营机构的那些有利的看法也许是源自于一些夸张的消息。然而,对这些消息的夸张程度,尤其是对由此而得出的所有结论，我却没有马上（说到底，我也无法马上)就给自己作出一个完全准确的评估,我可以大胆地说,这又是与我在其他每一个人——即我们营里所有约两千名其他俘虏身上所发觉到的情况相一致的,自杀者自然不在此列。然而,自杀的事

例并不多见，不管怎么看都算不得规范，无论如何都不值得效法，这一点每个人都承认。这种事例我也偶有耳闻，我听到过，他们在争论，对此交换着看法，有些人明确表示不赞同，另一些人表示能理解，熟人们为之深表遗憾。然而，总的说来，每次都像是力图对一种非常少见、离我们很遥远、有些难以解释、或许有些轻率、或许还有些值得尊敬的，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匆猝的行动作出评价一样。

最主要的是，我们不能自暴自弃：不管怎样它总会存在，因为还从未出现过它不存在的情况——这是柠檬邦迪传授给我的知识，也是劳动营教给他的。在任何情况下，头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盥洗（在前面，在营地靠近国道一边的平行的露天水槽和扎了洞眼的铁管子旁）。同样重要的是，不管有没有，都要节约地分配口粮。无论这项规定对我们自己来说有多么苛刻，我们都必须把一些面包留到第二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甚至还得把一块面包留到吃午餐的时候，要保护住它，不能迁就于各种想掏口袋的念头，尤其是要约束住时不时发痒的手，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产生那些折磨人的想法：比如说，没什么可吃的。在此之前，我一直把我们衣物中的包脚布当作手帕用；点名时、行进中，永远都是站在队伍的中间才最为保险；即使在分汤的时候也不要往前去，而是要尽量靠后站，在那儿可以预先看到他们将给我们舀的是锅底儿，也就是说底料；我们还可以把勺子柄的一侧砸一砸当刀子用；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注意事项，全都是囚徒生活方面所必需的学问，都是我从柠檬邦迪那儿学到的、偷看到的，并

且自己也尽量仿效着运用它们。

有一点原本我是不会相信的,但它却是不争的事实:一定的生活方式准则,一定的示范性,也可以说是美德,显然在哪儿都不如偏偏在囚禁中那么重要。我们只消到一号营房附近看看就足够了,那儿住着一些老居民。他们胸前的黄色三角说明了一切最本质的问题,而那里面的字母“L”还顺便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他们是从遥远的拉脱维亚来的,我还得知,准确地说是从里加城来的。在他们中间可以见到一些奇怪的另类人物,一开始我险些吓了一跳。从一定距离之外看去,他们全都是些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脑袋蜷缩进脖子里,鼻子突兀而起,耸起的双肩上晃荡着肮脏的囚服,即使是在最酷热的三伏天里,他们的样子也总能够让人联想起永远瑟瑟发抖的冬日寒鸦。他们所迈出的每一个僵硬呆滞的步子都在问着这样一个问题:费这个劲儿到底还值得不值得?后来我得知,在集中营里,这些移动的问号(我再也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他们的外形或他们伸展开来的样子了)叫做“穆斯林”。柠檬邦迪马上告戒我离他们远点儿,他说:“看着他们,你连生活下去的兴趣都会失去的。”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明白了要到这一步,还必须具有其他许多条件。

首先得有固执这个工具尽管形式上不尽相同,但可以说,蔡茨在这方面也不匮乏,我发现,有时它对我们的帮助还很大。比如说那伙古里古怪的人,那个团体,那个种族,或者称他们为别的什么吧,其中有个人在队伍中是站在我左边的,他在我刚到这里时就令我觉得有些奇异。从柠檬邦迪那里,我知道了关于他们更多的

情况。我还听他说,我们管他们叫“芬兰人”。然而,如果你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那么他们在认为你还配得上他们回答的情况下就会回答道:“存①芬兰的明卡奇来的。”他们指的是蒙卡奇。或者是:“存芬兰的沙达拉达来的。”而这个回答你就得猜一番了,他们指的是沙多拉姚乌海伊。柠檬邦迪在劳动营的时候就了解他们这一类人了，并对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劳动时、队伍行进中、或者在点名的队列里，到处都能看到他们有节奏地前后摇摆着,喃喃地念着那永不枯竭的祷告词,就像在偿还某种永远清偿不了的债务似的。如果在此期间他们嘴角一咧悄声说道：“有刀子卖”,那我们就不予理会。如果他们说:“有汤卖”,那么无论这话多么具有诱惑力,尤其是在早上,我们就更不予理睬了。不管这事有多奇怪,但他们确实不喝汤,有时连香肠也不吃——凡是教规上不允许吃的东西,他们一概都不碰。你会问:“那他们靠什么活着呢?”对此柠檬邦迪会回答说:“永远犯不着为他们担心。”果不其然，因为能够看到，他们都活着。他们和拉脱维亚人在一起的时候,相互之间使用的是犹太人的语言,但他们还懂德语、斯洛伐克语,天晓得还懂些别的什么语言。惟有匈牙利语他们不懂,因为这自然不是与做生意有关的语言。有一次，我无论如何也没能躲开，很偶然地闯进了他们的突击队里。“Reds di jiddis?”②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我告诉他们说,很遗憾我听不懂,于是他们便不再理

①发音错误,“存”应为“从”。

②依地语，意为：“你会说犹太语吗？”

睬我，让我走了。他们看着我，就好像看到的是空气，或者更像是什么都没看见。我试着说话，想让他们注意到我，结果全都白搭。“Di bist nist ká jid, d´bist áségec,” ①他们摇着脑袋说。我只是惊讶地看着他们，据说这些人在商业方面很在行的，他们何以如此冥顽不灵地执著于一种给他们造成这么多损失和这么大亏蚀的行事准则，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它所造成的亏损已远远超出了它所带来的盈利。在那一天，我还体验到，置身于他们中间时，我有时又会产生那种我在国内曾感受过的、同样是令肌肤瘙痒的、既窘迫又笨拙的感觉，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东西不大对劲儿，好像我与正常的理想不大合拍，简言之，似乎我是个犹太人，却还是有这种感觉，这就有些奇怪了，毕竟是在犹太人的圈子里，在一个集中营里。

有时候，柠檬邦迪也会让我感到有些惊奇。不管是在劳动中，还是在休息时，我时常听到他唱他喜爱的那首歌，很快我也学会了，这首歌还是他从惩罚连里带来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在乌克兰的土地上起雷／但即使在那里我们也不会做胆小鬼。”尤其是最后一段我特别喜欢：“如果牺牲了一个战友、一个好哥儿们／我们会让人给祖国捎个信儿／不管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亲爱的美丽的祖国／我们绝不会对你不忠，绝不会。”不可否认，它很美，那忧伤、缓慢而非铿锵的旋律，以及整个这首歌的歌词无疑也感染着我，当然这只是因为它正好让我想起了火车上的那个宪兵，当时他提醒说，我们也是匈牙利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终究也是被

①依地语，意为：“你不是真的犹太人，你是个混蛋。”

祖国惩罚的。有一次我还对他提到了这一点。他没有找到反驳的理由,但他看上去似乎有些不自然了,可以说是有些恼怒了。而后在第二天的某个时候，他又开始极其投入地吹起口哨，哼起曲调，后来唱起了这首歌，仿佛什么也不记得了。他还有一个多次提到的愿望:他还要去"踩一踩勿忘我街的柏油马路",因为在国内时他住在那里。这条街道,甚至连门牌号码都被他那么多次地、变换着那么多种花样地说起过，以至于最后连我都熟知了它所有的魅力,连我也一心只向往着那个地方,尽管在我的记忆中它实际上只是一条偏僻的小街,位于东站附近的某个地方。他还经常说起,经常提及,并经常让我回忆起某些处所、广场、大道、房子,在这些地方的街面上，以及在各式各样的橱窗里闪烁着一些为大家所熟悉的标语、广告,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佩斯[①]的光色"。关于这一点我就得纠正他了,我不得不向他解释说,由于有了要求城市暗下来的规定,这些光色已经不复存在,而且炸弹也确实让市容发生了一些改变。他沉默了,但我发现,此番解释并不大对他的胃口。第二天,一有机会,他又说起那些光色了。

但谁又认识顽固的所有类型呢,可以说,在蔡茨,如果我能够选择的话，我还可以在许多种类型中进行选择。我听到过人们谈论过去和将来，尤其是次数很多地、相当多地听到过人们谈论自由,甚至可以说,看来,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偏偏像在犯人中间那么多地听到人们谈论自由,我认为,归根结底,这一点自

①布达佩斯的简称。

然也很容易理解。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会在一个文字游戏、一个玩笑、一个笑话中找到某种独特的欢乐。自然,这种情况我也听到了。每天从工厂下班回来后到晚点名之前,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段时间总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很放松,它总是我本人在营地里最盼望和最喜欢的一段时间,此外,它一般也同时是吃晚饭的时间。当我正努力穿行于在院子里谈生意和闲聊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时候,一个人撞到了我身上,一顶大大的囚帽下面有一对焦虑的小眼睛在看着我,这双眼睛长在一个特有的鼻子上方,长在一张特有的脸上。“咦,”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因为他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他:倒霉的人。他立即显得非常高兴,还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五号营房。“可惜,”他表示了遗憾,因为他住在别处。他抱怨说,他“看不到熟人”,当我告诉他,我也看不到时,他不知为什么变得忧伤起来了。“我们迷失了,我们全都迷失了,”他摇着头说道,在他的话语和他的摇头动作中包含着某种对我来说还有些模糊的意义。此后,他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开朗了起来。他指着自己的胸口问我:“你知道这里的这个字母 U 代表什么意思吗?”我对他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是 Ungar,也就是匈牙利人。“不对,”他回答说,“是 Unschuldig,即无辜者。”他笑了起来,随后还带着一副沉思的表情颔首良久,似乎此想法令他颇为受用,但我却不明白是为什么。同样的情景我后来还在其他一些人那里看到过,他们也给我讲了这个笑话,最初一段时间,营地里时常听得到它:人们仿佛从中汲取到了某种能够带给人温暖、予人以力量的情感,至少每当他们在说起和听到这个笑话时所发出的那种始终如

一的笑声，以及随后出现的那种始终如一的因带着苦涩的微笑在欣赏品味某种东西而变得很温柔的脸部表情（有些像我们在倾听一首动人心弦的乐曲或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时一样）都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我看到，他们身上同样也有那种努力，同样也有那种良好的意愿：他们也一心只想做个好囚犯。自然，这是我们的利益之所在，这是环境的要求，这也可以说是这里的生活所使然。比如说，如果队伍排列得整齐划一，人数也对得上号的话，点名的时间就能短一点儿，至少在起初是如此。又比如说，如果我们干活干得卖力的话，我们就能够避免挨打，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

然而，至少在最初，我认为，还不全是这个好处，还不只是这种利益在指导着我们所有人的思想，我可以凭良心地这么讲。就拿这儿的工作和第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来说吧：任务是卸一车皮灰色的砾石。自然，经过看守——一个已经不年轻的、第一眼看上去挺面善的军人的同意后，我们脱下了衣服，这时我也第一次看到了柠檬邦迪的黄棕色皮肤和在皮下运作着的平滑的大块肌肉，以及他左胸下的一块颜色较深的胎记，如果他说："嘿，让这帮人瞧瞧咱佩斯人的本事！"那么他是当真的。这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手握铁叉，但即便如此，我仍可以说，我们的看守，即那个时不时过来瞅瞅、外表像个泥瓦匠领班、肯定是厂里的雇员的人，看上去似乎也感到相当满意，这自然只会更加激发我们的干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的手心有了一种火辣辣的感觉，我看到我的指根全都是血，如果此时我们的看守用德语问："到底出了什么事？"而我却笑

了起来,并让他看我的手掌,他看到后忽地把脸沉了下来,并且还把步枪的皮带扯了一下,说道“: 干活 赶快动手吧 !”那么我本人的兴趣最终也就很自然地转移到别的方向去了。打这以后我只注意一点：在他没有看着我的时候，我如何能够偷偷休息上一小会儿,怎样才能尽量给铁铲、铁锹、铁叉上少放一点儿东西,可以说，后来在耍弄这一类的花招方面我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在这上面获得的本事、学识、经验要比在任何一项工作中所获得的多得多。但这又于谁有益呢？——我记得,这还是有一次由一位‘ 专家 ’提出来的。我断言 这里出了什么问题,这儿存在着某种障碍、某种毛病、某种失误。表示赞赏的一个词语、一个信号、这儿那儿忽现的一束光亮,不用太多,至少对我来说,只要一个火花就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实际上,要是仔细想一想的话,我们个人之间又有什么怨仇呢 ?即使在囚禁中,虚荣心也还是与我们同在的。说到底,谁不偷偷在心里渴望别人对自己有一点点亲切的表示，况且我认为，体谅的话语所起到的效果要好得多。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一类的经历还不能够真正动摇我。连火车也在前进,如果向前看,我还能够猜到目的地就在远处的某个地方,最初一段时期(我和柠檬邦迪后来把它称作黄金时代),在具备了必要的生活方式和一些运气的情况下，蔡茨还是一个很可以忍受的地方,自然是指目前而言,临时是这样,直至将来我与之诀别为止。每周有两次是发半只面包的,三次是发三分之一只,而发四分之一只面包的时候只有两次。经常会有“ 津贴 ”。每周吃一次煮土豆(六个,盛到帽子里,可想而知,这种时候就不会有‘ 津

贴 ’了),每周吃一次牛奶面片。早早被叫醒的气恼会因那含着露水的夏日黎明、晴朗天空以及冒着热气的咖啡而很快就被人忘却(这种时候你在茅坑那儿动作要敏捷些，因为很快就会响起叫喊声“集合 !”“开工 !”)。早点名的时间总是比较短,因为终归有工作在等候着,催促着。从国道往左拐,走上一片沙坡,在距离我们的营地步行约十至十五分钟的地方是工厂的一扇旁门，是我们和犯人们都可以通行的。大老远就听得到机器的轰鸣声、叮叮当当和突突突突的响声,以及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与那些铁喉管清嗓子的干咳声 这是工厂在问候我们。纵横交错的道路,动作慢条斯理的起重机和掘土机,由许多的轨道、排烟筒、冷却塔、管网、厂房所组成的迷宫，这一切使工厂看上去更像是一座真正的城市。遍地的坑凹、深沟、废墟、瓦砾堆、大量被炸开的管道和暴露出来的缆线证明飞机曾光顾过这里。在第一次午饭时间里我就得知了，它的名字叫‘ 布拉巴格 ”,据说这是‘ 褐煤汽油股份公司 ’的缩写,是“ 从前在证券交易所也登记过的缩略名称 ” 。人家还指着一个胖子让我们看,他已累得气喘吁吁,正用胳膊肘支撑着身体,从口袋里往外掏出一块已咬过的面包，消息就是从他那里传出来的。后来,在营地里,人们议论起他的时候总是带着某种喜色,说他从前也拥有过这里的几张股票，不过我却从未听到他本人说起过这件事。我听说（可能也是因为这儿的气味立刻让我回想起了切佩尔的油库吧），这里也是在生产汽油，然而却不是从石油中提炼的，而是借助于某种创意从褐煤中提炼出汽油来的。我认为这创意很有意思,但我自然也明白,他们并不是要我来做这种事情的。劳动

突击队的工作机会总是一个令人激动的问题。有的人认定铁锹，有的人瞅准铁镐,一些人认为埋设电缆是个好活儿,另一些人则更乐意伺候搅拌机。天晓得到底是什么隐秘的理由，是何种可疑的喜好，竟会让一些人偏偏对管道工作情有独钟地置身于齐腰深的黄泥或黑油里,但谁也不怀疑这样一种理由的确是存在的,因为这些人大多是拉脱维亚人以及同他们志趣相投的朋友们——芬兰人。“集合”这个词一天当中只有一次是带着伤感的、拖得长长的召唤音调从高处降落下来的 那是在晚上,它告诉我们下班了。在熙熙攘攘的盥洗处附近,柠檬邦迪大叫一声“:闪开,穆斯林们①!”一边挤出一块地方来，我身上没有哪个部位可以逃脱他监督的目光“:把你的那个命根儿也洗一洗,那儿住着虱子,”他说道,我笑着听从了他的话。这时开始了那一小时 处理各种杂事、开玩笑或发牢骚、走访、谈事情、谈生意以及交流信息的一小时,只有那些大锅子发出的充满家庭气氛的叮当响声才能把它打断，因为这是一个会把每个人都调动起来并激励每个人都迅速行动的信号。然后是“:点名!”至于到何时为止,那完全是运气问题。一两个小时后,嗯,至多不过三小时之后(在此期间探照灯也已经亮了起来),帐篷里狭窄的小路就已经变得拥挤不堪了 ——路的两旁各有一长溜儿三层高的箱子,是这里叫做‘床箱’的床铺。此后还有一段时间,整个帐篷笼罩在半昏暗与悄语声中 ——这是交谈的一小时,谈过去,谈未来,谈自由。我得知,这里的每个人在国内都过着标准

①对集中营里固守正统犹太教教义的拉脱维亚人的一种戏称

的幸福生活,而且大多很富裕。这种时候我还可以了解到,他们晚饭一般都吃些什么，有时甚至还可以听到其他一些在男人们中间谈论的私密话题。那时他们还说起,据一些人的猜测,汤里被人出于某种原因掺进了一种镇定剂,是‘ 溴化物 ”,这话后来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但至少当时他们是这么说的,说时脸上还带着彼此会意的、每每有些神秘的表情。柠檬邦迪在这种时候也必定会提及勿忘我街、光色,或者就谈论‘ 佩斯的女人们 ”—— 也主要是在最初一段时期，而对此我自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可发表的了。另一次,我听到了帐篷一隅传来的可疑的喃喃祈祷声和音调拖得老长而又搀杂着呃逆的轻轻的歌声,还看到了昏黄的烛光,我听人说,这是星期五的晚上,那边的那个人是一位牧师,即拉比。我爬过许多床铺,爬到那跟前朝下一看,站在一群人中间的果真是他——我所认识的拉比。他就那么穿戴着囚服囚帽在做祷告,我没有注意他太久，因为我更想睡觉而非祈祷。我和柠檬邦迪睡在最上面的一层。我们还要和另外两个寝伴儿分享床箱,他们两人都很年轻,很招人喜爱,同样也都是布达佩斯人。床铺是木板的,木板上铺麦秸,麦秸上再铺麻袋布。毯子两个人合用一条,但在夏天盖毯子毕竟有点嫌厚。我们的地方可算不上宽裕得要命 如果我翻身,邻居也得翻身,如果邻居把腿蜷起来,我也得把腿蜷起来,但即便如此, 梦也是沉沉的、令人忘却一切的,没错,那真是一段金色的时光。

稍后,我发现了一些变化——首先在口粮方面。我和我的伙伴们只能猜度，每顿有半只面包吃的日子为什么这么快就飞逝而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再也无法收回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只面包

的时代，连“津贴”也不再是每次一定有的了。这时火车开始减速，到最后已经完全停了下来。我试着向前看，但前景只能在明天,而明天又是这一天,或者说又是一个这样的日子——当然是在幸运的情况下。我的兴致在减退,劲头在减退,每天起床时我都感到有一点儿更困难了，每天安歇时我都觉得有一点儿更疲惫了。我有一点儿更饿了,活动起来有一点儿更勉强了,一切都开始变得更沉重,我自己也开始变成了自己的负担。我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已不再一直当好犯人了，这种迹象我们自然也很快就在军人的身上，以及我们自己的长官的身上发现了，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是“营长”——仅从其地位来看也该如此。

他仍是老样子,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总是一身黑色。早上是他吹响起床哨，晚上是他对一切进行最后的检查。关于他在前面某处的住所,人们有很多议论。他会讲德语,有吉卜赛血统,因此我们私下里都管他叫“吉卜赛人”,这也是他们在集中营里给他指定了居留地的第一条原因。第二条原因是他本性中还有一个背离正常范例的特质,这也是柠檬邦迪一眼就断定的。然而,那三角形的绿颜色却提醒着每一个人，他抢劫并杀死了一个据说比他年纪大的女人。此外,据说她还很有钱,他实际上是靠她养活的。这么说来，我是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真正的抢劫杀人犯。他的职责是主持法度，他的工作是在我们营里维持秩序和正义——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这事乍一听可不是什么特别亲切的。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看到，细微的差别可能在某个点上相互混淆。比如对于我本人来说，其中的一个“室长”带来的麻烦要更多一

些,而此人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正因为此,那些老熟人才选举了他,同样也是这些人选举了“块长”、柯瓦奇博士(我得知,这一称谓在此代表的是律师而非医生),我听说,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希欧福克乡的美丽的巴拉顿湖区。那个长着红斑的人就是他,每个人都知道,他名叫福多尔。大家有一个一致的看法,但不知正确与否:“营长”使用他的棍子或拳头是为了取乐,至少营地里的传言是这么说的,因为据一些经验丰富的人的说法,这样做能够给他带来某种享受、某种和那有关的东西,那种东西是他在男人和男孩那里,但有时也会在女人那里所寻找的。而在此人看来,如果他出于不得已(这一点他也从不忘提及)而碰巧采取类似的做法的话,那么秩序并不是借口,而是真实的条件,是普遍的利益。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秩序从来也没有整顿好过,而且越来越不井然了。于是他被迫用汤勺的长铁柄朝那些在队伍里乱挤的人身上打过去,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走到大锅跟前,并把盆子准确地放到锅沿的某个指定位置上去的话,我们就可以走到那些遭了殃的人的位子上去。此时他们手中的盆子和汤就会轻而易举地飞出去,他身后就会响起一片低沉的赞同声,因为挨打的那些人耽误了他的工作,进一步说是耽误了我们这些排队的人,因此他才抓住那些瞌睡虫的脚,把他们都拖了下来,否则,一个人的罪责最终就会由其余无辜的人来承担了。我明白,差别自然要在意图中寻找,然而在某一点上,我说,这种细微的差别可以变得很模糊。至于结果呢,不管我怎么去看,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除了他们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戴着黄袖章、穿着总是熨烫得一

丝不苟的条纹衫的德国监工，幸好我见到他的次数并不多。后来，我吃惊地发现，我们的队列中也开始有几个戴着上书较为谦卑的“工头”字样的黑袖章的人了。我们营房里有一个人在此之前给我的印象并不大突出，而且在我的记忆中，其他人也并不认为他有多么了不起、多么知名，但他却是个身强力壮的人。当他第一次带着崭新的黑袖章出现在领取晚饭的队伍中时，我正好也站在那里。此时我发现，他再也不是先前那个不知名的人了：朋友们、熟人们都快挤不到他跟前去了，从四面八方传来了因其升迁而表示高兴、贺喜、祝福的话语，无数双手向他伸了过去。我看到，有些人的手他接受了，而另一些人的手他却没有接受，这些人见状也就连忙溜开了。接下来才有了那个至少在我看来是最隆重的一刻：在普遍的关注下以及某种肃然起敬的、近乎神圣的静默中，他独自一人极其端庄地、不慌不忙地，于关注或嫉妒的目光的交汇处走上前去领取第二份口粮，如今这已是和他的职位相配的了，并且这回“室长”已经根据同等权利者应享有的特别待遇从锅底舀给他了。

另一次，来了一个迈着方步、胸脯鼓鼓的人，我立刻认出他来了：奥斯威辛的军官的胳膊上的字母在我眼前晃动着。有一天，我还落到了他的手下，我可以说，他在工作刚开始时说的那番话倒也是真实的：他能够为一个好部下赴汤蹈火，然而对那些游手好闲之徒、那些让别人替自己从火中取栗的人来说，他这里是不会有月桂树①的。因此，第二天我和柠檬邦迪还是溜到另一个突击队去了。

①用月桂树枝编织成的桂冠是荣誉的象征。

还有一个变化也映入了我的眼帘,而且有意思的是,它主要体现在外人,比如说工厂里的人、我们的看守,或者顶多体现在我们营地里个别长官们的身上:我发现,他们变样了。至少在我眼里,他们似乎变得特别好看了,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来解释这一点。后来从一两个迹象中我才明白:是我们变了,只不过这一点自然比较难以发现。比如说,如果我看一眼柠檬邦迪,在他身上我看不出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如果我试着回忆他第一次出现在队列中并站在我右边时的样子,或是在劳动中第一次呈现在我眼前的他那身犹如自然课本附图般鼓出来和陷进去的、柔韧地弯曲着或硬邦邦地绷紧着的、上下滚动的肌腱和肌肉,前后比照一下的话,那我就确实有点儿不敢相信了。这时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看来,时间有时会欺骗我们的眼睛。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没有注意到一个完整家庭的这一变化过程,譬如柯尔曼的家庭。然而,变化的结果却是很容易衡量的。营里每个人都认识他们。他们来自某个叫做基什瓦尔达的地方,这里还有很多人是从那儿来的,从这些人同他们讲话的方式和谈及他们时的神情,我推测得出,他们在国内一定很有名望。他们一家有三个人:身材瘦小的光头父亲、一个大儿子和一个小儿子。两个儿子的面孔长得一点也不像父亲,但兄弟间却长得极为相像,都长着一模一样的金色胡子碴和一模一样的蓝眼睛,我想大概是像母亲吧。三个人总是走在一起,只要一有可能便手牵着手。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父亲时不时会落在后面,两个儿子得帮着他,抓住他的手,拖着他走。又过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已不在他们中间了。而没过多久,那个小的也得让大的这

么拖着走了。再后来，小的一个也从大的一个的身边消失了。于是，那个大的只是拖着自己的脚在走了。最近，我连他也见不到了。我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察到了，但如果我再深思一下的话，当时实际上并不像现在这样似倒片般地把一切都倒卷回去，以便在事后能把它总结出来,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觉察,并一次又一次地适应新的程度的，这样一来我实际上还是没有觉察到。然而，看来我自己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一天我正好看到“ 皮艺匠 ”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很随意地从厨房的帐篷里走出来（我知道他在那里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令人嫉妒的削土豆皮的好工作），他一开始无论如何也认不出我来了。我向他证实说,我就是‘ 壳牌 ’的那个我,并问他,会不会碰巧能有点儿什么可吃的东西,比如说剩饭、锅底儿之类的,因为他毕竟是在厨房里打工的。他回答说,他去找找看,还说他本人倒是没什么要求,但他问我有没有烟,因为厨房的工头‘ 为了香烟简直快要发疯了 ”。我坦率地回答说没有,于是他走开了。没过多久我就明白,再等下去也徒劳无益,友谊亦非无极物，看来，生活的法则已为友谊划定了界限——这其实也很正常,自然是这样的。另一次,我却没有认出一个奇怪的人,当时他正跌跌撞撞地朝那个疑是茅坑的方向走去。他的囚帽滑到了耳朵上，脸上净是凹坑、尖峰和棱角，鼻子发黄，鼻尖上颤动着水珠。“ 奶油小生 !’我叫他,但他却连头也不抬一下,只是拖着脚步,一手提着裤子,继续往前走去。我在想,还真是的,这原本我也不会相信。还有一次,我想,我看到的是那个吸烟的男孩,只不过他变得更黄更瘦了,眼睛变得更大了,目光却变得更狂热了。这段时间

里，在晚点名和早点名时，块长的汇报中出现了那个后来变成经常出现的、只是总在数字上有点变化的说法：“两个在病房里”，或是：“五个在病房里”、“十三个在病房里”，以此类推。随后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离开”，意思是指缺席、减员、淘汰。不，在某些情况下，任何良好的意愿都是不够的。还是在国内时，我就曾读到过，假以时日，再加上一定的努力，即使是囚徒生活，人也是能够适应的。我不怀疑，这也是有可能的，譬如在国内，在一个规范的、正常的、那种平民式的监狱里(或者用别的什么词来形容它)。只是在一个集中营里要做到这一点，根据我的体验，还真是没有什么可能性。我可以斗胆断言，至少我身上并不乏努力，也不乏良好的意愿，问题是他们压根儿就不给人以充分的时间。

我知道，在一个集中营里有三种逃逸的方式或方法，因为我曾见到过、听说过或亲身体验过它们。我本人使用的是第一种方式，我承认，它或许是最不起眼的一种方式，但我所学到的是，我们的本性中有一个领域终归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拥有的、他人所侵夺不了的属地。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的想像即使在囚禁中也保持着自由。譬如说，当我的手摆弄着铁铲或铁镐的时候，我可以做到节约分配体力，总是只做最必要的动作，而自己却好像根本就不在场似的。然而，想像也不是完全无止境的，或者至少说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是无止境的，这是我的体验。因为说到底，劳同样的神儿，我可以到达任何地方，例如，加尔各答、佛罗里达，乃至世界上最美丽的所在。然而，这毕竟不够真实，可以说，我还是不能相信，这样一来大多数时候我都发现，自己只在家中。自然，这也并不比

我在加尔各答之类的地方现实多少，只是我在这儿就能找到一些东西,即某种素朴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工作,它能够抵消我的劳神,由此也仿佛立即印证了这劳神似的。譬如说,我很快就意识到,从前我没有正确地生活,我没有很好地利用在家的日子,我有很多值得后悔的地方,真是太多了。比方说,我还记得,有时我在一些饭菜中挑挑拣拣,乱拨一通,之后把它们推到一边,仅仅是因为我不爱吃，此刻我却发现这是一个不可理解而又无法挽回的错误。还有在我爸爸和我妈妈之间的那种无谓的扯皮也都是因我而起的。有朝一日,如果我回家的话(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使用的也就是‘ 回家 ’这个简单直白的词语),那么路上连停也不会停一下的,就像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而只在意这个最自然不过的事实所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有朝一日,如果我回家的话,我无论如何也要了结此事，要有和平。我这样决定了。在国内时还有一些事情,我曾经因它们而感到心烦意乱,不管有多么可笑,甚至还因它们而感到害怕,比如说,害怕某几门功课,害怕这些课的任课老师,怕他们提问时我答不上来,最后是怕我爸爸,怕向他汇报成绩。现在我时不时回忆起这些曾让我害怕的事情，仅仅是为了在眼前想像着它们,从头至尾再体味一番,并微笑着把这当成一种娱乐。但作为一种我最喜欢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想像着待在家里的某个完整的、毫无缺欠的日子,尽可能是从早到晚的一天,想像时每每仍执着于素朴性。其实,花费同样的力气我甚至可以想像某个很特别的、很完美的日子,但我通常只想像某个糟糕的日子 早上很早就得起床,得上学,要紧张地学习,要

吃差劲的午饭,其中还有许多机会是我当时所错过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发觉的,我还犯过不少错误,可以说,现在在集中营里我都尽可能完美地把它们修复了过来。我听说过，现在也得以证实了这一点：真的，狭小的牢房无法给我们的想像圈定一个翱翔的界限。但想像的缺点是,如果在此期间它把我带得太远,以至于我忘记动用双手的话，那么毕竟就在眼前的这个现实很快就会找到最有力、最坚决的理由让我重新感知到它的存在。

从这段时间起，我们的营里开始出现早点名人数对不上号的情况。今天，我们旁边的六号营房里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每个人都很清楚,这种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集中营里的起床令只叫不醒那些已经再也不可能被叫醒的人，而这些人就躺在那儿。这就是逃逸的第二种方式。谁能保证没有被它诱惑过一次，至少一次呢,尤其是在早上,当我们醒来见到,不,不是见到,是意识到又一个新日子已降临,帐篷里已很喧闹,周围的邻居们已经在收拾东西时,谁能保证自己总是那么坚定不移呢?我本人就不能,而且要不是柠檬邦迪不断从中阻挠的话，我一定会尝试一下的。说到底，咖啡并不是那么重要，而到了点名时我们已经在那里了——人们是这么想的，我也这么想过。我们自然不会待在自己的铺上（毕竟谁也不会这么小孩子气),而是同其他人一样正常地、规规矩矩地起床,然后……我们知道一个地方，一个万无一失的角落，对此我们敢以一百赌一。我们已经在昨天或更早的时候就找到了、发现了、看见了它,是偶然发现的,当时既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任何意图，只是在我们自己心里设想着。现在我们想起来了。比如说，

我们爬到最底下一层床箱的下面。或是我们找到这个百分之百安全的缝隙、拐弯、凹处,这个保险的角落,然后我们在这里用麦秸、干草、毯子把自己掩盖好,在此期间脑子里不停地想着,点名时我们自己也已在那儿了——我说,有一段时间,我对此相当理解。大胆一点儿的甚至还可以这么想:少一个人也是混得过去的。比如说,他们数错了,因为终究我们都是人;今天,惟有今天例外,只缺一个人不一定就很触目,而到了晚上,我们就会让人数对上号的。还有更胆大的想法:在那个保险的地方,别人不管用什么手段都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们的。但真正铁了心的人连这个都不考虑,因为这些人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能睡上一个小时的好觉,冒任何风险和付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的。

但人家不大会给他们这么多的时间,因为早上一切都在快节奏地进行着。瞧,搜寻者们的队伍已经匆匆形成了:站在最前面的是身穿一袭黑衣、脸刮得光光的、蓄着神气的小胡子、身上散发着香味的“营长”;德国监工紧随其后,再后面的是几个“块长”和“室长”。棍子、棒槌、弯把手杖全都在手上准备好了,一行人径直拐进了六号营房。从那里面传出了一阵混乱的喧哗声。几分钟后,搜寻者们已经发出了大获全胜的欢呼声:“嘘,别出声!”其中还夹杂着吱吱的叫声,那声音越来越细,到最后完全停息了下来。猎人们很快也出来了。他们把从帐篷里带出来的东西——从这里看过去已经是像一大团乱七八糟的破抹布似的一堆一动也不动的死东西扔到了队列边上,让它横躺在那儿。我努力不斜眼去看它。然而,一两个断裂的肢体,一两个即使是这样也能辨认得出的轮廓、

特征和让人回忆的标记仍吸引着我，并强迫着我把目光转到那个方向，我认出来了，他就是从前的那个倒霉的人。随后是一声命令“: 劳动突击队集合 !”我们等着瞧吧 军人们今天会更严厉的。

最后是逃逸的第三种方法,也是最符合字面意义的、真正的方法,看来也是可以考虑的,在这方面我们营地里也有过一例,是唯一的一例。逃跑的是三个人，三个都是拉脱维亚人，都极富经验，精通德语,熟悉地形,对自己的行动都很有把握。消息悄悄传了开来,除了赞同,除了私下里对我们的看守们抱有幸灾乐祸的心理之外,有些人甚至表现出了好奇,开始思忖如何效法他们,掂掇着各种可能性,但在这最初的躁动过后,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他们感到相当气愤。大约已经是夜里两三点了，我们却还在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惩罚、仍在晚点名的队列中站着,说得更准确些是摇摇晃晃地站着。第二天晚上，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又竭力不朝右看，因为那儿放着三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三个人,或者说是三个类似于人的东西。至于具体地说他们所展示的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他们脖子上挂着的纸牌上写着的那些粗劣的大字又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还是不感兴趣为好（但即使是这样，我也获悉了这一告示的意思,因为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营地中人们还时常提起这句用德语写出来的话“: 乌拉,我又回来了 !”)。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一个临时搭起来的东西—— 一个有点儿像国内后院里放的那种掸尘架的架子,上面有三根绳子,绳端结着圈——我明白了,看来它是绞刑架。晚饭自然是提都不用提了,立即是‘ 集合 !”,然后是“ 全营注意 !”;‘ 营长 ’就在前面声嘶力竭地亲自指挥着。行刑队

的那一班人马都到齐了，又等了一会儿军方代表们也出现了。此后的一切都是按着那一套程序进行的。幸好刑地离我们很远，在前面的盥洗处附近，我也没往那儿看。我注意的是左边，因为从那儿忽然传来了声音，是一种喃喃的祷告声和一种哼曲调的声音。我看见了队列里的一条向前伸出的细细的脖颈和它上方的那颗微微发抖的脑袋，实际上看到的主要是一个鼻子和一双此刻几乎是沐浴在某种不可思议的光芒中的、湿润的大眼睛；他就是拉比。他的话我很快也听明白了，极为明白，因为队列里有许多人渐渐地都仿效起他来了。譬如所有的芬兰人，但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不知通过何种途径，它甚至已经传到并吞噬了临近的及远处的营房，因为我发现那里也有越来越多的翕动着的嘴和越来越多的谨慎地、幅度不大却又动作坚决地前后摇摆着的肩膀、脖子和头。与此同时，队列中的这喃喃祷告声虽轻得刚能听到，却如同某种发自地下的深沉声音一般持续不断地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Jiszkadal，vö-jiszkadal”——这个连我也知道，这叫“kaddis”，是犹太人为死者所作的祷告。也许，这也不过是一种固执，是固执最后的、唯一的、或许是(我不得不明白)有些被迫的、可以说是规定的办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则是裁定了的、就像是判罚的、同时又是无用的办法，因为这祷告并没有给前面的刑场带来任何变化——除了绞刑架上那几个人最后的几下抽搐，什么也没有动，什么震颤也没有发生。然而，我还是得理解那种感觉，拉比的脸在此时简直是净化了，在它的力量的作用下，拉比的鼻翼也在奇怪地翕动。此时此地仿佛是他迎来了那个盼望已久的时刻，那个胜利的时刻，关于它的到来，

我记得,他早在砖厂的时候就谈到过了。果不其然,此时我也不知为什么头一回感到自己仿佛缺了些什么,甚至有一丝嫉妒,此时我头一回感到有些遗憾，为自己不能够像他们一样用犹太人的语言祈祷而感到遗憾，哪怕只会几句也行。

然而,无论是固执、祈祷,还是各种方式的逃逸,都不能使人摆脱掉一种东西——那就是饥饿。在家时我当然也曾有过，或者说我曾认为我有过饥饿的感觉;在砖厂、在火车上、在奥斯威辛,甚至在布痕瓦尔德,我都曾有过饥饿的感觉,但像现在这种如此持续长久的饥饿感我还从未体验到过。我变成了一个洞,一个空洞,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奋斗都是为了要消除和填塞住这个越来越贪得无厌的无底的空洞,使其停止叫嚣。我的眼睛只供此用,我所有的理智只服务于此目的，我一切的行动只听从它的指挥。如果说我没有吃过木头、铁块或砾石,那只是因为这些东西既嚼不烂也消化不了。但我已经试吃过沙子,一旦看见草,我是绝不会犹豫的,遗憾的是，无论在工厂里还是在营区内，草都很难见到。一个小小的、尖细的洋葱的价格为两片面包,那些有办法的幸运儿还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甜菜和大萝卜。我本人一般来说更喜欢后者，因为它的汁儿多些,而且个儿也大一点,但那些懂行的人认为,论营养价值和能量，还是甜菜中的含量高。既然大萝卜那坚韧的肉质和辛辣的滋味更难以令我抗拒的话,谁还会去挑三拣四呢?至少,只要看到有人在吃东西,我就会感到满足,也能从中得到些许安慰。我们的看守们的午饭总是有人给他们送到厂里来的，我的目光绝不离开他们片刻。然而,我却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太多的欢乐:他们

吃得很快,连嚼也不嚼就三下两下地胡乱吞咽下去了,依我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另一次，我在一个车间的劳动突击队里干活，那里的师傅们是自己动手打开从家中带来的午饭包的。我记得,当时我久久地看着一只长满大骨节的黄色的手,看着它是如何从一只细长的瓶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出那些长长的绿豆角来的,我承认,自己也许同时还带着那么一点儿不确定的、某种朦胧的希望。然而，这只长满大骨节的手只管自顾自地继续在瓶子和嘴巴之间不断来回往返着，它上面的每一个骨节以及它的每一个接下来的动作我都很熟悉了。过了一段时间后，连这些动作也被他的后背挡住了,因为他转过身去了。我当然明白,这是出于人之本性。我多么想告诉他,尽管吃吧,接着吃吧,因为对我来说，能够看到这幕情景也很不错了,在某种意义上,它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昨天,我头一回从一个芬兰人手中买了土豆皮,有整整一饭盆之多。他是中午休息那会儿把它拿出来的，动作故意做得不紧不慢,幸运的是那天柠檬邦迪没有和我在一个突击队里,要不然他肯定会缠着我跟我要的。他把它放到自己的跟前，又掏出来一个破纸包儿,从里面刨出些粗盐来,这些事儿他磨磨蹭蹭地做了好半天,还用指尖往嘴里送了一点儿,品尝了一小撮儿,末了,他只转过半个脸儿来,冲我说了句“: 出售 !”它的价格一般是两片面包或一块人造黄油,但这回他跟我要一半的晚餐汤。我试图还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还提到了公平。“ 你不是真的犹太人,你是个混蛋， ” 他用芬兰人那种习惯的方式摇着头说了一句依地话。我问他“: 那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 我哪儿知道 ?”他耸了耸肩。

我对他说“：该死的犹太人！”“那我也不会便宜卖给你，”他答道。最后我还是买下了他的土豆皮，是按照他开的价买下的，一点儿也没便宜。晚上，正当人家给我舀汤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冒了出来，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提前得知了今天的晚饭是牛奶面片的消息的。

我可以断言，某些概念只有在集中营里我们才能够完全理解。例如，我小时候读到过的那些蹩脚的童话故事里常会有一个“流浪汉”或“穷小子”之类的主人公，为了向公主求婚，他决定为国王效劳，他非常高兴，因为总共只用服役七天。“但七天在我这里就是七年！”国王对他说。这句话我也可以同样用于集中营。比如说，我本来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自己这么快就能变成一个干瘪的老头儿。在家里这需要时间，至少要五六十年的时间，而在这里三个月就足以使我精力衰颓。可以说，再没有比日复一日地跟踪记录自己身体里又有多少东西死去了更痛苦、更寒心的事情了。在家时，虽说我没有过多地关注过自己的身体，但一般我总能与它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可以说，我是喜欢这套机器的。我还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那个阴凉的房间里读着一本刺激的小说，边读边用一只手舒服地抚弄着肌肉紧绷的、被阳光晒成棕色的大腿上那长着金色汗毛的润滑皮肤。同样是这个肌肤，现在却皱巴巴地松垂着，色黄而干枯，上面布满了各种脓疮、环形褐斑、裂口、裂缝、疙瘩、鳞屑状斑，尤其是我的指缝间奇痒难忍。“疥疮，”柠檬邦迪看到后就懂行地点着头说。我只是瞪大眼睛瞧着，我大腿上的覆盖物，即那有弹性的肌肉与皮肤正以一种失去控制的疯狂速度在一

天天地减少、消蚀、失去。我的身体一度曾是我的好朋友,现在在这个越来越古怪、越来越陌生的东西上，每天都有某种新的毛病、新的丑恶景象让我感到吃惊。我已不忍目睹，每次看见它都会使我产生某种绝望惊骇的感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已不脱衣服,不盥洗了,这样也省得我不情愿地花费这番力气,也免受了那份寒冷,此外,这其中自然还有那双鞋的缘故。

这个工具没少让我恼火。总的来说，对集中营里发给我的这些衣物,我无法感到满意,它们实用性不强,而毛病颇多,甚至于直接衍变成了各种麻烦的源泉,可以肯定地说 它们压根儿不行。譬如,细雨蒙蒙的阴沉天气里(由于季节的更替,这种天气在此时已是持续性的了）麻布衣服就变成了硬邦邦的烟囱筒，我们千方百计地想让瑟瑟发抖的肌肤不触及这湿漉漉的东西,结果自然全都是白搭。他们发给我们一件大褂儿，不可否认，这是一个道义之举,但这种新的另类服饰只不过是又一层潮湿的东西,一点儿用也没有。我认为粗糙的水泥纸袋也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和许多人一样,柠檬邦迪也给自己偷偷搞来了那东西,并冒着很大风险地把它穿在衣服里面，因为这种罪行过不了多久就会暴露出来 只需背上挨一棍子,他穿在胸前的东西就会响起来,那响声立刻会让他的罪行暴露无遗。趁它还没有响的时候,我问他,到底干吗要这个变成潮糊糊的、会带来新苦恼的东西呢？现在想摆脱掉它都得偷偷摸摸的。

但最令人恼火的,我说,是这双木鞋。实际上,一切都是由烂泥引起的。可以说，在此之前，我在这方面的认识显然是不足的。

在国内,我也见过,甚至还踩过烂泥,但当时我当然根本就不可能想到,烂泥有时能够成为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我们生活的舞台。我们的脚后跟和脚踝全都陷没在里面,然后我们用尽全力,啪唧一声猛地一下子把它从那里拔出来，结果只是总共前进二三十厘米的距离后又让它重新陷了进去，对于这一切我都没有作好思想准备、即使准备好了也是白搭。现在我们发现，这种木鞋的后跟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自行折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踩在后面某一点上突然变薄的、似思绪般起伏不平的、厚厚的圆拱形鞋底上,让自己悠荡着向前走去,模样犹如不倒翁。此外,在原先是鞋后跟的地方,在鞋衬和已经很薄的鞋底之间会出现越来越大的缝隙,我们每走一步，都会有冰冷的烂泥夹杂着碎石子和各种尖锐的东西不受阻拦地钻进去。鞋衬早已磨破了我们的脚踝，并在它下面比较柔软的地方划出了无数的伤口。这些伤口会根据它们各自的特性分泌出黏液,而那黏液是黏乎乎的 这样一来,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这种鞋子了,它们已经脱不下来,紧粘在那里，就像是一个新的身体部位实实在在地长在我的脚上了。白天我穿着它,晚上安歇时也穿着它,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 免得浪费时间，因为我每晚都得从铺上跳起来，准确地说是跳下去两三次，有时甚至四次。夜里也就罢了,无非会有些麻烦,会磕磕绊绊,或会在泥地里滑几下，在探照灯的世界里我们最后总还是能够到达目的地的。然而，白天怎么办？怎么办？如果正在突击队里干活时，我们突然要拉肚子呢？这种事是在所难免的呀。这时人就会鼓起所有的勇气,脱下帽子,请求看守允许“请准许我上厕所。”

前提自然是附近得有茅房，而且是犯人也能够使用的那种茅房。就算有这样的茅房，就算我们的看守有一副好心肠，会同意一次，甚至同意两次,那么请问,谁还会有那么鲁莽,谁还会那么不顾一切地第三次去试探他的耐心呢？这时就只剩下了沉默的斗争，牙关紧咬着,肚子不断颤抖着,直至这场较量分出个胜负来.最后,占上风的不是我们的身体，便是我们的意志。

不管是料得到,还是料不到,是招来的,还是正要躲开的,作为最后一种手段，挨打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我在这方面自然也有份儿,但与正常的、平均的、日常的水平相比,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相比,我得到的并不多,不过也不算少,它算不上什么个人的特别事故，而只是一种我们营地里寻常条件下的寻常产物。加之它很不规范,如果要让我说的话,上一次打我的那个家伙还不是一个党卫队的人（毕竟他们才是被委任、被授权、被要求做这种事的),而是某个名为‘ 敢死队 ’的、比较含糊的那种劳动监督委员会之类的机构里的一个穿黄衣的军人。正好他在那里，发现我把水泥袋子掉下来时,他大叫一声,一个箭步蹿了过来。的确,搬运水泥对所有的突击队队员来说都算得上是难得的好活儿，也是一种为数不多的、我们能够欣然承担的工作。你只要把头低下来,就有人会把一个袋子放到你脖子上，你扛着它慢悠悠地走到一个大卡车那儿,在这儿会有另一个人把它拿下来,然后你就可以绕一个大圈子,圈子的界限视当时的情况而言,再慢腾腾地走回去。运气好的情况下,你的前面还有人排着队,也就是说你又可以偷得一点儿空闲，直到扛下一袋水泥为止。现在这袋水泥总共也不过十到十

五公斤左右，要说平时在家里，这只是小菜一碟，我甚至可以拿它当球来玩，但在这里我却摔到了，把它掉到了地上。尤其是纸袋子破了，里面的东西，即那材料、那值钱货、那昂贵的水泥，从缝隙里流了出来，洒到了地上。他已经到了我的身边，我的脸上已经感觉到了他的拳头，然后他把我打倒在地，还用靴子踩着我的肋骨，用手按着我的脖子，把我的脸按在地上，按在水泥里。“刨到一块、用舌头把它舔起来，”他疯狂地吼着，然后又把我拎起来，并保证说“：软骨头，胆小鬼，该死的犹太人，我会给你个厉害看看的。”从这一刻起，每一次转回来的时候都是他本人把袋子放到我脖子上，他只关照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是他的心事，他的目光只陪伴着我到卡车那里并从那里回来，他还会叫我先搬，尽管按照公正的顺序来说，我前面还有其他的人。到了最后，我们之间几乎已形成了某种默契，我们都已相当熟悉对方，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某种满意的、信任的，几乎可以说是骄傲的神情，从某个角度来说，我得承认，这也很有道理：果然，尽管摇摇晃晃，尽管佝偻着背，尽管眼前一阵阵发黑，但我还是挺住了，来来回回地扛着运着，而且再也没有掉下过一个袋子，我明白，归根结底，这还是印证了他的话是对的。然而，另一方面，在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某种东西无法挽救地毁掉了，从此以后，每天早晨我都以为，这是我能够起来的最后一个早晨，每迈出一步，我都以为自己再也迈不出另一步了，每做出一个动作，我都以为自己再也做不出下一个动作了，但后来又有那么多次，我也都一一完成了。

⑦

有些情况和有些处境看来是无论用什么科学方法都无法使它们进一步恶化的。可以说,在经过了那么多努力、那么多无用的尝试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本人也找到了平静、安宁和轻松。譬如有一些事情,此前我认为它们简直重要至极,可以说,现在在我的眼里,它们的一切重要性都已失去。比如说,点名的时候,如果我站累了,那我会连看也不看一下脚下是泥潭还是水坑,而只管一屁股坐下去,并且就待在那里,直到我的邻居们用力把我拉起。寒冷、潮湿、刮风、下雨对我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 它们奈何不了我,我也感觉不到它们。连饥饿感也消失了。我仍继续往嘴里送着我所找到的一切能吃的东西,但只是娱乐般地、机械地、习惯性地做着这动作。劳动的时候呢?我已经连装样子都懒得装了。如果他们不喜欢的话,最多打我一顿,这也无大妨碍,它只会让我赢得时间 挨到第一下打的时候,我马上就会躺倒在地,以后再挨打,我就感觉不到了,因为在此期间我已睡着了。

只有一种感觉在我的心里变得越来越强烈了:那就是恼怒。如果有人打搅了我的舒适,即使是只碰了一下我的皮肤,或是身后的人因我在行进中踏错步子(这种事时有发生)而踩到我的脚后跟的话,我都会毫不犹豫、二话也不说地当场就想要了他的命,前提自然是我有没有能力办到此事,以及我在举起来手时有没有忘记自己到底打算干什么来着。有几次我和柠檬邦迪也吵了起来。

他责怪我,说我“自暴自弃”,已成了突击队的包袱,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麻烦,我的疥疮传染给了他。尤其是,说我在某些方面好像有点儿让他烦了,使他感到不悦似的。我是在一个晚上觉察到这一点的。当时他把我带到了盥洗处。我徒劳地手脚并用,大声抗议着,但他还是用尽全力把我的破衣服扒了下来,我试图用拳头去打他的身体、他的脸,但他只顾用冷水搓洗我颤抖的皮肤。我已经跟他说了一百遍,他的监护已成了我的负担,别再烦我啦,见鬼去吧。“你是不是想死在这儿,难道说你不想回家了?”他问道。我不知道他在我的脸上读到了什么答案,但我在他的脸上一下子看到了某种震惊、某种恐惧,就像我们看着那些无可救药的倒霉鬼、被判了死刑的人、或者传染病病毒携带者时的神情一样。此时我就想起了从前他对穆斯林们的看法。总而言之,打这以后,我发现他尽量避着我,而我也终于摆脱掉这档子麻烦事了。

然而,我这膝盖却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这种疼痛愈发缠着我了。过了几天后,我还专门看了看它,尽管我的身体已经让我习惯了许多东西,但对我的右膝已变成一只又红又肿的袋子这一意外情况,我认为还是立刻盖上不看为好。我自然知道,我们的营地里也有“病房”,但首先,就诊时间正好是在吃晚饭的时候,而我认为,吃饭毕竟是比康复更为重要的事,其次,一两回经历、对本地情况的了解以及一些生活经验的积累在这种时候也不大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加之,它离得也太远 要往前走过两个帐篷,像这么长的路,除非迫不得已,我是不愿意走的,而且现在我的膝盖也很疼。最后还是柠檬邦迪和我们的一个寝伴儿用手搭成担架,像玩

老鹳带小鹳的游戏那样，把我带到那儿去了。他们把我放到一张桌子上,然后有人好好提醒了我一番,说是疼痛肯定在所难免,因为必须立刻手术,而由于麻醉剂短缺,手术不得不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我能够看到的是，他们用一把刀子在我的膝盖上切了两刀,切口成十字状,又通过那个切口从我的大腿里挤出了一大堆东西,最后他们把整个伤口都用纸包扎了起来。此后,我马上就提起了晚饭的事儿，他们保证说，我会得到必要的照料的。果真如此，这一点我也很快就体验到了。今天的汤是用大萝卜和苤蓝做的,这正是我特别喜欢吃的汤,而且看得出他们给‘ 病房 ’的汤是从锅底舀的，对此我也十分满意。晚上我也是在这儿，即在“ 病房 ’的帐篷里过的夜,睡在一个床箱的最上层,而且完全是一个人独睡。只有一件事令人非常不愉快，那就是到了那个惯常的拉肚子的时间，我发现自己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于是我就请求帮助，先是悄声地,而后大声地,最后已经吼叫起来了,结果却全都徒劳无功。第二天早上，我的身体和许多其他人的身体一起被抛到了一辆大卡车的浸透雨水的铁皮板上，并被运往附近的一个叫做“ 格莱纳 ’的地方,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我们营地真正的医院就在那里。后头有一个军人坐在一张漂亮的折叠式矮凳上，膝上放着一支因湿润而闪闪发亮的步枪，是他负责在路上看押我们的。看得出他极不情愿，脸拉得老长，有时还会嫌恶地皱起眉头和撇撇嘴,估计是因为车上有一阵阵很难闻的味道,以及他不得不进行查看。我得承认，他这样做其实也是有道理的。让我感到特别难过的是,似乎他内心里已形成某种看法,已归结出某种广为流传的真

理。我真想为自己辩解“:这不全是我的错,我的本性并非如此。”然而,我自然明白,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容易。到达后,我得先在这里经受住一根浇花园用的橡胶管突然从我身后喷射过来并溅向四面八方的那股水柱的冲击，它把我身上的一切—— 残留的破衣烂衫、污垢,甚至连包扎的纸带都冲刷掉了。随后我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在那里他们给了我一件衬衣和一个双层板床的下铺,于是我便可以躺在这上面的一个麦秸袋子上了，它显然是被我的前任夯得相当硬、压得相当薄的,上面布满不少可疑的污点,散发着可疑的气味,到处可疑地嘎吱乱响,但这毕竟是个空闲的床位。最后,他们终归还是完全让我独自待在那里，随我怎么度过时间了。我也终于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了。

看来老习惯也总是会被我们带到新地方去的。可以说，初到医院的时候，我本人也不得不和自己的许多陈规陋习作斗争。比如说,我有我的良心,起初,它每日凌晨会准时将我叫醒。有时我会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以为自己睡过了点名的时间,外面的人已经来找我了。要过许久,我的心才会缓缓地平静下来,我才会发现自己搞错了,才会接受眼前的这一现实:它证明,我是在‘家’里,一切正常,这儿有个人在呻吟,远一点儿的地方有几个人在聊天,那儿有个人古怪地沉默着,将突兀的鼻子、直愣愣的眼睛、张开的嘴定格在天花板的方向,惟有我的伤口在疼,还有顶多就是像平常那样,我感到异样地焦渴,估计是由于发烧的缘故。简言之,经过一段时间后,我才完全相信,已经没有点名了,我不用看见军人们,尤其是不用去劳动了。所有这些好处,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其他任何

次要的事情、任何疾病都无法从根本上将其抹杀的。在此期间，我曾几次被带到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那儿有两名医生，一个年轻的和一个年纪大一点儿的 可以说，我是后者的病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身体消瘦，长着一头黑发，穿着干净的衣服和鞋子，戴着袖章，还长着一张有别于他人的正常的脸，这张脸会让你联想到友好的老狐狸。他先问我是哪里人，随后他也告诉我说，他是埃尔代伊①人。其间，他已从我的膝盖上剥下了已经变硬和泛出黄绿色的破碎的纸卷，然后把两只手按在上面，从我的大腿上把那些新生成的东西挤了出来，最后再用一个与钩针差不多的工具把卷好的纱布塞进我的皮肉之间，他解释说"这是为了保留通道"和"确保清洁"，以免伤口提前愈合。从我这方面来说，这话我很乐意听，因为，说到底，我在外面也没什么事情可干的，如果我仔细斟酌一下的话，对于我来说，康复自然一点儿也不那么打紧。然而，他的另一个意见就不是那么遂我心了。他觉得我膝盖上只有一个口子太少了。他认为应该在侧面再切一刀，然后再通过第三个切口把侧面的切口和第一个切口连在一起。他问我是否能下得了决心。我简直诧异极了，因为他看着我的那副样子就好像是在等我的回答，或是我的同意，甚至可以说是我的授权。我对他说："随您吧。"闻听此言，他立刻认为，那还是不要往后拖了。他当场就干了起来，但我被迫发出了很大的叫声。我看到，这令他感到不悦。他也多次说："这样我就无法工作了。"我试图为自己辩解："我也

①二战前属于匈牙利，二战后划归罗马尼亚，现名特兰西瓦尼亚。

是没有办法。'前进了几厘米后,他就放弃了,并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计划。即便如此,他看上去也还算满意,正如他所说的'这也算是成果了”，因为这样一来，他今后就能从两个地方给我挤脓了。在医院里,时间倒是挺好打发过去的 如果我不是在睡觉,那我就会感到饥渴,伤口会作疼,聊天或治疗也总是会让我闲不下来的。我甚至还可以大胆地说，正是因为意识到这儿是一个能为我提供无穷乐趣的特区,所以即便闲得下来,我也感觉挺好。每每有新来的人,我都要问问他们,营里有什么消息,他们是哪个营房的，认识不认识五号营房的一个名叫柠檬邦迪的中等个儿、断鼻梁、缺前排牙齿的人，但谁也不记得有这么个人。我在治疗室里所见到的那些人的伤口大多也和我的差不多，主要也是在大腿和小腿上，但也有长得靠上一点儿的，有长在髋部、臀部、手臂上的,甚至还有长在脖子和背上的，它们的学名叫做“疖子”。我常能听到这个词,它的出现和多发在集中营的正常的环境里一点儿也不特别,一点儿也不奇怪，这全是我从医生那里得知的。在稍后到来的那些人中，有的人得切掉一两个脚趾头，甚至有人得切掉全部脚趾头。他们说，外面现在已是冬天，他们的脚在木鞋里都冻坏了。另一次,一个穿着专门在裁缝那儿缝制的囚服的、级别显然很高的人物推开了包扎室的门。我听见他声音很轻却又很清楚地说了句法语“大家好!”,从这一点以及他那红三角中的字母'F”上,我马上就猜出来了,他是法国人,根据他那'O. Arzt”字样标识的袖章我还断定,他显然是我们医院的主任医生。我看了他许久,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像他这么好看的人了。他的个子不是很高，

但衣服里有着一身匀称地紧绷在骨骼上的结实的肌肉；他的脸长得也很丰满，所有的面部轮廓线都绝对是他本人的，上面还带有能被人识别的情感和细微变化；他的下巴是圆的，中间有个坑儿；颜色略有些深的油润的皮肤在光线的照射下散发着柔和的光泽，就和从前我在国内时所看到的国人皮肤一般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一样。我估摸着他的年纪并不会太大，大约三十岁左右吧。我看到，医生们一下子都异常地活跃起来了，竭力想博得他的欢心，忙着向他解释一切，但我发现，这种方式不大像是集中营里的行事方式，而更像是从前国内的那种仿佛立刻能引起人回忆似的方式，那种考究的风度、那种喜悦之情和社交努力，就如同我们有机会展示自己既听得懂又能流利地讲某种高雅的语言（比如说法语）的本领时所表现出来的一样。然而，另一方面，我也看得出，主任医生对此却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他逐个地查看了一遍病人，回答了一两句话，还点了点头，但动作始终很缓慢，说话声音始终很轻，神态始终既忧闷又木然，他的脸上和他那胡桃木色的眼睛里始终不变地带着一种沮丧的、几乎是阴郁的神情。我感到诧异，因为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能使像他这样一个生活得如此富足和如此优越的、职位又如此之高的尊贵人物感到如此忧郁。我试图从他的脸上和他的动作中寻找答案，慢慢地我才茅塞顿开：自然，说到底他也只能待在这里呀。有一个印象慢慢地、伴随着某种惊喜地渐渐在我的心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时我才开始明白：这么说来，是这种处境，简单地说，也就是囚禁本身让他感到难过的。我差一点对他说：“请不要忧伤，因为这毕竟是最微乎其微的。”但

我又怕自己太莽撞,而随后我也想了起来,是的,我不会说法语。

搬家的过程中,我大抵也一直在睡觉。事先我已有所耳闻 在蔡茨原来那些帐篷的所在地此时已建起了冬天的住处、石头砌的棚舍，其中他们也没有忘记给医院留出地方来。我又被扔到了大卡车上。周围一片黑暗,我看得出这是在晚上,又根据严寒判断出现在大约是仲冬时节。接下来我分辨出的已经是一个极其宽敞的地方、一个灯火通明而又冰冷的前厅,以及放在厅里的一只散发着化学药水气味的大木桶。然后,作为一种清洁的办法,我整个人也得在桶里浸没一下,此时抱怨、请求和抗议全都没用。除了缸内的冰冷的溶液之外，还有一件事也让我直起鸡皮疙瘩，我不得不看到，我前面的所有其他的犯人也全都在此棕色的溶液中浸泡了一遍,而且就是这么带着伤和各种东西浸泡的。然后,时间在这儿也开始慢慢地流逝而去,从根本上说,流逝的方式与原先那个地方一样,仅有几处不同。譬如,新医院里的床铺是三层的。他们带我去看医生的次数也比以前要少,这样一来,我的伤口在这儿主要是全凭它自己的能力就地自行清洁的。此外,没过多久,我的左髋部也出现了疼痛，紧接着就出现了那已熟悉的红肿袋子。我徒劳地等了几天,期待着它的消失,或是期待着再发生一些别的什么事,最后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把病情告诉了护士，又经过了一番催促、几日的等待之后,我也排到了棚舍的前厅,来到了医生跟前。就这样,现在除了我的右膝之外,我的左 髋部也有了一个大约和我的手掌一般大小的切口。此外又有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情况，那是我的住所带来的,我住在一个下铺,正好面对着一个高高的、总是朝

灰色天空敞开着的、没有玻璃的小窗口,估计是屋内呼吸的潮气在它的铁栏杆上形成了永久的冰柱，并不断地将毛絮状的霜花吸引进来。而我只穿着一件专门发给病人的、没有纽扣的短衬衫,戴着一顶冬季特意发给我们的绿色绒线帽,该帽子式样古怪,耳朵周围呈圆环形状,前额处为楔形弧线,皱巴巴的,与滑冰冠军或舞台上扮演撒旦的演员所戴的那种帽子有几分类似，实际上倒是很有用的。于是我没少受冻，尤其是在失去了我的两条毯子中的一条之后，此前我还能用它的烂絮凑合着弥补另一条上的破洞。“借给他一小段时间,以后他还会还给你的,’护士如是说。我徒劳地用双手抓着它,揪住它的边儿不放,但事实证明他比我劲儿大。除了这一损失外,还有一个想法也令我有些难过,至少据我所知,毯子一般都是从他们预计到甚至期盼着很快就会完蛋的那些人身上掀下来的。另一次,也是在一个下铺,但是我后面的那个下铺,有一个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声音又在提醒道:护士又来了,又用臂膀扛来了一个新病人,他们正在找地方,看能把病人放在谁那儿,放在我们中的哪个人的床上。我们得知,由于病情严重,加上有医生的许可,那个新病人有权单独拥有一张床铺。他用可怕的、震耳欲聋的声音大吼道:‘我抗议!’提到的理由是:‘我有这个权利!你们去问问医生!’接着又是一声:‘我抗议!’于是,护士只得带着他们的负担一次又一次地寻找下一张床，就这样走到了我的床边。我得到的这个寝伴儿是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孩。他那张黄色的脸、那双燃烧着怒火的大眼睛对我来说是似曾相识的，但话又得说回来了，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着黄色的脸和燃烧着怒火的大眼睛。他

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有没有水喝,我对他说,我也正渴着。紧跟着又来了第二句"有没有烟抽 ?"自然,这回他也不走运。他提出愿意拿面包跟我换,但我告诉他说,甭提这话,问题并不在于此,而是我压根儿就没有烟。于是，他缄默了一阵子。我怀疑他是在发烧，因为从他那战抖不止的身体里不断地向外涌出滚烫的热浪来，我倒是从中得益匪浅。然而,当他在夜里无数次地翻来覆去,并且不大顾及我的伤口时，我就不那么高兴了。我跟他说:"嗨,够了,你可以安静一会儿了。"后来他接受了我的意见。早上我才发现这是为什么：我叫他起来喝咖啡已经是徒劳的了。然后我就忙不迭地把他的饭盆递给了护士,因为正当我打算将此事告诉他时,他已大吼着向我要那饭盆了。后来他的那份面包我也代他领了，晚上的汤也一样,以后也都是这样,直到有一天他开始有异常奇怪的变化为止。此时,我只得告诉他们了,毕竟我不能够继续把他存放在我的床上了。我有点儿紧张,因为我的拖延已经相当明显,对于其中的原因,只要稍具一些常识,是很容易就能猜到的,而这毕竟也在我的预料之中。但他同其他人一起离去了,感谢上帝,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暂时我就独自一人待在一张床上了。

在这里我还真正认识了虫子。跳蚤我是无论如何也捉不住的,它们的动作比我更为敏捷,这很好理解,因为它们在我这儿毕竟吃得更好。虱子抓起来就要容易得多了，只不过这活儿没什么意思。当我对它们感到相当气愤时,我就拉直衬衫的后背,用大拇指的指甲,在紧绷的帆布上自上到下一路刮下来,在一系列清晰的劈啪响声中实施着报复,享受着消灭它们的成就感,然而一分钟过

后,我又可以重来一遍,又是在相同的地方,收获的又是相同的成果。它们无处不在,所有隐秘的角落都能钻进去,我的绿帽子看上去已是灰色的了,它们在帽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进进出出,几乎快要使它移动了。然而,最让我感到意外、震惊和恐惧的是,我忽然感觉到大腿在发痒，掀开纸带后我才发现，连我的肉上也有虱子了，它们正从我的伤口上汲取着营养。我试图用抓挠的方式把它们弄走,至少要把它们抠出去、扒拉出去,至少要逼迫它们再耐心一点儿,再等上一小会儿,可以说,我还从未感觉到过,我的奋斗是如此毫无希望,反抗又是如此顽固、如此厚颜无耻。过一段时间后,我已经不去管它了,我只是看着这盛宴、这热闹、这贪婪、这胃口、这毫不掩饰的快活劲—— 此情此景似乎有几分相识。这时我还发现,从某些方面来说,要是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那我也是能够理解它们的。最后,我几乎觉得轻松了,我的反感也几乎已经消失了。我仍不欢喜,仍有些绝望,我想,这毕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仅仅是泛泛而言的不欢喜,并不是生气,那也可以说只是由于整个自然规律的缘故罢了。不管怎样,我很快将伤口盖上了,此后我已经不再与虱子争斗，也不再去搅扰它们了。

可以说,无论阅历有多么丰富,内心的平静有多么圆满,也无论洞察力有多么巨大,看来,都不可能不让我们再给自己的运气最后一次机会,条件自然是只要我们能找得到这种机会。譬如,当我和所有显然已不可能被寄予太多劳动希望的那些人一道被送回派遣地—— 布痕瓦尔德的时候，我自然是竭尽所能地与其他人一起分享着快乐,因为我头脑里马上想到的是那里的好日子,尤其是早

上的汤。但我承认,我却没有想到,首先我得到达那里,而且还是在现在的这种状况下乘火车去那里。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说,有些事情是我此前一点也不理解和很难相信的。例如，有一个我以前常听到的词‘遗体”,根据我此前的认知,它只与某个已经作古的人有关。就我本人而言，我不可能怀疑我是活着的，虽飘摇不定,虽已羸弱至极,但我内心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仍有生命之火在燃烧着,换句话说,我的身体在这儿,我对它了如指掌,只是我自己似乎已不在其中了。我毫不费力地就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就与它旁边和上面的其他类似东西一起躺在这里，躺在颠簸的车厢地板上所铺着的、粘满各种可疑黏液的、湿漉漉而又冷冰冰的麦秸上，纸带早已经剥离、破碎、脱落了,上路前他们给我换的衬衫、囚裤，直接贴在了我的伤口上——所有这一切已触及不到我的内心，我已不再在乎它们,不再受到它们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我已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如此轻松、如此平静,几乎像是陷入了幻想的王国，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已很久没有尝到如此舒坦的感受了。那么久以来,我终于头一回摆脱掉了恼怒的折磨,紧挨着我的那些身体已不再让我感到烦扰,甚至让我感到欣喜 它们在这里,和我在一起,是那样地亲切,与我的身体是如此地相似,我头一回对他们有了一种陌生的、反常的、蹩脚的、可以说是笨拙的感觉——我想，这也许就是爱。在他们那儿，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东西。的确，已经没有人像一开始那样用希望来鼓舞大家了。或许正是由于自然会排除一些困难情况的这个原因，一切才如此宁静。而另一方面,除一般性的呻吟、齿间的吸气声、轻轻的抱怨之外,偶尔也

可听到其他的声音,例如一两句安抚性的宽慰话,它们是如此地具有家庭气氛。但可以说,人们也不吝于行动,都在各尽所能,比如,当我说我要小便时,通过许多双勤勉的善意的手的相互传递,一只黄铜色的罐头盒便会不知从多么远的地方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最后,当我背底下的火车地板不知如何、不知在何时、不知通过何人之手一下子变成了铺上了石块的地面、薄冰覆盖的水洼的时候,可以说,幸运地到达布痕瓦尔德对我来说已无甚大意思了,我早已忘记它曾令我多么倾心地向往过。我也猜不出我到底在哪里:是在火车站上呢,还是在里面。周围的地区我也不认得,那条路、那些别墅以及那个雕塑我都没有看见,然而我却仍是十分清楚地记得它的。

看来,我像这样躺了很久,安然、宁静和温顺地躺着,丝毫也不好奇,充满了耐心,就躺在他们把我放下来的那个地方。寒冷、疼痛我全都感觉不到,某种介于雨雪之间的、带刺激性的降水洒落到了我脸上,但这信息也仅仅是我的理智,而不是我的皮肤传达给我的。偶尔我也会思考一些事情,偶尔我也会看一看那些不用我动弹、无需我花费任何力气即可印入我眼帘的东西,譬如我脸上方的那块低矮的、灰蒙蒙的、看不透的天空,更准确地说是那片将它遮盖住的、铅色的、步履缓慢沉重的冬季云层。虽说云遮住了天空,但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破绽,到处都有透光的缝隙和窟窿在时隐时现,好像是某种深邃的瞬间揭秘。与此同时,那上面仿佛有一道灵光投射到了我的身上,这是一个迅速的、窥探的眼神,这是一双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但绝对是明亮的眼睛,与从前在奥斯威辛时

我所面对过的那个医生的眼睛有几分相似。我的身旁有一个巨大的秽物——一只木鞋;在另一侧,进入我视线的是一张脸,它戴着一顶与我头上的帽子相类似的魔鬼帽子，有两个尖尖的附属物——鼻子和下巴，中间有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再往旁边一点儿是另一些头、物件和身体。我明白了,这些都是从车上卸下来的残弃货物,即废料,或者也可以用更为准确的词来定义这些被他们暂且搁置在一旁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不知道,是一个小时、一天呢,还是一年),我终于感觉到了人的说话声、窸窣的脚步声、工作和指挥的嘈杂声。我身边的那颗头一下子抬了起来,我看到,靠下边一点儿的肩膀处有一条穿着囚服的胳膊正打算将它抛到一辆推车或铲车上去，抛到已经成堆的其他身体的顶上去。与此同时，一个断断续续的声音飘到了我耳边，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捕捉到它，在这沙哑的低语声中，我更为吃力地分辨出了一个我不可能不记得的、曾是多么洪亮的声音:“我……抗……议……”它咕哝着。于是,在继续腾越之前,它在空中停留了片刻,似乎由于吃惊,我立即觉得，我又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它显然是抓住抗议者之肩膀的那个人的。这是一个悦耳的、很有男性气质的、亲切的声音,它那不大标准的、集中营式的德语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责备,倒不如说是一丝骇异、一丝怪讶:“怎么啦?你不想活了吗?”它问道，没错,那一刻我也认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毫无道理的、总的来说没有任何根据的事情。于是,我决定:轮到我的时候,我要表现得理智一些。然而,已经有人朝我弯下身来了,我被迫眨了眨眼,因为有一只手在我眼睛周围摸索着什么。随即我就被人抛到了一辆

小推车上的一堆货物中,然后开始被人推着走,至于去哪里,我也不是很想知道。只有一件事,一个此刻才冒出来的想法,占据着我的头脑。也许是我的错,我不知道,但我也从未那么富有远见地想要预先打听一下,布痕瓦尔德的习惯、制度、方式,简单地说,就是他们这里到底是怎么个做法:是像我在奥斯威辛所听到的那样用煤气,再辅以药物呢,还是用子弹,或是用已经超越我认识范围的其他上千种办法中的一种——这我就猜不出来了。总之,我希望不疼,或许这希望很奇怪,但它也是同样真实地充满着我的心,可以说,它如同其他那些更真切的希望——即我们寄予未来的希望一样。此时,我才知道,看来,虚荣心是那种一直会陪伴你到最后一刻的情感,因为说真的,不管这种毫无把握的感觉如何怂恿着我,我还是什么也没有问、什么也没有说、什么请求也没有提,甚至连看也没看一眼身后的那个或那些推着我的人。那条路通到了高处的一个拐弯处,下面顿时有一幅广阔的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那里有占满整个一片开阔斜坡的稠密的居住区,有一模一样的石头房子、漂亮整洁的绿色棚舍,还有一些另成一群的、可能是新的、却因尚未刷漆而显得有些凄凉的棚舍,以及将各个区域分隔开来的内部铁丝网那曲曲弯弯的、但看得出是精心布设的网络。再往远处是一片云雾弥漫的、枝桠光秃的林海。我不知道,那边的一个建筑物旁有那么多光着身子的“穆斯林”在等些什么。他们周围有几个来回走动的长官,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么还有几个理发师,果然,从他们的矮凳、他们手脚麻利的动作中,我一下子就确认无误了。这么说来,他们显然是在等着进浴室和入营了。再往里,

在远处那铺着小方石砖的营区街道上也充满着生活气息，到处是一派忙忙碌碌、辛勤劳作、消度时间的景象—— 来来往往的老居民、羸弱抱病者、显贵人物、仓库保管员和幸运的内部突击队成员们正在干着他们每日的活计。到处都有比较可疑的烟雾与比较友好的蒸汽混合在一起，从某处传来的一阵熟悉的丁丁当当响声宛如我们梦里的钟声,款款地飘入我的耳廓,我的搜寻目光偶然发现了下面的运输队伍，担在肩上的扛棒和扛棒上冒着热气的大锅几乎快要将他们压垮了。他们裹着一股酸涩的空气从远处走来，毫无疑问,我嗅出了萝卜汤的香味。好不惆怅啊,或许是这景象和这味道在我原本已麻木的胸中触发了某种情感吧，它那越来越汹涌的力量竟然硬是从我已干枯的眼里挤出了几滴热泪，并使它们与覆盖在我脸上的冰冷的水雾汇集在一起了。所有的思绪、所有的念头、所有的洞察力和清醒的理智全都不管用了,我还是不可能误会我内心深处某种默默的渴望所发出的那句仿佛为自身的荒唐而害羞的、然而却又越来越执拗的悄悄话 我想在这个美丽的集中营里再多活一阵子。

⑧

我得明白,有些事情,如果从我的预料,从规范、理智乃至生活和处事方式的角度来看,至少就我所认识到的角度来看,都是我永远也无法解释、无法准确地解释的。譬如,当他们在某个地方又把我从小推车上卸下来，并放到地上去的时候，我实在不理解,电推子和剃须刀到底对我还有什么用。然而,那个挤得透不过气来的、第一眼看上去与真的浴室一模一样的地方倒是基本上与我的预料相符的,我也被放到了湿滑的宽木条上,放到了无数被踩踏的脚掌、脚后跟、溃疡的小腿、小腿骨之间。我的脑子里最后还闪过了一个念头：这么看来，这儿采取的也是奥斯威辛的做法了。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在短暂的等待以及一阵嘶嘶嘶、咕噜噜的响声过后,水,大量温暖的水,忽地从上面的那些龙头中倾泻而下。我并不感到很高兴，因为我还想再暖和一会儿的，可我也无能为力。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把我从这晃动着的人腿丛中一下子托举到了空中，与此同时，一张大床单及其上面的一条毯子将我卷了起来。此后，我记得一个肩头，我头朝后和腿向前地耷拉在那个肩头上；还记得一道门、一个狭楼梯的陡峭的台阶 接着又是一道门,然后到了一个地方,是一个大厅,也可以说是一个房间,里面极为宽敞明亮,此外,其中所摆设的器物也几乎有着军营的豪华气派,令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最后还有一张床—— 一张正规的、看得出是供一个人睡的、真正的床,上面有鼓鼓囊囊的麦秸袋子,还有两条

灰色的毯子。我从那个肩头翻落到了床上。旁边还有两个人，是两个长得颇为好看的正常人，有脸——正常的脸，有头发，穿着白色的裤子、汗衫、木拖鞋。我长久地看着他们，欣赏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这时我才看到他们的嘴，才感觉到耳边不断回响着某种如歌的语言。我觉得他们好像想问我什么问题，但我也只能摇摇头，表示我听不懂。于是，他们中的一个用发音极古怪的德语问道:“你有没有拉肚子?”我有些惊奇地发现，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声音竟然用德语回答道:“没有。”我想，还是虚荣心，即便到了现在它仍在作怪。于是，经过稍许商议和几趟来回之后，他们把两样东西塞到了我手里。其中之一是一只饭盆，里面有温热的咖啡，另一样东西是一块面包，我估摸着有六分之一只大小。没有任何代价，也没有任何交换条件，我就可以把它们拿起来，并把它们全都吃喝光了。随后，我的体内却突然发出了生命的信号，它开始翻腾不止，不服从命令，并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了我所有的注意力，尤其是耗去了我所有的气力，因为我可不能让人家发现我刚才所说的是谎话。当我再次苏醒过来时，其中的一个人又在这里了，但他现在已穿上了靴子，戴着一顶漂亮的深蓝色帽子，穿着一件有红三角的囚徒外套。

于是，我又被人扛上了肩头，背下了楼梯，这回是径直背了出去，背到外面去了。我们很快就到了一个宽敞的灰色木棚里，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医疗机构，一个类似于‘病房’的地方。果然，这里的一切整体上又大致符合了我的预想，说到底，还是完全中规中矩的，甚至是亲切熟悉的，只是我现在却不大理解刚

才的那种让我享用咖啡和面包的待遇了。在我们途经之处，整个木棚从头至尾排列着十分熟悉的三层床箱。每个床箱都挤得满满登登的,可以说,我也具有那么一点儿老到的眼光,即便只瞅一眼这些已混作一堆的几乎无法区分的原先叫脸的东西、生了疥疮和溃疡了的皮肤、骨头、破衣烂衫、尖细的四肢,也能够立即判断出来,所有这些附属物意味着每层至少有五具身体,个别地方甚至有六具身体。此外，在光板床上我也没看到即便在蔡茨都会铺的麦秸,但我承认,就这段时间、这段显然已所剩无几的时间来说,这的确也不是那么重要的细节。这时发生了一个新的意外——我们站住了,我听到了谈话声,有人在商议,显然是扛我的人与另外一个人在商量什么事。一开始我不知道自己看得是否真切，但我不可能搞错,因为棚里的照明非常好,有强烈的灯光。我看到,我的左边也有两只平常的床箱,然而这里的床板上却铺着一层红色、粉红色、蓝色、绿色及紫色的被子,在其上方还有一层这样的被子,两层之间露出一些年龄基本与我相仿的男孩的脑袋，一颗紧挨着一颗，虽有大有小,但全都是剃得光光的。我刚发现这一情况,就被人放到了地上,还有人扶着我,以免我倒下去。接着,有人把毯子从我身上取走,用纸带把我的膝盖和髋部匆匆包扎一下,并给我套上一件衬衫，然后我就滑进了上下两层被子之间，是在中间一层床箱上，两边则各有一个男孩急忙给我让出了一小块地方。

就这样,他们把我留在了这里,又是未作任何解释,于是我又只能听凭自己的大脑去思考了。无论如何,我都得承认,我无法否认我在这儿的这个事实,它每时每刻都在更新、更新、再更新。后

来我还弄清了一些应该了解的情况。比方说，这个地方可能是棚舍的头而不是尾，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对面一个开向户外的门和我面前的这块又明亮又宽敞的地方得到证实。这块地方是长官、文书、医生们的活动和工作场所，在最显眼的地方还摆着一张铺上了白床单的桌子。居住在后面那些木床箱里的人大多得了痢疾或伤寒，或者说，即便现在还没得，至少将来也会得的，肯定错不了。第一症状就是“腹泻”，或者说是“拉肚子”，那种挥之不去的味道也是一个信号。当时浴室突击队的那些人也立刻问过我这个问题，现在我明白，如果我碰巧如实回答了他们的问题，那么根据我的症状，我实际上也应该住在那儿。这里每日的伙食供应也和蔡茨的差不多：清早是咖啡，汤在上午很早的时候就送来了，面包的量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只，如果是四分之一只的话，一般都还会有“津贴”。由于不间断的照明使这里永远是那么亮，窗外的任何光线变化都丝毫影响不了它，所以要区分一天的早中晚几个时段是比较难的，我只能依靠一些确定无疑的信号进行判断：比方说，送咖啡来时是早上，医生来作每晚的告别时便是就寝的时间。我在第一个晚上就当面结识了他。当时我注意到了一个人，他正好站在我们的床箱前。估计他的个儿不大高，因为他的头大约和我的头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他的脸不只是丰满，甚至有点儿胖，有些地方还因脂肪过多而显得软绵绵的。他蓄着捻成圈儿的、几乎全白的髭须，这令我感到大为惊讶，因为迄今为止我在集中营里还从未见到过这种髭须。此外，他还蓄有同样雪白的、精心护理的颔下须，短短的，在下巴处被修成了漂亮的尖形。他戴着一顶很有派头

的大帽子,穿着深色的毛料裤子,但上身却穿着一件囚徒外套,不过是用上好的料子做的,戴着袖章,有红色标志,里面是字母“F”。他端详着我,就像端详所有新来的人一样,还对我说了几句话。我对他讲了一句我唯一懂得的法语句子“先生,我听不懂。”“好,好,”他嗓音浑厚而友好、稍有些沙哑地说道“是的,是的,我的孩子。”同时,他把一块方糖放到了我面前的被子上,是一块真正的方糖,同我记忆中的家里的方糖一模一样。然后,他访遍了两个三层床箱的其余所有男孩,从口袋里给他们每人也都拿出一块糖来。在有的人那儿,他只是把糖放下,而在另一些人那儿,他待的时间就稍长了。有的人甚至还能和他对话,他特意拍拍这些人的脸蛋,挠挠他们的脖子,和他们逗逗乐、聊聊天,有点儿像人们在闲暇时逗弄自己心爱的金丝雀那样。我还发现,有几个他喜欢的、尤其是懂他的语言的人还能多得到一块方糖。此时我才真正明白了我们在国内不断被教导的那个道理 文化修养、尤其是外语修养于我们大有裨益,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我说,所有这一切我都理会了,也都接受了,但理会和接受时却带着一种感觉,几乎可以说是条件 虽然我还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或条件,但我仍在不断期盼着转折、揭秘和觉醒。比如,第二天,在处置别人的空当期间,医生也用手指朝我这儿指了一下。我被人从我待的地方拉了出来,放到了他面前的那张桌子上。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几个友好的声音,他对我做了检查,敲了敲我,他那冰冷的耳朵、扎人的髭须尖儿碰到了我的前胸和后背,他向我示意 深呼吸,咳嗽。接着,他让我仰面躺下,又让一个助手模样的

人把我的纸绷带取了下来，然后开始查看我的伤口。一开始他只是远远地看了看，而后小心地在伤口周围按了按，里面立刻有东西冒了出来。他嘟哝了几句，还表情凝重地摇了摇头。我发现，这情况似乎让他有些情绪低落，令他不开心了。他很快重新将它们包好，仿佛想让它们立刻从眼前消失似的。我感觉得到，这些东西可不怎么讨他的喜欢，无论如何是安抚不了他的，也无法让他感到满意。

我还不得不看到，我在另外几个方面的考试也宣告了失败。比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和躺在身边的男孩们交流沟通，而他们却可以毫不困难地彼此进行交谈，是中间隔着我并通过我脑袋的上方或前方进行交谈的，仿佛它只是挡在路中央的一个障碍。方才他们还问过我是哪里人。我说："匈牙利人。"我听到，这消息迅速地传播开去了：匈牙利人、马札尔人、乌戈尔人，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其中有一个人还说了句："开尼尔[①]。"他的纵声大笑立刻有整个合唱团加以追随，那种笑声不容我存有任何疑问：他已经了解，而且相当了解我的族类。好不难堪呀，我真想告诉他们：这是个错误，因为匈牙利人并不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在对匈牙利人的看法上，我的观点大体上也只能是与他们一致的，我认为这一点是很奇怪的，甚至是很不公平的，尤其是我竟因此而在这里遭人白眼。然而，我想到了那蠢笨的语言障碍，这些话我都只能用匈牙利语告诉他们，至多是用德语，但那样一来，结果将会更糟，这一点我自己

①系"盖尼尔"的误读，在匈牙利语中的意思是"面包"。

也看到了。

此外,还有一个错误,或者说是一个罪行,那是我在经过这么些天后用任何力量仍旧无法再继续掩盖下去的。我很快就学会了,有时候,如果需要方便的话,可以把一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助理护士模样的男孩叫过来。这时他就会拿来一个扁扁的、带把儿的痰盂,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塞到被子里去。然后又得叫他了:“请过来!好啦!请过来!”直到他过来把它拿走。如果一日中有一两次这种要求,那么谁也不会说什么的,他本人也无隙可乘。只是我却被迫一天三次、甚至四次地劳驾他,而我看到,这就有些令他恼火了——其实这种反应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对此我自然也无法否认。有一次,他还把痰盂拿到了医生那里,向他做了一番解释,陈述了理由,并给他看了痰盂里的东西。看到那罪证后,医生也沉思了片刻。尽管如此,他的手和头所做出的示意动作还是明确无疑地表示了回绝。晚上的糖也没有缺少,如此说来,一切正常——我又得以牢牢地寄寓于被子和温暖的身体所提供的那种毋庸置疑的、至少在今天看上去还仍旧是不可动摇的稳固环境之中了。

第二天,在喝过咖啡而汤还没送来的这段时间里,有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难得会光顾此地的高官。他头戴一顶大大的、黑呢子的艺术家帽子,身穿一件洁白无瑕的白大褂,裤缝挺得如刀锋,皮鞋擦得油光锃亮。他那粗糙艺术品般的脸庞有些过于男性化,线条就像刀刻出来似的,而他的皮肤明显呈紫红色,看上去如同剥了皮的生肉一样,让我感到有点害怕。此外,

他身材高大魁梧,黑色的鬓发中已经搀杂了几许银丝,由于他双手背后,从我这里识别不出他袖章上的字,尤其是他的红三角上没有标志 这也就是宣布一个不祥的事实,即他有着无可挑剔的德国血统。另一方面,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能够打量一个囚徒,他的号码不是万位数,不是千位数,甚至连百位数也不是,而总共只有两位数。我们的医生忙上前问候,握着他的手直摇,还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胳膊,一句话,努力想赢得他的欢心,就像对一个终于光临的盼望已久的贵客一样。令我惊愕万状的是,我突然看到,所有的迹象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他正在和来客谈我的事儿。他还朝我这儿指了一下,手在空中划出一道圆弧,他那说得很快的德语中还有一个说法也清晰地传到了我耳朵里“: 送到你那儿。”然后,他继续说着,证明着,打动着他的心,一边还用手比划着,与我们在宣传和推荐某个产品,以便尽快地把它卖掉时一样。而这个客人,一开始只是一言不发地听着,就像是掌握着主动权的一方,也可以说像是个不好对付的买主,到最后他看上去已完全被说服了,至少从他那双深色的小眼睛向我投来的迅速而犀利的、已经包含着占有意味的一瞥,从他那短促的点头、握手和离去方式,以及我们的医生那张喜悦而满意的脸上，我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无需等待太久,门又打开了。我打量了一眼来人的囚服、红三角、里面的字母‘ P” 众所周知,这符号是波兰人的标志)以及他的黑袖章上的‘ 护理员 ’字样 也就是说他是刚才进来的那个人手下的男护士。这是个年轻人，约莫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他也有一顶漂亮的蓝帽子,但尺寸稍小一点,帽下的栗色头发软软地松垂到

了耳朵和脖子上。他那张丰满圆润的长脸上的每根线条都是最标致、最悦目的,他皮肤的粉红颜色以及那有点儿大而柔软的嘴唇上的表情是最讨人喜欢的。总之,他长得很好看,如果他不是立刻去找医生,而医生不是立刻把我指给他看,如果他的胳膊上没有一条毯子,也不是把我从我待的地方拉出来后立刻就卷到毯子里去,并将它扛到他的肩头上去(看来,这是这儿的习惯做法),那么我肯定会好好地欣赏他一番的。他并非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因为我用双手抓住了隔开床箱的那根正好位于我手边的横杆，可以说那也只是出于本能地随手一抓罢了。我对此举还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这时我才体会到,尽管只有几天的生活,它们却可以使我们的理智出现多大的偏差，还可以使我们的处境变得多么地艰难。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力气更大，我徒劳地用两个拳头捶打着他的腰部、肾脏附近的地方,对此他只是付之一笑,通过他肩膀的抖动,我感觉得到他在笑，于是我也只得作罢，忍受着，随他把我带到哪儿去。

布痕瓦尔德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你到了一道铁丝网后面那些漂亮的绿色棚舍中的一个棚舍的跟前，如果你在此之前是小营的公民,那你就几乎只会远远地惊叹称奇了。现在你可以得知:它们的内部，至少在这一个棚舍里，有着一尘不染、光鲜闪亮的走廊。走廊上有一排门——正常的、白色的、真正的门,其中有一扇门的后面有一个温暖明亮的房间和一张已经铺好的、仿佛只是在等你光临的空床在迎接你。床上有一条红色的被子。你的身体陷入了鼓鼓囊囊的麦秸袋子中。中间有一层凉凉的白色东西，你可以确

信自己并没有搞错,果真不假,那是一层床单。你的后脑勺也感觉得到一种不习惯的、却也不是什么不舒服的压迫,那是塞得满满的麦秸枕头引起的，它上面还有白色的枕套。护理员还把刚才包你用的那条毯子折成四层,放到你的脚边,也就是说,它也是供你使用的，显然是供你在万一对房间的温度感到不满的情况下使用的。然后,他手拿着一张病历卡和一支铅笔在你的床边坐下来,开始询问你的名字。我用德语告诉他：“460－9－120。”他写了下来,却仍然一再盘问你，直到经过一段时间后你终于明白他还需要知道你的‘名字’为止,又过了一段时间后,你会在自己的记忆中搜索到自己的名字。比如，我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让我重复说了三四遍，直到最后他看上去已听明白了为止。随后他还让我看了看他写的东西，我在一个体温登记表之类的表格的顶端看到了“克维什杰尔德”一词,他问我是否‘对’,我回答说:“对。”于是他把病历卡放到了一张桌子上，然后便离去了。

于是,你就有时间了,你就可以环顾一下四周,观察和了解一下这里的环境。比方说,要是在此之前你还尚未发觉,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判断出,房间里还有别的人。只消看他们一眼,你马上就能猜到这些人也都是病人。你可以发现,这种颜色,即这种让你的眼睛感到很舒服的、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深红色,实际上就是纵向铺设的木地板上的一种亚光物质的颜色,此外,所有床铺上的被子颜色也都是与这种颜色相搭配的。床铺大约有十二张，全都是单人的。只有这里的这一张是双层架子床——我睡在它的下层，右边挨着用白漆木板做的简易屏风。我前面有一张床，对面的那个屏

风旁还有两张床。你会为许多没有被利用的地方以及一列列排得笔直的床铺之间那极舒适的一米多宽的空隙而感到不解。当你看到有的地方还有空床位时，你会被这一奢华做法惊得目瞪口呆。你会发现那些被分隔成许多小方块的非常漂亮的玻璃窗，光线可以通过那里从外面透进来。枕套上那印有钩喙鹰图案的浅棕色徽章会蓦然印入你的眼帘,你一定会在上面查找到‘党卫部队’的字样。然而,要是你想从那些脸上窥探出些什么来,想在它们上面寻找到一丝迹象、某种表情,好让你看出他们对你到来这件事(你会认为，这毕竟还算得上是件新鲜事儿）的反映是好奇呢，还是失望,是喜悦呢,还是恼火,不管是什么样的反映,哪怕只是某种瞬间的好奇也行,那你就白费劲了。如果你偶然被抛到这里来的话,你会体验到,这种持续得越久就越令人不舒服、令人不安、令人感到神秘的静默无疑将会是你所获得的最奇怪的印象。你还可以辨认出，在一块周围环绕着床铺的正方形空地上有一张蒙着白布的小桌子,对面的墙边有一张大桌子,它的周围放着几把靠背椅子,门边有一只华丽的、火烧得正旺的铁炉,炉子旁边有一只黑亮的、盛得满满的煤桶。

这时你会开始苦思冥想:到底该怎么来看待这一切,怎么来看这个房间、这个玩笑、这条被子、这张床、这种静默呢?你头脑里会想起一两件事,你会试着回忆、推断,从你已知的情况中进行搜索和筛选。或许,你会像我一样陷入沉思,认为这也许就是我们在奥斯威辛时所听说过的那种地方,那里的人用牛奶、黄油供养被护理的人,直到,比方说,出于学习研究的目的、为了科学而把他们的内

脏一点点地全都取出来为止。当然，你得明白，这仅仅是一种假设,是许多种可能中的一种。况且,最主要的是,除此之外,我连牛奶、黄油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我甚至还想起来了,对面这会儿早该是喝汤的时间了,而在这儿我却没有发现任何与此有关的迹象、动静和气味。因此,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也许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想法,但即使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用上去,谁又能判断得出什么是可能的和可信的,谁又能全部了解那些数不胜数的点子、创意、游戏、玩笑以及可以考虑的想法在一个集中营里都是可以被采用的、可以被付诸于实践的，都会轻而易举地从想像变为现实的。我的想法是，比如说，现在有个人被带到这样的一个房间里来了。比如说,他们就让他躺在这样的一张有被子的床上。比如说,他们护理他,照料他,一切都顺着他的心意,但就是不让他吃东西。比如说,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还可以观察某人是如何饿死的。我得承认,这样做没什么不可以的,说到底,这样做也肯定会有它的意义,兴许是更高层面上的意义。不管我怎么揣摩，这想法显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实用了,以至于我认为,某个比我更了解内情的人显然也会想到这一点的。我开始留意观察我的邻居，即那个躺在我左边的、离我约有一米远的病人。他年纪比较大,光头,脸上还保留着原先那张脸的某些线条，甚至在个别地方还保留着它的一些肉。尽管如此,我仍发现,他的耳朵开始可疑地变得有些像假花的蜡质叶子了，而他的鼻尖和眼睛周围的那种黄颜色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他仰躺着，被子一上一下地微微波动着，看上去就好像他正在睡觉。不管怎样,我试探着悄声对他说“:你懂匈牙利语吗?”什么反映也

没有,甭说懂了,他看起来连听也没听见。我已经转过身去了,并打算继续思考下去,就在这时,我的耳边忽然传来了一个虽低微但仍能听得很清楚的声音“:懂…… ”尽管他仍未睁开眼睛,也没有动弹一下，但这毫无疑问是他的声音。我顿时就高兴得忘乎所以，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足足有几分钟,我甚至想不起来到底找他有何事了。我问他“:你是从哪儿来的 ?”又过了一段看上去像是遥遥无期的间歇后,他回答道“:布达佩斯…… ”我问“:什么时候 ?”耐着性子等了一会儿后,我得知“:十一月份…… ”这时我才终于问道“:这儿给吃的东西吗 ?”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看来,由于某种原因,每次都得有这么一段时间才行,他回答道“:不给…… ”我问……

但就在此时，“护理员”又进来了，而且径直朝他走了过去。“护理员”掀开他的被子,用毯子将他卷了起来。我只是吃惊地看着，他竟那么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个我现在才发现仍是相当沉重的身体扛到了肩上,然后扛着它从门口出去,它的腹部有一条松开的纸带仿佛在挥手道别似的飘荡着。与此同时，我听到了咔嗒一声响，接着是开电器的杂音。随后出现了一个声音，它用德语说道：“理发师们到浴室去,理发师们到浴室去。”这是一个“r”音发得不大准的声音,但听上去倒是很舒服很亲切的,非常柔和悦耳,像是在歌唱似的——这种声音几乎能让你感觉到它的目光。乍一听到这声音,我差点儿从床上掉了下来。然而,我发现,此事给病人们带来的激动也只不过是与刚才我的到来所产生的效果相同，于是我认为，这也一定属于这儿的一桩寻常事了。我还发现门的右上

方有一只棕色的盒子，样子像是一只共鸣器。我猜到了，如此看来，军人们平时就是通过这个装置从某个地方发布命令的。稍等了一会儿，“护理员”又回来了，又到了我身旁的那张床边。他把被子和床单掀起来，通过一个缝隙把手伸进麦秸袋子里，把里面的麦秸整理好，又在那上面把床单铺好，最后再把被子弄整齐。于是我明白了，我真的没有可能再见到方才的那个人了。毫无办法，我的想像又就此发问了：他曾不经意地泄露了秘密，也许他们通过某个类似于对面那东西的装置或天晓得是什么东西听到和觉察到了此事（谁说这是不可能的呢？），这该不会是对他的惩罚吧？但我又听到了一个声音——这次是一个病人的声音，来自窗户那个方向，是从我这儿数起的第四张床上发出来的。这是一个相当消瘦的、脸色雪白的年轻病人，他还留着头发，而且是一头浓密的波浪型金色卷发。他一连两三遍地重复说着同一个词，每个音节都拉得老长，听上去更像是在哼唧，慢慢地我终于听出来了，那是一个名字“普耶杰卡！……普耶杰卡！……”“护理员”听到后，也拖着长长的音儿非常亲切地对他说了这样一个字：“Co①？”于是病人又说了一句长一些的话，普耶杰卡（因为我明白了，“护理员”就叫这个名字）便走到了他的床边。他长久地和那病人耳语着，就像我们和某人说体己话那样，鼓励他再耐心一点儿，只要再坚持一小会儿工夫就行了。同时他把手伸到病人的背后，把他稍稍抬高一点，然后把下面的枕头放好，再把他身上的被子也盖好。总之，他

①波兰语，意为“什么事”。

以一种友好的、热情的、充满爱心的方式做着这一切,这种方式几乎把我在此之前的所有假设都搅乱了、推翻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张重新向后仰过去的脸上的表情所显示的毕竟是平静和轻松,那些轻声的、唏嘘般的、仍听得很清楚的话语‘ Gyinkuje … gyinkuje bardzo … ① ’所表达的毕竟是感谢。最终彻底打断我的冷静思路的是那由远及近的窸窣声、随之而来的嘈杂声,以及从走廊那儿传进来的丁当响声,这种声音是不可能被我听错的,它搅乱了我的整个身心，让它充满了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不可抗拒的期盼,最后似乎已经使我忘记了自己和这预备状态之间的一切区别。那外面人来人往,掀起了一片喧哗声和木鞋底的吧嗒声,然后有一条粗嗓门在不耐烦地叫喊“: 六号房 开饭啦 !” 护理员 ’出去了,之后在一个人(通过门缝我只看得见那人的手臂)的帮助下,把一只沉重的大锅拖了进来。房间里顿时充溢着汤的香味，不过我能够感觉到,今天供应的也只是那熟悉的荨麻汤 如此看来我在这方面也想错了。

后来我还注意到了更多的东西,随着时日的推移,其他许多事情我也都慢慢地搞清楚了。不管怎样,过了一段时间后,虽然只是一点点地、非常谨慎地、十分小心地,但我还是不得不明白,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的确定性。看得出,这种事也是可能的,自然也是可以相信的，只不过它令人感到较为陌生和较为愉快罢了,然而从本质上来说,如果我仔细想一下的话,它一点儿也不比其他的任何怪

①用匈牙利语注音的波兰语，意为“谢谢…… 非常感谢…… ”。

事更为奇怪，而那些事情在集中营里终归全都是可能的和可信的，这样也是，反过来也是，相当自然。但另一方面，正是这一点烦扰着我，令我不安，破坏着我的牢靠感，因为要是我理智地看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毕竟也找不出任何原因、任何合理的、熟悉的、对我的理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偏偏碰巧就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慢慢地我发现了，这里的病人都缠着绷带，和前一个棚舍里的病人不一样。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冒险地作出了一个假设 可以这么说，对面的那个估计是内科，而有谁知道呢，这里的这个兴许就是外科。然而，我自然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把这一点当作那根由劳作、承担、手臂、肩膀和种种想法所构成的、动作协调的链条的充足动因来加以相应的解释。其实这里的确是有一根链条，如果我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的话，就是它把我从小推车上一直送到了这里，送到了这个房间里，并最终送到了这张床上。我也打量着这些病人，试图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总的说来，我发现，他们多数是老居民。我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像是长官，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看他们和蔡茨的人也不大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那些总是于晚上某一相同时间来他们这儿小坐片刻和聊上几句的人的胸前，我看到的全都是红色的三角，比如说，连一个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见到的那种绿色或黑色的三角都没有，然而，即便是我的眼睛比较想见的黄色的三角也没有呀。总之，他们是另一类人，在血统、语言、年龄上，甚至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也都和我本人不同，或者说和那些我此前总是很容易就能够理解的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同，

这有些令我窘促不安。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了，答案可能就在这儿，也许就隐藏在这儿的某个地方。比如说这儿的普耶杰卡吧：每晚我们都是在他的一句告别话“dobrá noc①”的陪伴下入眠的，早晨我们又是在他的问候话“dobre ránó②”声中醒来的。让房间永远保持着无可挑剔的整洁，用一块扎在棍子上的湿抹布擦拭地板，每日取煤、生火、分饭、洗刷饭盆和勺子，在需要的时候搬扛病人，谁知道还有哪些没有包括在内的事情，这一切活儿全都是靠他的双手去干的。虽说他并没有过多的话，但他的微笑和热心肠却是始终如一的。总之，就算他并不是一个担任着重要职务的人，那也终归是房间里的第一号人物，不过就像他的袖章上所印着的那样，真的只是一个首先是为病人服务的那种人，即护士或“护理员”。

或者就拿那儿的那个医生来说吧。现在我弄清楚了，那个长着一张生肉似的脸的人原来是这里的医生，甚至还是主治医生。他的看望，也可以说是查房，乃是每天早晨的一个总是一模一样的、总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仪式。当房间里的一切刚刚整理就绪，当我们刚刚喝完咖啡，饭盆也刚刚被拿到毯子做成的帘子背后（普耶杰卡就把饭盆存放在那里）的时候，走廊上就已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接着就会有一只坚定的手把门完全打开，然后医生就进来了，同时还从喉咙里发出一声问候，估计它的意思是“早上好”，

①用匈牙利语注音的波兰语，意为“晚安”。

②用匈牙利语注音的波兰语，意为“早上好”。

而听上去却只是一个总共只有“早一好”两个字的拖得长长的声音。不知为什么,我们是不宜应答的,而且看得出他也不指望我们应答,除非对普耶杰卡,后者带着自己的那种微笑脱下帽子,以十分恭敬的姿势迎接着他，但正如我在长期的观察中多次所发现的那样,这并不大像是那种极为熟悉的、我们在级别更高的人物面前所必须表现出来的恭敬,而更像是一种纯粹的恭敬,可以说是出自于自己的真知灼见、出自于自己的自由意愿的。随后他从白桌子上逐一拿起，并带着严肃的表情边思考边查看普耶杰卡在那里事先为他准备好的病历——几乎可以说是真正的病历，几乎可以说是在一个真正的医院里，在那种医院里只有病人们的情况才是最重要、最理所当然的问题。然后他转向普耶杰卡,对一些病人的病情提出一些意见，准确地说总是只有两种意见。“克维什……什么?克维什杰尔德!”他读道。我很快就明白,如同刚才不宜应答早上好一样,报告、回答以及发出任何表明我们存在于此的信号也都是不适宜的。随后他说道:“这个人今天出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这句话的意思每回都是指该病人要在上午出去,如果能走,就自己走出去,如果自己不能走,就让普耶杰卡扛在肩上背出去,反正不管怎么样都得到他那里去报到,而从我们走廊的大门出去大约还要步行十至十五米路才能抵达他那堆满刀子、剪刀和纸绷带的诊所。（他并没有像蔡茨的医生那样请我授权。当他用一把奇形怪状的剪刀在我髋部的肉上又剪开两个新的切口时，我发出的声音看来也丝毫没有烦扰到他。随后他在我的伤口上挤压,往里面塞纱布,最后虽十分节省但还上了某种药膏,这也让我

看到了他无可争议的专业水平。)他的另一个可能的意见是‘这个人今天回家!’这话的意思是指,他认为这个病人已经康复了,可以回家了,自然也就是说可以回到营地的棚舍里去,可以回到突击队里去工作了。第二天,一切又完全与前一天一模一样,又是完全按照这种顺序及其规则进行操作的。看来,除普耶杰卡和我们这些病人之外,就连屋里摆放的物件也都在严肃地参与此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配合着他,仿佛每天都在重复做这件不可改变之事,在强化它,在学习它,在证实它。总之,对于身为医生的他来说,治病救人似乎是天底下最自然、最不容置疑的一件事情,而对于身为病人的我们来说,早日痊愈、尽快康复、然后回家才是我们显而易见的任务,也是我们唯一的、巴不得实现的目标。

后来我也了解到了有关他的一些情况。有时候,治疗室里人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些人也在那里候诊。这种时候,普耶杰卡就把我放在旁边的一条长椅上,我就在那里等着,直到医生愉快地催促道“:来,来,来,来吧!”并用一个实际上很友好但终究让人感到不怎么舒服的动作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拉过去,然后一下子把我拎到手术台上为止。另有几次,我去得可能不是时候,护士们正在进进出出地搬运病人,能走路的病人们纷至沓来,房间里还有其他的医生和护士们在工作。这种时候,也有可能由另一个级别低一等的医生给我进行必要的治疗。我们只是谦卑地在旁边等候,并与房间中央的手术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和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处熟了,甚至可以说交上了朋友。他个子比较矮,有着一头白发,长着一只鹰钩鼻子,同样也佩着一只没有标识的红三角,身上的号码并

不是两三位数的,而是非常显贵的千位数。就是他提到过,这正好是我们的医生在集中营的第十二个年头，这一点后来普耶杰卡也加以确认了。“在营里待了十二年,”他轻声地点着头说道,脸上还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似乎表示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不大可能的、而且至少在他看来简直就是无法做到的事情。于是我问他：“你呢?”“我呀,”他脸上的表情立刻发生了改变,“只不过是待了六年。”他朝下摆了一下手,就好像这只是一件微乎其微、不足挂齿之事。事实上,他却在不住地询问我,追问我几岁了,是如何来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的。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意见交换。“你犯过什么事吗?”他问道。我回答他说:“没有,压根儿就什么事也没有犯过。”“那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他问道。我回答他说:“和我这个种族的其他人一样,都是出于同一个简单的原因。”但他还是执拗地问道:“那你怎么会被逮捕的呢?”我简短地、就我所能地向他讲述了那天早上的经历：公共汽车、海关办事处、后来的宪兵队。他又问道:“你父母不知道这事吗?”我对他说:“他们自然不知道。”看来,他是完全惊呆了,就好像他还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似的。我心里想到，待在这里的六年时间显然已使他远离尘世了。他立即就把所获得的消息告诉了旁边的另一个医生，那人又把它告诉了别人——医生们、护士们和那些外表比较好的病人们。最后我发现,四周围的人全都在摇头,全都在看着我,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特别的感情色彩。这让我感到有点不自在，因为我看得出,他们是在怜悯我。我很想对他们说,并没有任何理由可怜悯我的呀,至少在此刻还没有。但后来,我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可以说,

我有些不忍心这样做,因为我发现,这种情感使他们感到惬意,也给他们带来了某种欢乐。也许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我仍不相信是自己搞错了,因为后来他们又这样追问和盘问过我一两次,以至于我得到的印象就是他们几乎是在寻找和挖掘一切能使他们获得这种情感的机会、方式和借口,是出于某种原因和某种需要才这样做的,仿佛是为了证明他们身上还有着某种东西,也许这是他们的一种方法,谁知道呢,也许是要证明他们压根儿还能够这样做吧——至少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而后他们相互对视着，那样子让我不由得惊顾四周,看看是否有外人在注意着我们,但我的目光所到之处只有这些同样紧蹙着的额头、眯缝着的眼睛、紧闭着的嘴唇,仿佛他们一下子又重新想起了什么,而这又在他们的内心得到了证实似的。我只能想到，那也许就是他们在这里的原因。

还有那些前来探望的人。这些人我也都打量过，偷偷观察过，我试图窥探出，到底是哪阵风、哪些事把他们送来的。首先我发现，他们都是在晚上，而且一般总是在那个相同的时刻来到这里的。从这一点上,我也弄明白了 看来,在这里,在布痕瓦尔德,在大营里估计也有一小时的聊天时间,就像我们在蔡茨时一样,显然它也是在突击队回家和晚点名之间的那一段时间里。来得最多的也许要数身上有 P 字母的那种人，但我还在一些人的身上看到过字母 J、R、T、F、N ,甚至还有 No，天晓得还有哪些字母我没有见到过。不管怎么样,可以说,我体验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还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我实际上正是这样才对这里的环境、条件、社会生活有了一点较为准确的了解。布痕瓦尔

德的老居民们几乎都长得很好看,他们的脸是丰满的,他们的动作和步履是敏捷的,他们中有许多人被允许留着头发,条纹囚服一般也都是在白天干活儿的时候才穿的。我看到普耶杰卡也是这样。晚上,当他把晚餐面包(惯常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只的定量,外加惯常有的或惯常没有的‘ 津贴 ’)分发给我们后,比方说,当他打算出门做客时,他也会换上衬衫或毛衣,然后再从他的衣物里挑选出一套时髦的棕色暗条纹衣服，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上衣背后的正中央有一块剪开后再用囚服布料缝补上去的四方形补丁，以及裤子两侧各有一道长长的、洗不掉的红色油彩画痕,还有就是在胸前和左裤腿上缝着红色三角和囚徒号码。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脸上和他的动作中会明显地流露出喜悦之情，然而他在我们病人面前似乎还想有所掩饰。要是他准备在晚上招待客人，那我就要面临更多的不愉快，也可以说是考验。其原因就是不大幸运的设置：墙上的电源插座阴错阳差地偏偏就安装在我的床头边上。这样一来，在这种时候，无论我怎么努力设法想让自己别闲下来，让自己盯着洁白无瑕的天花板和珐琅灯罩看，让自己一头钻进思考中去,但我终究还是能感觉得到,普耶杰卡正拿着一个饭盆蹲在一只属于他私人财物的电炉旁边，听得到人造黄油烧热时所发出的嘶嘶响声,闻得到放在黄油上面煎的洋葱丝、放在洋葱丝上的土豆片以及有时还会加一点进去的香肠片所散发出来的那股扑鼻香味。有一次，我听到一种特殊的很轻的磕碰声和突然变大的滋滋声，这是由一个中央呈黄色而外围为白色的东西—— 鸡蛋所引起的,我一眼就看到它了,但赶忙又转过头去看别处,心里感到十分

惊讶，眼前似有幻觉久久不散。当所有的菜肴都煎熟和做好的时候,晚饭的客人也进门了。“Dobre vecser[1]！”他友好地点着头用波兰语说道,因为他也是波兰人,名叫兹比泽克,有时候我听到人家叫他兹比斯库,这可能是某种复合称谓,也可能是昵称。他担任的也是‘护理员’的职务,据我所知,是在对面某个地方的另一个“厅堂”里。他来这儿的时候也穿戴得十分整齐:足上是一双皮靴,身上是一件适宜于运动和打猎时穿着的深蓝色呢料短外套，不过后背上自然也有一块补丁,胸前也有囚徒号码,里面则是一件领子高及下巴的黑毛衣。他身材高大健壮,不知是出于逼迫呢,还是出于自己明智的选择,他剃了个光头,多肉的脸上有着开朗、狡黠、智慧的表情,整体上来说是一个令人愉快、给人好感的人,不过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吧,我就不愿意让他来替换普耶杰卡。随后他们两个坐到后面的那个大桌子旁,一边吃晚饭,一边交谈,房间里的几个波兰病人也会不时地轻声插上一两句话，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他俩有时还会开开玩笑,把胳膊肘搁到桌子上,两掌相握地扳起手腕来,让一屋子人,自然也包括我在内,感到欣喜不已的是，结果往往是普耶杰卡扳倒兹比泽克那看上去更粗壮的手臂。简短地说吧,我明白了:他们两人是在这里共同分享好消息和坏消息、喜悦和烦恼,分享一切的一切,显然还包括财产和口粮,也就是说,按通常的说法,他们是朋友。除了兹比泽克之外,还有别的人也到普耶杰卡这里来过,匆匆地说上一两句话,有时还迅速地交换

①用匈牙利语注音的波兰语，意为“晚上好”。

过一些东西,不过我从未看清楚过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其实这自然也总是不言而喻的、很容易理解的。还有一些人是来看望躺在这里的个别病人的,他们迅速地、蹑手蹑脚地、偷偷地、几乎是秘密地走进房间,在病人的床边坐上一两分钟,有时还会取出用糙纸包着的一包东西,十分朴实地、几乎都要经过一番推让地放到他们的被子上。随后他们就开始窃窃私语,不过我听不见他们说的话,即便听得见,我也听不懂。看样子,他们似乎是在询问病人:身体康复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闻?他们仿佛是在讲述外面有些什么情况,好像是在告诉病人有哪些人在问候他和关心他的健康状况,然后请他放心，说他们一定也会把他的问候转达给其他人的。当他们忽然想起时间已不早时,他们就会拍拍病人的胳膊或肩膀,像是在说,没关系,下次他们还会来的,然后他们就离去了,走的时候也是轻手轻脚的、匆匆忙忙的,而且大多看上去很满意。其实,照我看来,这种探望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成果、好处和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于是我只能假设,看来,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好像只是为了说这几句话而来的，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和那病人见上一面。此外，就算我无法得知内情，但这种匆忙行为的本身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他们显然是在做某种被禁止的事情,可以估计到,做这种事情一定要得到普耶杰卡的默许，而且还要做得如此这般的干净利落才行。我甚至怀疑过，而且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我还敢于明确地说,这种冒险性,这份执拗劲,也可以说是忤逆精神,本身就属于这件事情的一部分。至少从这些迅速消失的脸上的那种仿佛因成功地违抗了禁令而感到喜悦的难以描述的表情中，我看到了这一点。

看来,他们就好像想要借此得以在某种东西上、在某种秩序上、在一模一样的每日生活中、也许是在自然本身之上进行一些改变、打开一个缺口、弄上一点瑕疵,至少我是这么想的。然而,我所见到的最为奇怪的人却是聚集在离我较远的对面屏风旁的一张病床旁边的那些人。普耶杰卡是在上午把那个病人扛进来的，此后又在他床边忙碌了好一阵子。看得出,那病人的病情较为严重,我还听说,他是俄罗斯人。到了晚上,前来探望的人挤满了半个屋子。我看到了许多 R 字母,还看到了许多其他的字母、毛皮帽子、奇怪的棉裤。我发现这些人的样子都很怪。比方说，有些人的头上半边留着头发，从头中央开始的另外半个脑袋却完全是光秃的。还有一些人留着正常的头发，只不过正好在头的正中央有一条长长的小径从额头一直延伸到后脑勺，其宽度正好是被剃头推子理一下的宽度,他们的外套上也有惯常的补丁,而且还被人用油彩笔打上了红叉,就像我们从语句中划掉某个无用的东西—— 一个字母、一个数字或一个符号那样。另一些人的后背上则有一个大大的红色圆圈,打老远就看得到圈里还有一个耀眼的大红点,很招摇,像是在引诱人,并像靶子似的为人家提供着目标 在必要的时候,就瞄准他们的这个地方射击吧。

他们在那里或站着不动，或原地踏步，或轻声商量。我看到，有个人弯下腰,帮他把枕头摆摆好,另一人也许竭力想听到他说的一句话,或看到他的一个眼神。忽然间,我见到一个黄色的东西在他们中间闪现了出来。他们不知从何处找来了一把刀子，又在普耶杰卡的帮助下弄到了一个金属缸子，然后就传来了响亮的滴答

声。如果说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的话，那我的鼻子现在可以确证，刚才我看到的那个东西是柠檬，毋庸置疑是真的。随后，门又打开了，我大吃一惊，因为这次是医生匆匆地走了进来，迄今为止，我还从未见到过他在这种非常规时间里出现的例子。人们立刻给他让出路来，他弯下腰给病人做了一下检查，触摸了一下他的身体，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就迅即离去，而且脸上的表情显得异常阴沉而又严厉，几乎可以说是暴躁，既没有同任何人说一句话，也没有看任何人一眼，甚至还好像尽力想要避开那些投向他的目光，至少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没过多久，我发现，探视者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沉默下来了。一些人离开人群，走到那床前，还弯下腰去，然后他们开始三三两两地离去，就像他们来时那样。但与那会儿相比，他们的神情现在显得有些颓丧、有些憔悴、有些疲惫了，那一刻似乎连我本人也怜悯起他们来了，因为我不得不看到，他们仿佛最终失去了一个也许曾是那样地为之担心的希望，失去了一个也许曾是那样地偷偷呵护着的信任。过了一会儿，普耶杰卡小心翼翼地把尸体扛到肩上，扛着它离去了。

最后还有我结识的那个人的例子，我和他是在盥洗室里碰见的。当时，在我的头脑里已想像不出，除了走廊尽头左边的那个有一只水龙头和一只洗脸池的盥洗室之外，我还可以在别的什么地方盥洗。到这里来盥洗也不是出于必须、而仅仅是出于礼貌，这一点也是我慢慢发觉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甚至还发现，我几乎已经开始不满了，因为这里没有暖气，水是冷的，又没有毛巾。然而，这里却有一个能够移动的、和敞开的柜子差不多的红色用具，

那里面的器皿总是干干净净的,天晓得是谁在经常收拾、更换、刷洗它们的。有一次，正当我准备离去的时候，有个人推门走了进来。那是一个模样长得挺好看的人，留着一头笔直的、向后梳理的、但在额头两侧却不听话地滑落了下来的黑发,有着头发特别黑的人通常都会有的那种略微发青的脸色。他是个壮年男子，外表考究,身上那件雪白的大褂让我误以为他是一位医生,然而那袖章上的标识却告诉我,他只是一个“护理员”,还有那红三角上的字母 T 表明他是捷克人。他猛地站住了，仿佛有些吃惊，甚至可能是由于看见我而有点儿吓了一跳，他就这样怔怔地看着我的脸和我衬衫里露出来的脖子、胸骨、小腿。他马上问了我几句话,我用这些日子从波兰人的交谈中学到的一个句子对他说：“我听不懂。[1]”于是他便用德语问我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我告诉他，我是匈牙利人,就住在这儿,是‘六号厅’的人。听到我的回答后，他竖起食指对我说：“你：等在这儿。我：走开。一会儿就回来。明白吗?”我回答说,自然‘明白”。他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我一下子发现自己手里有了四分之一只面包和一听盖子已被掀开的漂亮的小罐头，里面装着原封未动的粉红色午餐肉。我抬起头来，打算向他表示感谢，却只看到他身后那扇快要关上的门。回到房间里后,我试着把这件事告诉普耶杰卡,还试着用几句话描述了一下那个人的外貌。他马上就知道了，那个人估计是我们隔壁七号‘厅’的‘护理员”。他还提到了他的名字,听上去好像是鲍

①这句话的波兰语说法与捷克语是一样的。

适,但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那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鲍沙,后来我听到我的邻居们也是这么说的。这期间我们房间里的病人也在更换。比如说,第一天的下午,普耶杰卡先是带走一个病人,然后很快又把一个新病人带回到我的上铺来。那是一个与我同龄的男孩，而且我后来还得知，他与我是同民族的，但说的却是波兰语。我听普耶杰卡和兹比泽克管他叫库 – 哈勒斯基或库 – 哈尔斯基，而且总是把重音放在‘ 哈尔斯基 ”上来加以强调。有时候,他们会跟他开开玩笑,还会故意逗他和惹恼他,因为他常常会生气,这至少可以从他那开机关枪般的语速、他那变粗的嗓门中的气恼色彩以及他那身体的不住乱动之中看出来，这时从横木板之间便会有一阵麦秸雨撒落到我脸上来。对房间里所有的波兰人来说，这都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情。我旁边那个匈牙利病人的床上也来了一个人，也是个男孩。一开始我看不大出他是哪儿的人。尽管他和普耶杰卡能够相互交流，但在我那已经渐渐变得老练的耳朵听来，觉得他还不大像是波兰人。我用匈牙利语和他讲话，他也不应答。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头上已经长出了红色的头发碴,模样很说得过去的那张相当丰满的脸上布满了雀斑，还有他那双蓝眼睛看上去似乎能迅速对一切作出判断，并能很快地摸清形势——这一切都让我立刻就觉得有点儿可疑。在他为安顿下来而忙碌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手腕内侧有一个蓝色标记：那是奥斯威辛的编号,是百万位数的。然而,有一天上午,门突然打开了,鲍适走进来，按照每周一两次的惯例像往常一样把面包和肉罐头放到我的被子上，仍然不给我留有时间表示感谢，对普耶杰卡也只是点点

头,然后就走出去了,直到此时我才知道,那男孩还是会说匈牙利语的,而且至少和我说得一样好,因为他立刻问道":这人是谁?"我对他说,据我所知,是另一个房间的'护理员",名字叫做鲍适,这时他纠正我":估计是鲍沙。"这个名字,据他讲,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很常见的,事实上他也是从那里来的。我问他,为什么在此之前要装作不懂匈牙利语呢?他回答说,是因为他特别不喜欢匈牙利人。我承认,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整体上来说,我自己也找不出太多的理由去喜欢匈牙利人。这时他提议要用犹太人的语言交谈,但我不得不承认,那种语言我不懂,这么一来,最终我们使用的还是匈牙利语。他说他的名字叫路易兹,我听不大明白,也许是劳易兹吧。我还专门强调了一下":也就是劳约什。"但他一个劲儿地反对,因为这样就成了匈牙利人的名字,而他是捷克人,他坚持要区分清楚:是劳易兹。我问他是从哪儿学会这么多种语言的。根据他所讲的,他的老家实际是在匈牙利北部山区[①]。按照他的说法,是'匈牙利人的占领'使得他们全家和他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逃亡异乡的,果然,我的头脑里也闪现出了很久以前的一个日子,那还是在国内的时候,彩旗、乐曲声和整日的欢庆向人们报告着一个喜讯:北部山区又是匈牙利的了。后来他是从另一个地方来到集中营的,如果我没听错的话,那个地方叫做"特雷津"。他说:"你肯定会把它叫做特莱西恩施塔特。"我对他说,我不知道,哪个名字我也不知道。他感到非常惊讶,那样子就和我惊讶地看着那

①原属匈牙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瓜分,二战期间希特勒将其归还匈牙利。

些连切佩尔的海关办事处都没听说过的人时一样。然后，他就告诉我“：那是布拉格的犹太人隔离区。”据他讲，除了匈牙利人、捷克人、犹太人和德国人之外，他还能与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交谈，如果需要的话，甚至也能与俄罗斯人交谈。到了最后，我们俩已经交上了朋友。因为他很想知道，所以我向他讲述了我认识鲍沙的前后经过，还把我起初的经历和印象，比如说第一天关于这个屋子的一些想法，也都告诉了他。他觉得很有意思，甚至还把我说的话翻译给普耶杰卡听，后者嘲笑了我一阵子。此后，他还把我因匈牙利病人而受惊吓的那件事也告诉了普耶杰卡，又把普耶杰卡的回答翻译给我听：原来，那病人的死亡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但它却恰巧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他还翻译了其他一些话，只不过让我感到有些尴尬的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以“ ten mátyár”—— 即“这个匈牙利人”开始的，然后接下去才是他要说的正文。但幸运的是，我发现，他这种讲话方式似乎并没有引起普耶杰卡的注意。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但并没有去多想，也没有从中作出什么推测：他明显地经常要出去办些事，而且总是要花去很长时间。直到有一次，当他拿着显然是从鲍沙那儿得到的面包和罐头回到房间时，我才感到有点儿吃惊，自然，我承认，吃惊其实也是没有道理的。据他讲，他也像我一样，十分偶然地在盥洗室碰见了鲍沙。鲍沙同样也问了他话，如同上次问我一样，后来发生的事情也都和我所遇到的情况一样，但区别毕竟还是有一点的，他能和鲍沙对话。这下弄清楚了，原来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鲍沙对此感到非常非常高兴。此事归根结底也是很自然的，他这么认为，

我自己也明白，的确如此。所有这一切，如果我理智地来看的话，我认为，整体上是很可以理解、很明白、很可以洞察到的，而且我本人的看法也与他一致。看得出，他的观点也显然如此，因为他最后作了一个简短的补充：“你别生气，我抢了你的人。”也就是说，从今往后，以前属于我的东西将是属于他的，以后我将会看着他津津有味地吃东西，就像他从前看我吃一样。然而，令我更为惊讶的是，仅过了一分钟，门就打开了，鲍沙突然匆匆地走了进来，而且是径直朝我这儿走过来的。打这以后，他每次来看望的都是我们两个人。有时他给我们一人一份，有时我们两人总共只有一份，我想，这都取决于他那里的情形，但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也从不忘记用手势比划着让我们像亲兄弟那样进行分享。他仍和从前一样永远来去匆匆，也不把时间浪费在讲话上，他脸上的神情始终是若有所思的，有时显得心事重重，有时甚至几乎是生气的、恼怒的，就像是一个人的肩上现在已经压着加倍的负担、双重的义务，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扛着这落到他肩上的担子继续走下去。我只能想到，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能够从中找到他的乐趣，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需要这样做，也可以说，这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至于说其他的原因，尤其是考虑到这些物品的价格和它们的稀缺程度，那么不管我怎么去观察、怎么去琢磨和揣度，我也无论如何都找不出来了。这时我认为，我至少在大体上已理解这些人了。是的，把我所体验到的一切加以汇总，并把整根链条的所有环节都连接起来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怀疑这一点了，因为我心里非常明白，尽管方式不同，但说到底这也就是我说过的那种工具—— 即固执，

不过我也看得出,它是一种凝结了大量心血的固执,是我所了解到的最有成效的固执，尤其是对我来说，自然是一种最有益的方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奇迹，人也能习以为常的。慢慢地,如果碰巧医生安排我早上去就诊的话,那我就已经是走着去治疗室了，就那么在衬衣外面裹上我的毯子后光着脚走去的。在寒冷的清新空气里，我于许多熟悉的气味中还发现了一种新的气息——那就是即将绽放的春天的气息，如果我估算一下已经过去的时间,这一点就完全可以得到肯定了。回来的路上,我偶然看到，在我们的铁丝网的对面有几个穿着囚服的人正从一个灰色棚舍里往外拖拉一辆可以挂在卡车后面的、装着橡胶轮子的大拖车。我还看到，车上装得满满的货物中有几只冻僵的黄色四肢和一些干瘪的身体部位耷拉在外面。我裹紧了身上的毯子，生怕一不小心又会受寒，同时一瘸一拐地竭力朝我那温暖的房间赶回去。出于礼貌,我大致地清洁了一下双脚,随即迅速钻进自己的被窝,在自己的床上安歇了下来。然后，我和我的邻居（当时他还在这儿，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走了,即‘回老家’了,他的床上来了一个年龄比较大的波兰人)聊聊天,看看印入眼帘的事物,听听从喇叭里传出的命令,可以说,仅凭这些,再借助一点想像力,我就能够从这儿的床上纵览全局,跟踪一个营地里的所有的色彩、滋味、气味、来来往往的动向、各种大小事件的情节片断,而这一切从天刚破晓一直到晚上熄灯时（甚至更晚）都会像被施上魔法似的变到我眼前来的。譬如,“理发师到大门口去’这道命令每天要响好几次,而且

次数越来越多,很清楚:又有一批货物到了。每次伴随着它的还有“ 运尸小分队到大门口去 ”的命令,如果还要后备人员的话,那么我还可以从中判断出这批货物的本质、品质。我可以得知,这种时候‘ 仓库工作人员 ’也要迅速赶到服装仓库去,而且有时要‘ 跑步前往 ”。如果是要找两或四个运尸工,比如说‘ 带一个人去 ’或‘ 两副担架立即到大门口去 !’的话,那你可以肯定,这准是出事故了,是在劳动时、审讯中、地下室里、阁楼上,或天晓得的某个地方出事了。我得知,“ 削土豆皮的劳工 ’不仅有上日班的,而且还有上“ 夜班 ” 的，此外我还得知了其他许多事情。在每天下午的一个固定的时辰里，总是会响起一个神秘的通知：“Elá zwo，Elá zwo，aufmarschieren lassen !”一开始它令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它很简单,但只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渐渐地从每回紧随其后的一种教堂般庄严穆的静默中、从“ 脱帽 !’和‘ 戴帽 !’的号令声中、以及从有时会飘来的吱吱扭扭的轻轻音乐声中猜测到了：外面的营里正在点名，“aufmarschieren lassen ’就是“ 请整队 ”;“ zwo ”是“ 二 ”,“elá ’显然是指 L. A. ,即‘ 营长 ’的缩写,也就是说布痕瓦尔德有第一“ 营长 ’和第二“ 营长 ”,总共有两个“ 营长 ”——从根本上说，这也算不得什么特别大的希奇事儿，如果我仔细想一想的话，这毕竟是在一个据我所知连九万多数字的号码都早已发放出去的地方。我们的房间里渐渐地沉寂了下来，如果轮到兹比泽克来作客的话，他也已经走了，于是普耶杰卡最后再环顾一下四周，然后在他惯常的‘ 晚安 ’的问候声中把灯关上。这时,我会找到我的床所能提供的、我的伤口所允许的最大的舒适,把我的被子一直

拉到耳朵上,旋即进入无忧无虑的梦乡 不,我不可能期望得到比这更舒适的享受了,我明白,在一个集中营里,我不可能再有比这更多的期望了。

惟有两件事情让我感到有些忧虑。其一是我的两个伤口：谁也无法否认,它们在那儿,那区域附近还是鲜红的,那里的肉还没有长好,但在最外缘处已经形成一层薄膜,有的地方已经结上了棕色的痂,医生已经不再往它们里面塞纱布,也很少叫我去治疗,即便是去了,我们也是令人不安地很快就结束的,这种时候,他的脸上也带着令人不安的满意神情。另一件事其实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毫无疑问,我不否认这一点。如果普耶杰卡和兹比泽克突然中断谈话,留意起远方的动静,同时举起手指头让我们也保持安静的话,那么这时我的耳朵里就真的会响起一阵混沌的嘈杂声,有时还会有一种类似于远处狗叫声的断断续续的声音。我猜是隔壁的鲍沙的房间里传来的,那里最近也是非常地活跃,熄灯之后很久,还能够听到隐隐渗透过来的谈话声。每日多次的警报声现在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听得习以为常了。每夜我都是在喇叭里发出的命令声‘ 焚尸炉,熄火 !’中醒来的,一分钟后它又会吱吱嘎嘎地发出命令“: 焚尸炉 立即熄火 !’这回的口气已经恼怒了，我听得出，它无论如何也不希望那碍手碍脚的火光把飞机吸引到它头顶上来。我不知道理发师们是在什么时候睡觉的，但我得知，这些日子里新来的人有时得光着身子在浴室前站上两三天才能进到里面去,我还听说,运尸突击队也在连续工作、轮班作业。我们的房间里再也没有空床铺了。除了已看惯的溃疡和切割伤口外，

我今天头一回从对面一张床上的匈牙利男孩那里听说了步枪子弹所造成的创伤。他是从一个乡村的集中营步行多日赶往这里来的路途中受的伤，如果我没听错的话，那营地的名字叫“奥尔德鲁夫”,根据他的讲述,我判断它大体上和蔡茨集中营差不多。他们一路上不断躲避着美国军队，敌人实际上是对他身边的一个因走得精疲力竭而从队伍中朝外倒下去的人开的火，但他的腿也同时被击中了。他补充说，幸运的是没伤着骨头。我心里马上就想到，如果换了我的话,那就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因为我的腿不管被打中哪儿,肯定都会伤着骨头的,这一点根本就无需争论。我很快得知,他是秋天才到集中营的,他的号码是八万一千多号——这在这里,在我们的房间里,可算不上什么太显贵的号码。总之,这段时间以来，我开始感受到从四面八方逐渐接近的变化、不舒适、干扰、混乱、麻烦、令人担忧的事儿。一会儿是普耶杰卡挨个儿巡查所有的床铺,手里拿着一张表,询问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人能不能行走。我对他说:“不,不,我不能行走。”“白天,白天,”他回答说,“你能行走的。”然后他就把我的名字写了上去,其实他把房间里所有的人,甚至连库-哈尔斯基的名字,也都写了上去,要知道在他那两条肿胀的腿上也布满了成百上千个如张开的嘴巴一样的平行的切口,这是有一次我在处置室里看到的。而在另一个晚上,当我刚嚼完面包时,我听到喇叭里说:“营地里所有的犹太人立即集合!”那声音如此地骇人,以至于我立刻就从床上坐了起来。“你要干什么?”普耶杰卡带着好奇的表情问道。我指了指那喇叭,但他只是微笑着,以自己那种惯用的方式,同时用双手示意:躺下,慢

慢来，干吗这么紧张，这么着急是要到哪儿去？但喇叭整夜地响着，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说着话“：营地守卫。”也就是说它在招集集中营警戒队的那些拿大棒的长官立刻去工作，看来，它也许对他们也不够满意，因为没过多久它便使我感到不寒而栗地直接要求营长和营看守——即集中营里所有长官之中最大的两个人物到大门口去“：而且要跑步而来！”有时则满是问题和责备“：营长！列队而来！营长！犹太人在哪里？”那话匣子不断地在盘问、叫人、发号施令、噼里啪啦或吱吱嘎嘎地响着，普耶杰卡只是生气地冲着它甩着手，或者对它说句：“Kurvá jego máty！[①] ”于是我也就不理会这事儿了，毕竟他比我更了解情况，我又继续安心地躺着了。然而，要是它对前一天晚上的情况感到不满的话，那么第二天看来就会毫不例外地叫道“：营长！全营注意！列队集合！”稍等片刻之后，摩托车的轰鸣声、狗叫声、枪声、扑扑的棍棒声、咚咚的脚步声以及紧随其后的沉重的皮靴橐橐声表明，归根结底，军人们是能够出面处理事端的，只要这样做对有些人更合适就行了，至于说这种违抗命令的结果会是什么，我却直到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周围终于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然而，没过多久，医生却冷不丁走了进来，因为已经到查房的时候了。就好像外面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似的，早上的一切还是和往常一样地进行。然而，此时他却不像平时那么冷峻，外表也不如平时那么考究了：他的脸有些憔悴，那件平时整洁得令人无可挑剔的白大褂上有了扎眼的锈迹，双眼布满

①用匈牙利语注音的波兰语，意为“婊子养的！”。

了血丝。他用阴沉的目光在屋里扫视了一周,毫无疑问,显然是在寻找空床位。

“那个,那个这儿有一小伤口的病人在哪里?!”他一边问普耶杰卡,一边在自己的大腿和髋部附近比划着,同时还用他那狐疑的目光扫视着每张脸。那目光在我的脸上也驻留了片刻，我不大相信他没认出我来,尤其是他碰巧立即转移了目光,重新盯着普耶杰卡看,像是在等待、催促、要求、责令他答复似的。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已经打算起床,打算穿上囚服,打算走到外面那一片混乱的中心去了,然而就在此时我却吃惊地发现,从普耶杰卡的脸部表情至少可看出，他根本就没猜到医生指的是哪一个病人。在不知所措地站立了片刻之后，他仿佛一下子豁然开朗并最终还是忽然醒悟过来似的说了句‘啊呀……对’,并抬起手臂指向那个受了枪伤的男孩。医生也立即表示了同意，他看上去也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就像是有人正好猜中了他的心事，总算给他解除了烦恼似的:“这个人立即回家去!”他马上发出了指令。这时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不习惯的、也可以说是很失礼的事情,迄今为止,我还从未在我们房间里见过类似的例子。我一边看，一边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窘迫、有些脸红。起床后,那个受了枪伤的男孩起初只是双掌合十地站在医生面前,仿佛打算祈祷似的,但在看到对方吃惊地后退一步并于刹那间露出一副不理解的神情后，就径直跪倒在医生的面前，跪在他的膝下，并且伸出双手去抱住他的腿。随后,我只看到医生的手迅速一挥,还听到一记响亮的耳光声,我只听得出他的愤怒话声，却听不清他具体说了些什么。接着他用膝盖把

障碍推到一边,带着盛怒的表情、脸色涨得通红地冲了出去。空出来的床位上又来了一个新病人,也是一个男孩,那种对我的眼睛来说早已司空见惯的又钝又硬的包扎证明他的脚上已经连一个脚趾头也没有了。当普耶杰卡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悄声对他说“:谢谢,普耶杰卡。”我还想证实一下“:刚才,那会儿……”然而,他却反问道“:什么事?……”从这句话中,从他那全然不解、一脸茫然的表情中,以及从他那诧异的、一无所知的摇头动作中,我发觉,看来这回是我失礼了,有些事情看来一定只能由我们自己解决。但至少我认为,首先,一切都是符合公道原则的,因为毕竟我来到这个房间里的时间更早,其次,他的体力比我强,他出去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我的看法),他在那外面的生存机会要比我多一些,最后说到底,主要的是,看来,我对别人的事故比对自己的事故更容易接受一些。不管我怎么看、怎么思忖、怎么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这就是我从中得出的结论和总结出来的经验。然而,最主要的还是开枪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麻烦事,因为两天之后,我们这里的窗户也已经哗啦啦地响了一下,一颗射偏的子弹钻入了对面的墙内。同样在这一天,不断有一些可疑的人来找普耶杰卡,很快地说上一两句话就走了,他也频繁地出去,有时还长时间地待在外面的某个地方,晚上他腋下夹着一个卷成长形的包裹回到了房间里。我看那是床单——不对,因为它还有个把儿。这么说,那是白旗了,也不对,因为有一个包了好几层的东西从它里面露出了一只角。迄今为止,我还从未在犯人的手里见到过这种东西。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动了起来,满屋子都是吸气声、嘈杂声。在把那东西

放到床底下去之前,普耶杰卡先把它拿到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并让每个人都很快地看了它一眼。他脸上的那种微笑、他把它紧抱在胸前的那种动作,让我也觉得好像自己正站在圣诞树下,刚刚得到心仪已久的珍贵礼物似的。那是一个棕色的木部件和一根从其中戳出来的、泛着蓝光的短钢管——一支枪管被锯短的卡宾枪,这个词一下子跃入了我脑海，它还是我从前在那些我非常喜爱的警匪和侦探小说里所读到的。

第二天看上去又会是喧闹的一天,但谁又记得清每一天,记得清每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呢?不管怎样,可以说,厨房自始至终是按照正规秩序运转着的,医生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准时的。后来,在某一天的早上，我们刚喝完咖啡，走廊上就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一声响亮的呐喊,就像信号一样,普耶杰卡闻声也迅速地从隐蔽处扒出他那只包裹夹到腋下，然后带着它走掉了。没过多久，大约在九点钟的时候，我头一回听见喇叭不是向囚犯，而是向军人——即全体党卫队队员发号施令,而且一连说了两遍:“立即离开营地!”此后,我听到了交战声,它一会儿接近,一会儿远去,有一段时间几乎就在我耳边飞来飞去,后来逐渐减弱,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了,甚至过于平静了,因为我徒劳地等待着、倾听着、偷偷地窥探着,然而无论是在正常的时刻,还是过了那一时刻之后(其实早该是用餐的时候了），我都捕捉不到那叮叮当当的响声和送汤人那伴随着它的每日的吆喝声。大概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喇叭终于咔嗒地响了一下,发出一阵短暂的丝丝拉拉声和吹气声后,通知我们说,这是营长,是营长在讲话:“同志们,”他说道,听得出,

他正在和某种令他窒息的感觉作斗争，这感觉使他的声音时而打着呃逆，时而又变得过于尖利、几乎成了叫喊：“我们自由啦！”我心里想到，这么说，营长也和普耶杰卡、鲍沙、医生这一类人持有同样的观点，既然这件事是由他带着如此明显的喜悦之情来宣布的，那么看来他和他们唱的也是同一个调子了。随后，他发表了简短的、漂亮的讲话，继他之后还有其他人的讲话，用的是各种各样的语言。例如，我听到的“Attention，attention！”是法语的“注意，注意！”，“Pozór，pozór！”是捷克语的“注意，注意！”，“Nyimánye，nyimánye，ruszki tovariscsi nyimánye！[①]”——这歌唱般的音调突然让我产生了亲切的回忆，并使我想起了刚到这里时那些围在我身边的浴室突击队成员所说那种语言，“Uvaga，uvaga！[②]”则是波兰语。听到这里，我旁边的波兰病人立刻激动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并且生气地朝我们所有的人大声喊道：“Csiha bendzs！Terász polszki kommunyiki！[③]”我这才回想起来，这一整天，他都是何等地紧张不安、坐卧不宁。随后，令我瞠目结舌的是突然响起了用匈牙利语播送的通知：“请注意，请注意！匈牙利集中营委员会……”我倒是真没料到还会有这个通知，但我注意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什么名堂，从他那里就像从他之前的所有人那里一样，我只听到了自由，而关于误点的汤，他们全都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我同样也极其高兴，自然是为我们获得了自由而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我对自己

①用匈牙利语注音的俄语，意为“注意，注意，俄罗斯同志注意！”。
②用匈牙利语注音的波兰语，意为“注意，注意！”。
③用匈牙利语注音的波兰语，意为“安静！现在是波兰公告！”。

也毫无办法,比如说,我不得不想到,昨天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外面是四月的夜晚,天已经黑了,普耶杰卡也已经回来了。他的脸涨得红红的,显得十分兴奋,不停地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这时营长终于通过喇叭又讲话了。这回他是在寻找从前的削土豆皮突击队的成员,请他们回到厨房里各自的老位子上去,又请营地里其余的所有居民全都不要安歇,或许甚至要等到半夜,因为马上有人要开始为他们烹煮辛辣的土豆牛肉汤① 了。这时我才放松地一头倒在自己的枕头上，这时我的内心才有某种东西慢慢地被释放了出来,这时我自己才开始去想那自由了,也许是第一次严肃地想这个问题吧。

①这是一道匈牙利名菜。

⑨

我回到国内的时节大概与我从国内离开的时节差不多。不管怎么说，周围的森林早已披上了绿装，埋葬着死尸的大坑之上也长出了小草，新时期以来被冷落的“集中地”上的那条只见营火灰烬而又布满各种破布、纸片、罐头盒子的柏油路也已开始在仲夏的酷热中融化了。这时在布痕瓦尔德有人也问过我：想不想上路？我们要走的大多是年轻人，领队是一名矮墩墩的、戴眼镜的、花白头发的匈牙利集中营委员会长官，路上的事情全由他来处理。现在有卡车乘了，一个美国军人愿意用它捎带着我们向东走一段路，他说，剩下的路就要靠我们自己去想办法了，他还鼓励我们称他为“米克洛什大叔”。“生活，”他补充道，“我们还要继续过下去。”的确，我也明白，只要我们还有机会继续生活下去，那么我们自然也不会放弃的。大体上，我已经可以说自己是个身体健全的人了，只是个别地方有点古怪和有点不合格。譬如，如果我用指甲在我身体某个部位的肉上掐一下，那么过了很长时间还看得见那个凹印儿，就像我用刀在某种没有弹性的无生命物质上，比方说奶酪或蜡上，刻了一下似的。我的脸也让我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我记得自己从前在前党卫队医院的一个备有镜子的舒适的房间里第一次看到的是另外一张脸。在我现在看到的这张脸上，在刚长出几厘米来的头发下面，长着一个明显低矮的额头，古怪地向两侧鼓出去的耳朵旁有两个新长出来的丑陋的疙瘩，别的地方还有一些囊

肿，整体上满是一些根据我所读过的书中的内容来说只有因纵欲过度而早衰的人才会有的皱纹、褶子、线条,已变小的眼睛里的目光在我的记忆中也是不一样的，是友好而又充满自信的。再就是我走起路来有点儿一瘸一拐的,还得拖着右腿,而米克洛什大叔却说,没关系,祖国的空气会让它复原的。他还说,回去以后,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祖国。作为开始，他当即教了我们几首歌。当我们徒步穿越路上经常遇得到的小城镇的时候,我们就唱着这些歌,并像军人那样排成三人一行地列队而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其中一首以‘在马德里城外,我们站着守卫’开头的歌曲情有独钟。出于其他原因,我还很喜欢唱另外一首歌曲,尤其是下面这一部分“:我们整日做着苦工／几乎要饿死。／让我们在劳作中断了的手快点拿起武器吧!’又出于其他一些原因,还有一首歌我也很喜欢,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们是无产者的青年近卫军”,接下来就是我们用正常说话的方式插入的一句呐喊：“红色阵线！”这种时候我总能清晰地听到一些门窗关闭的声音，总能发现一些在门洞里悄然溜走的人,或是在那后面匆忙隐去了的人,他们是德国人。

我是带着轻便的行囊上路的,这是一只美国军用背包,形状过于狭窄,同时又显得过于长了一点,是用浅蓝色的帆布缝制的。包里装着我的两条厚被子、用于更换的内衣,以及从党卫队队员们丢弃的仓库里找出来的、织得又厚又密的、领子和袖口上饰有绿色横条的灰色毛衣，还有一些路上吃的东西—— 罐头及其他食品。我身上穿着美国军队的绿呢子裤，脚上穿着一双看上去十分耐磨的

橡胶底的系带鞋,腿上戴着一副牢不可破的皮护膝,还系着与它配套的皮带和卡扣。我往自己的头上扣上一顶厚实得与季节有些不大相称的、形状古怪的帽子,陡峭的帽檐以及由帽顶上的棱角所组成的倾斜四边形（我记得很久以前在学校里学到过，它在几何学上的名称叫菱形)是它上面的装饰,据说,这是一名波兰军官戴过的帽子。或许我本可以在仓库里找到一件更好一点儿的外套穿穿,但最后我仅满足于取一件服役已久的、有着惯常的条纹图案的旧外套,它与别的外套的区别仅仅是上面没有号码和三角,我径直选择了它,甚至可以说是坚持要它,因为我认为,这样做至少不会让人产生误会,此外,我还认为它是一件非常舒适、实用、凉爽的服装,至少对现在、对夏天来说是如此。一路上我们坐过卡车、马车，步行过,也搭乘过公交车——一切均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军队在什么时候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们曾在牛车上、废弃教室里的长椅和讲台上睡过觉，或者就躺在夏日星空下的那些形如蜜糖点心的漂亮房子之间的花坛和柔软的草坪上睡觉。我们还在一条至少对于一双还记得多瑙河的眼睛来说算是比较小的河上乘过船,我得知这条河的名字叫做易北河。我到过一个地方,看得出它以前曾是座城市，现在却只剩下一堆堆石头以及东一片西一片的黑色的断壁颓垣。如今，这里的人们就在这些断壁颓垣、瓦砾堆、废桥梁旁生活、居住、过夜。自然,我曾试着想让自己高兴起来,却又不得不感受到,正是他们使我觉得有些窘迫。我乘过红色的有轨电车，也乘过真正的火车—— 即那种拖着一节节真正的车厢的、里面有供人使用的真正的坐席的火车,不过我也只是碰巧在

车厢顶上找到一个位子罢了。我在一个城市下了车，那里除了能听到捷克语之外，我还听到有许多人在讲匈牙利语。在我们等候事先约定的晚集合时刻之际,车站附近的男女老幼、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到我们的周围来了。他们问我们是不是从集中营里来的，并不住地追问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包括我在内,问我们有没有见过他们的亲人,有没有见过一个名字叫某某某的人。我对他们说,集中营里的人一般不大会有名字。于是他们又急忙描述起他们的外表、面孔、发色等特征来了。我试着想让他们明白,这些特征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人们在集中营里大多数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当我周围的人已渐渐散去时，有一个人却留了下来。此人一身盛夏打扮,只穿衬衫和裤子,他把两只大拇指插在衬衫和裤子之间的两根背带两侧的裤腰里面，同时用其余的指头在外面的布料上敲打戏耍。令我微微一笑的是，他想知道我是否见过毒气室。我对他说“: 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交谈了。”“ 是的，”他接着说，“ 但究竟有没有毒气室呢 ?”我对他说“: 自然是有的。除了其他一些东西外,自然还有毒气室。”然后我补充说“: 一切都要看是哪个集中营以及那里执行什么任务。比如说,在奥斯威辛,我们就能遇到它。而我却是从布痕瓦尔德来的。”“ 什么地方 ?”他问道。于是我不得不重复一遍“: 布痕瓦尔德。”“ 也就是说布痕瓦尔德，”他点了点头。我对他说“: 是的。”听到这里时,他脸上带着一种僵硬而又严厉的、几乎像是在教训人的表情说了句“: 等一等,也就是说，您是听说过毒气室的。 ” 他用的这一十分严肃的尊称不知为什么几乎令我深为感动,我对他说“: 自然。”“ 然而，”他仍带着那种仿

佛要弄明白一些事的真相并从中理出个头绪来的表情接着说，“您本人并未亲眼见过它。’我不得不承认道‘：是的。”原来如此，’他说道，随后短促地点了点头，挺着僵直的后背又到别处去溜达了，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看上去他似乎觉得较为满意。很快就有人传来了话‘：快跑，火车进站了。’我也在车门口的宽阔的木台阶上找到了一个还算相当不错的位子。早上，我在火车快乐的扑哧扑哧的喷汽声中醒了过来。后来，我又发现所有的地名都已经是用匈牙利语标出来的。有人指着那个令我晃眼的地方说：“那片水面已是多瑙河了，这周围的土地已是匈牙利的国土了。”在早晨耀眼的阳光的照射下，这片土地几乎像是在燃烧、在颤抖。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大厅，它的顶棚是破旧的，玻璃窗也全都是破碎的。“是西车站，”我周围的人说道。果真是它，我大体上也认出来了。

外面的太阳笔直地照射在人行道上。扑面而来的是炎热的空气、喧嚣的声音、飞扬的灰尘和繁忙的交通。有轨电车是黄色的，上面的数字是六 看来这也没有变。还有一些商贩，他们面前摆着奇怪的点心、报纸和其他的东西。人们都打扮得非常好看，看得出全都很忙，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一个个都行色匆匆、大步流星、挤攘推搡地奔向四面八方。我获悉，我们也得立刻赶到救济站去，在那儿趁热打铁地把我们的名字登记下来，以便确保让我们首先拿到钱和证件——这可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呀。我还得知，那个救济站正好设在另一个车站——东车站的附近。我们马上就在第一个街角乘上了一辆有轨电车。尽管我见到的街道显得有些

破落,沿街的房屋有的已荡然无存,有的已破旧不堪,另一些则已残缺不全,墙上留下一个个缺窗的窟窿,然而那条路线我大体上还是辨认得出的，同样我也认出了那个广场，我们就在那里下了车。我果然没有记错,救济站正好设在电影院对面的那幢比较大的、丑陋的灰色公共建筑物内。院子里、前厅和走廊上早已挤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在忙碌或高声喧嚷,有的则在闲聊或倾听别人说话。许多人穿戴着七拼八凑的行头：有集中营仓库里弄来的、从大兵们身上脱下来的衣服和帽子,还有些人像我一样穿着条纹外套,但也有些人已经打扮得像小资阶级了 穿着白衬衫,系着领带,把双手放在背后,又商议起重要的事情来了,那派头就和去奥斯威辛之前一样。一个地方的人们谈起了各个集中营里的生活条件,并对它们进行比较 另一处的人们分析着可能会有的补助的金额和力度 还有一些人认为办事手续过于繁缛,存在着不合理的特权，有人占了他们的便宜，他们发现了不公平的现象。然而，在一件事上所有的人都达成了共识 那就是得等待,而且不管怎么样都得等上很长时间。只不过，这种等待让我感到很厌烦。于是，我背起行囊,很快地走回到院子里,并从那里出发,朝着大门口的方向慢悠悠地走了出去。我又看见了电影院,这时我想起,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当我朝右走过一个或者最多是两个拐角后,横在我面前的就将是那条勿忘我街了。

那幢楼我很容易就找到了 它在那儿,至少在我眼里看来,它与街上其他那些似乎有点摇摇欲坠的黄色或灰色的房子并没有什么区别。在阴凉的门洞里,我从卷了角儿的老名片上得知,那房号

也对得上，只是我得一直走到三楼去。我 慢慢地爬上散发着陈腐味和酸涩味的楼梯,透过那里的窗户我看到了天井的悬廊,下面是一个凄凉而又干净的院落 中间有一小块草坪,还有一些常见的令人伤感的树木在挣扎着伸展它们那落满灰尘的瘦小的树冠。对面有一个包着头巾的妇人正拿着掸尘的抹布敏捷地匆匆走出来，别处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声传到了我耳边，某处还有一个小孩在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当我面前的一扇门打开时,我大吃了一惊,因为时隔那么久，我竟然又见到了柠檬邦迪的那双小小的斜 白眼 ,只不过这一回它们是长在一个年纪还相当轻的、身材虽不太高却稍有点发胖的黑发女人的脸上的。她吃惊地向后退了一步,我想,肯定是我那件外套把她吓着了。我怕她会把门关上，便赶忙问道：“ 柠檬邦迪在家吗 ?'她回答说“: 不在。'我问“: 是不是说现在这会儿不在 ?'她轻轻摇了摇头,同时把眼睛也闭上了“: 根本就不在了。'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我发现,她的下睫毛闪现着湿润的光芒,她的嘴唇也有些颤抖。见此情景,我认为自己还是早点走人为好,然而从昏暗的门厅里却突然走出来一个消瘦的、包着头巾和穿着深色衣服的身材瘦削的老妇人。在离开之前，我也得对她讲：“ 我是来找柠檬邦迪的。'她也说道“: 他不在家。'但她的观点却是“: 改日你再来看看,也许过那么几天吧。'我发现,听到这话后，那个年轻妇女做出一个想要回避却又无力做到的动作，把头微微地转向一侧,同时把手背举到了嘴边,仿佛想要捂住什么话、某种声音似的。随后我还得向老妇人解释道：“ 我们曾一起在蔡茨待过。'她又提出一个几乎带追究意味的、有点严厉的问题“: 那他怎

么没和你一起回来?’我几乎像是为自己辩解地说:“我们分开了。我后来到了别的地方。’她还想要知道:“那里还有匈牙利人吗?’我回答道:“怎么会没有,还多着呢。’听到这儿,她带着一丝明显的胜利的表情,对年轻女人说道:“你看到了吧!’又对我说:“我总是在说，现在人才开始陆陆续续地回来。但我的女儿就是没有耐心,她已经不愿意相信了。’有句话我几乎要说出口了,但后来我还是保持了缄默,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她更聪明、更了解柠檬邦迪。而后她还招呼我:“进屋里坐坐吧!’但我回答说:“我得先回家去。”“你父母亲一定在等着你呢,’她说道。我回答道:“自然。’她说:“那就快回去吧,让他们高兴高兴。’于是我离开了。

走到火车站附近的时候,我的腿已经很吃力了,此时在来来往往的车流中刚好有一辆带着我从前十分熟悉的号码的有轨电车拐到我面前，我就上了车。一个枯瘦的老妇人在电车的露天平台上稍微往旁边靠了靠，她的衣领上有着古怪的老式镂空花边。很快就有一个人走了过来，他戴着帽子，穿着制服，要查看我的车票。我对他说:“没有。’他要我买票。我说:“我刚从异乡来,没有钱。”于是,他看了看我的外套、我本人,又看了看老妇人,然后告诉我，乘车是有规定的，这些规定也不是由他，而是由他的上级制定的。“如果你不买票的话,就得下车。’这是他的观点。我对他说:“我腿疼呀!’这时,我发现,老妇人转身去看车外的风景了,但那样子就像是受到了伤害,似乎我是在专门指责她一般,而我却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时,在车厢敞开的车门里,打老远就有一个身材壮硕、黑发已被汗水打湿的人一路吵嚷着挤了过来。他穿着半敞开

的衬衫、浅色的亚麻西服,肩上吊着一个用皮带系着的黑盒子,手里拿着公文包。“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他大声说道。“给我一张票!”他把钞票与其说是递给,毋宁说是甩给了乘务员。我试着向他表示感谢,但他打断了我,生气地环顾着四周说道:“应该感到惭愧的是某些人。”然而,乘务员已经进了车厢,老妇人仍看着外面。这时,他带着缓和下来的脸色转过身来问我:“你是从德国回来的吧,小鬼?”“是的。”“是不是从集中营里来的?”“自然。”“哪一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是的,他对此已经有所耳闻,他知道,那也是“纳粹地狱的一个魔窟”——这是他的说法。接着,他又问道:“他们是从哪里把你抓去的?”“布达佩斯。”“你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总共一年。”“小鬼,你一定见到了许多事情、许多可怕的事情,”他说道。我没有回答。然而,他又接着说:“重要的是,它结束了,已经过去了。”他带着变得开朗的表情,指着我们正打从旁边驶过的那些房子问道:“如今重新回到家乡,见到自己阔别已久的城市时,你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感想?”我回答他说:“憎恨。”他沉默了,但很快又表示说,很遗憾,他不得不理解我的情感。他认为,其实“在一定的境况中”,憎恨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及其作用,“甚至益处”。他补充说,假设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很清楚我憎恨的是谁。我对他说:“所有的人。”他又沉默了,此次的时间就比上回的长了,然后,他又重新开口问:“你是否经历了不少恐怖的事情?”我回答说,那要看他把什么事当作恐怖的事情了。他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地说:“那你一定生活得很艰苦,经常挨饿,可能还经常挨打。”我对他说:“自然。”“亲爱的小鬼,”他

叫了起来,我看到他几乎已经失去耐心了:“你为什么对一切都说‘自然’,而且总是对那些根本不是这样的事情说自然呢?”我说:“在集中营里,这是自然的。”“是的、是的,”他说道,“在那里是的,但……”说到这里,他卡壳了,好像有些语塞,接着仿佛终于找到合适词语似的说了下去:“但……但集中营本身就不是自然的!”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我慢慢地开始明白,看来,有一些事情我们是永远都无法和陌生人、无知者、某种意义上的小孩子们进行争论的。此外,我看见了那个仍在老地方而只是因无人照料才变得有点儿荒凉的广场,突然想起自己该下车了,于是就告诉他,我要下车了。然而,他却同我一道下了车,并指着那边树荫下的一张没了靠背的长椅提议说:“我们到那儿去坐上一会儿吧。”

一开始,他看上去还有些犹豫不决。过了一会儿,他说,实际上,恐怖现在才开始“真正地呈现出来”。他补充说:“这世界目前正困惑不解地面对着一个问题:所有这一切是怎么会发生的?”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时他完全向我转过身来,突然说道:“小鬼,你不想讲述一下自己的经历吗?”我有些惊奇地回答道:“我并没有太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告诉你的。”这时他微微一笑地说道:“不是告诉我,而是告诉全世界。”我问:“说些什么呢?”“说说地狱般的集中营。”他的回答令我愈发惊奇了,我说,关于这一点我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对地狱一无所知,甚至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来。但他却说,这只是个比喻。“难道我们不该把集中营想象成地狱吗?”他问道。我用脚后跟在土里划了几个圈,回答道,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和兴趣去想象,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只能

够想象集中营，因为我对它还有所了解，而对地狱却一点也不了解。“但要是我们就打个比方来说呢？”他变得执拗起来了。在划了几个新的圆圈之后，我回答道：“那样的话，我就会把它想象成一个不可能让人感到无聊的地方。”然而，我马上就补充道：“在集中营里，甚至在奥斯威辛也可能会感到无聊，自然，得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沉默了片刻后，他似乎已有点不悦地又问了我一句：“你该怎样来解释它呢？”我稍加思索后即回答说：“用时间。”“怎么个用时间来解释呢？”“就是说时间会帮忙的。”“帮忙？…… 在哪方面？”“在各方面，”我试着向他解释，“比如说，如果我们到达一个虽算不上豪华但整体上还可以接受的干净整洁的车站，那么那里的一切也都只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慢慢地、逐步地在我们面前变得清楚起来的，这里有多少不同之处。当我们对它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已经把它甩在身后的时候，下一个车站就已经到了。当我们已经了解一切的时候，我们也就明白了一切。在明白一切的过程中，人是不会无所事事的：他会过过新生活，采取新行动，搞搞新活动，做做新事情，以便满足每一个新阶段的每一个新要求。然而，如果没有这个时间顺序，而让所有的认识全都一下子就当场铺天盖地向我们涌来的话，那么无论是我们的脑袋，还是我们的心脏，大概全都会承受不了的。”我竭力想让他能对此有所了解，其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已撕开的纸盒，从里面取出两支皱巴巴的香烟，递给我一支，但我谢绝了。猛吸了两口烟后，他把两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让上半身前倾着，看也不朝我看地用有气无力的低沉声音说道：“我明白了。”“另一方面，”我接着说，“这

里也有缺陷,也可以说是弊端,那就是时间也得消磨掉。比如,我见到过一些俘虏,他们有的已经在集中营里待了四年、六年或者正好十二年,更准确地说,是有的人仍在那里。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得把所有这四年、六年或者十二年都乘三百六十五天,也就是说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是十二乘三百六十五天,然后是十二乘三百六十五再乘二十四小时,接下去是十二乘三百六十五乘二十四再乘……最后再把所有这些都倒回去,每秒钟、每分钟、每小时、每天地倒回去,换句话说,得把所有的时间全都消磨掉。”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继续说下去,'或许这一点又正好帮助了他们,因为要是让所有这十二乘三百六十五乘二十四乘六十再乘六十的时间一下子全部一次性地砸落到他们的脖子上去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也都会承受不住的,无论是他们的躯体,还是他们的大脑,都不会像现在这样承受得住的。'由于他默不作声,我还补充了一句:'大体上就应该这样去想象它。'而他呢,仍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只不过已经扔掉了香烟,现在他用双手支撑着脸,他的声音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变得更加低沉、更加压抑了:'不,想象不出。'我也明白了这一点。我在想,这么看来,他们正是因此才把它讲成地狱的。

他很快地站了起来,看了看表,脸上的表情也改变了。他告诉我,他是记者,而且还补充说是'一家民主报社'的记者。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说的有些话一直让我觉得和从前的一个人——即威利叔叔说的话有点儿像,不过我得承认,前者还是与后者有所不同的,可以说前者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比如,拿拉比说的

话和劳约什叔叔说的话相比较,在拉比的言语,尤其是行为方面以及固执的程度上大概也能识别得出这种可信度来的。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此时才首次真实地意识到的即将到来的相见，于是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去听记者的话了。他说，他想让我们这次偶然的相遇变成一种‘偶然的幸运’。他提议‘‘让我们写篇文章,搞一个‘连载’吧!’文章由他来写,但完全将按照我所讲述的内容去写。这样我还可以得到一些钱,这对我开始‘新的生活’一定会有所帮助的,不过他带着有些歉意的微笑补充说,他‘能够提供的并不太多’,因为这是份新报纸‘‘在物质方面暂时还不宽裕’’。但他认为,目前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医治还在流血的伤口和惩处罪犯’。当务之急是要‘调动公众舆论’和消除‘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甚至怀疑的现象’。他还认为,陈词滥调在这里是一文不值的,需要做的是去发掘出原因和真相来,无论直面它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多么‘痛苦的挑战’。在我的话语里,他看到了‘许多原始的东西’,整体上来说,他看到了时代显现出来的特征,以及，如果我没听错的话，还有时间留下的一种“可悲的印记”。他说，在‘堆积如山的事实材料中’,这是‘一抹新鲜的、独特的色彩’,并询问我的看法。我回答说,首先我得去处理我个人的事情,但看起来,他误解了我的话,因为他说‘‘不。这已经不再是你个人的事情了。它是我们大家的事情,是这个世界的事情。’我对他说‘‘是的,但我现在该回家了。’于是他说了声‘对不起’。我们站了起来，但他看上去仍有些迟疑不决，像是还在思考着什么问题。他问‘‘我们是否能够以相见时刻作为我们连载文章的开始,旁边再

附上一张照片？”我未作回答。这时，他微微一笑说：“记者这个职业有时候是有些不近人情”，但如果我本人没有这个意思的话，那么从他这方面来讲，他也不愿意“强人所难”。而后他坐了下来，在膝盖上摊开一本笔记簿，用手快速地在上面写了些字，然后把那一页撕下来，又站起来，把它递给了我。那上面写的是他的姓名和编辑部的地址，他还说了一句“希望我们能够早日再见”，随后我感觉到了他那只与我友好地紧紧相握的、温暖多肉的、有些汗津津的手。我认为，与他进行的谈话是愉快的、轻松的，他这个人也是讨人喜欢的和很有善意的。一直等到他的身影消失在人流的旋涡之中时，我才把他的纸条扔掉了。

走了几步路后，我认出了我们的那幢楼房。它还健在，完整无损，一切如旧。迎接我的是门洞里的那股熟悉的味道、栅栏井道里安歇着的那部快要散架的电梯，还有已变成黄色的那条油漆剥落的老楼梯。我往上走去，楼梯间里的一个使人回忆起某个亲密而又特别的时刻的拐角也在老地方接受了我的问候。上了楼，我按响了自家的门铃。门很快就开了，但只开到门锁的圆头门闩上的那条链子所允许的宽度，我有些吃惊，因为我不记得从前有过此类装置。门缝里露出来的也是一张陌生的脸：望着我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的一张又黄又瘦的脸。她问我找谁。我对她说，我就住在这里。“不对，”她回答道，“是我们住在这里。”她随即就要关门，但没能关上，因为我用脚把它挡住了。我试着向她解释说：“你错了，因为我是从这儿走的，完全可以确定，我们住在这里。”而她却向我证明说，是我错了，因为毫无疑问，是她们住在这里。她殷勤

有礼,但带着遗憾的表情摇着头,与此同时她一个劲儿地想把门关上,而我也一个劲儿地把门挡着。后来,我抬头看了一下号码,看看会不会是我认错了门,看来,这时我的脚让开了,于是她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我听到,门锁撞上了,又被用钥匙转了两圈。

当我转身往楼梯方向走去时，一扇熟悉的门让我猛然止住了脚步。我按响了门铃。一个身材壮硕的胖女人很快就出现了。她也当即想要以那惯常的方式把门关上，然而她的身背后有眼镜片闪了一下，昏暗中隐约地显现出了弗莱施曼大叔那张灰色的脸。站在他身旁的是老史泰依奈,大腹便便,趿着一双拖鞋,肩上扛着一颗红色的大脑袋,梳着孩子式的分头,嘴里叼着一只熄灭的雪茄烟头。他们的模样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时一样，仿佛就在昨天，在海关办事处的前夜似的。他们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喊出了我的名字,老史泰依奈还拥抱了我—— 戴着帽子、浑身是汗、穿着条纹外套的我。他们把我领进了屋，弗莱施曼大婶则赶忙走到厨房里去找如她所说的“ 一点儿吃的东西 ”。我先得回答那些惯常的问题—— 从哪里回来的、什么时候和怎样回来的,然后才轮到我询问。我得知，我们的房子现在的确已经是别人在居住了。我问：“ 那我们呢 ?”由于他们半晌没吱声 ,我便问道“: 我爸爸呢 ?”这下子他们则彻底沉默了。过了一小会儿，有一只手（我想大概是史泰依奈大叔的手)慢慢地抬了起来,然后再慢慢地降落下来,宛如一只谨慎的老蝙蝠似的落到了我的胳膊上。此后，我在他们所说的话里捕捉住的主要内容只有“: 很遗憾,我们不能够怀疑此噩耗的真实性 ”,因为它是被‘ 他从前的战友们所证实的 ”,据这些人

讲,我爸爸是‘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之后去世的”,死在一个“德国的集中营里”,然而它实际上却是位于奥地利境内的,嗯…… 叫什么名字来着……“咳,’我说道,“毛特豪森。”“毛特豪森!’他们欢喜起来,随后又重新沉郁了下来,并说道“:是的,没错。’之后,我问他们有没有我妈妈的消息,他们马上说,怎么会没有呢,而且是好消息 她还活着,身体健康,几个月前到这幢楼里来过,他们亲眼见到了她,同她说了话,她问起过我的情况。“我后妈呢?’我继续好奇地问道。我被告知“:没错,这期间她已经嫁人了。”“噢,’我接着问‘到底是嫁给谁了?’在名字上他们又卡壳了。其中的一个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个姓柯瓦奇的。’另一个却说“:不对,不是柯瓦奇,而是福多。’我说道“:苏多。’这次他们又同刚才一样欢喜地点着头证实道“:对,自然是苏多。’接着他们说,她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在各方面”,都应该感谢他,照他们的说法,是他‘保全了财产”,是他‘在困难时期把它藏匿了起来’。“也许,’弗莱施曼大叔沉思着说,“她稍有些操之过急了。’对此老史泰依奈也表示同意。“然而说到底,’他补充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点又得到了另外一个老头的认同。

随后我在他们中间又坐了一会儿，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坐在一个松软的酒红色天鹅绒蒙面的沙发里了。这期间弗莱施曼大婶也来了,她端来一只花边白瓷盘子,上面放着涂上黄油的面包,旁边用捣碎的干辣椒和切得薄薄的洋葱圈作着装饰,因为她记得从前我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至于说现在,这一点也立即得到了我的肯定。两个老头儿在这期间讲述道：“没错，在国内也不容

易”。从他们的讲述中，我大体上对一些像一团乱麻般杂乱无序的事件有了一些初步的印象和模糊的轮廓，实际上，我既看不清，也理解不了这些事的。我只注意到，有一个词频繁得几乎令人乏味地反复出现在他们的讲述里，他们用它来标注每一个新的转折、变化以及片段。比如“来了”星房①，“来了”十月十五日②，“来了”箭十字党人③，“来了”格托④，“来了”多瑙河岸⑤，“来了”解放。还有一个常见的错误：我发现，仿佛所有这些模糊的、看起来几乎无法想像的、细节对他们自己来说也已无法还原的事件，不是按照分钟、小时、日、周、月的正常时间顺序，而是一下子全都在一团混乱中、天旋地转中，譬如说，在一个突然变得癫狂的奇怪的下午聚会上发生的，众多的参与者不知怎么回事骤然间全都失去了理智，最后连他们本人或许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了。后来，在某一时刻，他们都不说话了，一阵静默过后，老弗莱施曼一下子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对今后有些什么打算？”我有点吃惊地对他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过。”这时另一个老头儿也动了起来，在椅子上朝我这边凑了凑身子，“老蝙蝠”也飞了起来，但这回没

① 根据 1944 年 4 月 26 日颁布的匈牙利政府令的规定，布达佩斯所有的犹太人被迫迁入大门上有黄星标志的房子里。

② 匈牙利执政者霍尔蒂于 1944 年 10 月 15 日通过广播发表了退出战争及停火声明，宣布停止与盟军对抗。

③ 匈牙利法西斯党徒。1944 年 10 月 15 日晚他们动用武装力量占领了首都布达佩斯所有的战略要地，箭十字党领导人萨拉西发布战争令，宣布接管政府，站在德国一边继续参战。

④ 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被迫迁入的隔离区。

⑤ 1945 年 4 月 4 日苏军宣布匈牙利全境已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之下获得解放。

降落到我的胳膊上,而是降落到了我的膝盖上。“首先,”他说道,“你应该忘掉那些恐怖的事情。”我愈发吃惊地问道:“为什么?”他回答说:“为了让你能够生活下去。”弗莱施曼大叔点着头补充道:“自由地生活下去。”对此另一个老头又点了点头补充说:“带着这样的负担我们是无法开始新生活的。”我承认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我不大理解，他们如何能够希望我去做那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指出,发生过的事情是已经发生过的,我终归不能够命令自己的记忆把它们给忘了的。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时,要么就是在我的大脑出问题或患病时,新生活才有可能开始,我想他们也许并不希望看到后一种情况吧。“况且,”我补充说,“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过。”此时，我看到，他们大为惊讶。他们想知道该怎样来理解“我并不觉得”这几个字的意思。这时轮到我问他们了:“你们在那些‘艰难的时期’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活着,”其中的一个陷入了沉思。“我们设法捱过去,”另一个补充道。我指出:“也就是说,你们也在不断地前进。”“这个‘前进’是什么意思?”他们表示不解。于是我向他们俩讲述了一遍,譬如说,在奥斯威辛,这是怎么发生的。一列火车上大约有三千人，我并不是说总是或必定是这样的，因为对此我无从确知,但就我们当时的情况来说,大概是这样的。我们比方说,其中有一千个男人。每检查我们中的一个人需要一两秒钟，多数情况下是一秒钟，而不是两秒钟。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我们都不用计算,因为这是从来也不算的。对于站在中间的人来说,比如我这种情况，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得等候十至二十分钟才能到达某一

地点,在那里接受人家的裁定:马上就是毒气呢,还是说暂时还继续有机会?在此期间,队伍就已经在不断运动、不断前进了,每个人都朝前走了一步，步子的大小取决于运转速度的需要。

这时出现了一阵静默,打破沉默的只有一个响声:弗莱施曼大婶把我面前的空盘子拿走了，而且后来我也没有再见到她回来。两个老头儿则问道:“怎么会讲到这一点上去的,你想通过它说明什么?”我回答说:“没什么,但并不仅仅是它‘来了’,而我们也走了。只是在现在看来,一切仿佛都是既成的、已完成的、不可改变的、最终的,是如此迅速、这般模糊地‘来了’的。只是在现在,只是像这样在事后，还要我们向后倒着看，才会明白这一点。自然，还有就是只要我们预先知道命运也行。那么，我们所能注意到的果真只是过去的时间。比如说，一个蹩脚的吻和海关办事处无所事事的一天或毒气室一样,也具有其必然性。只不过我认为,不管我们向后看,还是向前看,这两种角度都是错误的。实际上,二十分钟不仅在有的时候，而且从其本身来说，也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每一分钟都要先开始,然后持续,最后再结束,直到下一分钟开始。我说,现在就让我们来推论一下:每一个这样的一分钟实际上原本都有可能带来某种新的东西。然而，事实上却没有带来。自然,我们得承认,它原本是有可能带来的。说到底,在每一分钟里,原本也都可能发生别的事情,就像发生那些碰巧发生的事情一样,例如,在奥斯威辛的情况正是如此,就像我们在家里送别我爸爸时一样。”

听到我的最后一句话时，老史泰依奈有些坐不住了。“但我

们又能做什么呢？！”他带着半生气半埋怨的表情问道。我对他说“：自然，什么也不能够做。”“或者，’我补充说“；随便做什么，这与我们什么都不做同样地荒唐，但又是自然的，而且总是自然的。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试着继续说下去，解释给他们听。“那到底是什么？”他们几乎已失去耐心地问道，我则觉得自己也越来越生气了。我接着说道“：是走路。每个人都在走路，直到走不动为止。我也走了我自己的路，不只是在比肯瑙伊的队列中，在国内我就已经走过路了。我随着我爸爸走过路，随着我妈妈走过路，随着安娜玛利亚走过路，还随着两姐妹中那个大一点儿的走过路，这也许是其中最艰难的一次了。现在我已经能够告诉她，‘犹太人’有何含义 没有任何含义，至少对于我来说，起初它并没有任何含义，直到开始走那些路为止。全都不是真的，没有别的血统，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说到这里我卡壳了，但又忽然想起了记者所说的话：只有一定的境况以及存在于其中的一定的新境况。我也从头至尾地把一个一定的命运经历了一遍。那不是我的命运，但我从头至尾地把它经历了一遍。我无论如何也不理解他们怎么会搞不明白，我现在已经得拿它来做点事了，已经得把它衔接到某件事上去了，我现在终归已经不能够满足于说，它是个错误，是个事故，是一种失足，甚或说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我看到，我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搞不大明白，我的话不大对他们的胃口，有的话甚至好像还直接惹得他们恼火了。我看到，史泰依奈大叔有几次已经想要干预了，还有几次，他差一点儿跳了起来。我看到，另一个老头儿拦住了他。我听到，他对他说“：你不要管他。你没有

看到他只是想说话吗?你就让他说吧,不要管他。’我便接着说下去了,也许是白说,而且说得还有些散乱。即便是这样,我也告知了他们: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够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路是我自己走过的,不是别人走的,我可以说,我在自己特定的命运里自始至终都是诚实的。唯一的一个或许可以被人指摘的污点，也可以说是美中不足之处或唯一的一个非必然性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谈话,但这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他们难道想让我此前所走过的整个诚实的人生之路通通都失去其意义吗？为什么突然会来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什么会有这种对抗？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弄明白，若有命运，便不可能有自由,而若有自由,即无命运呢?说到这里时,我自己也感到越来越吃惊,并且越说越起劲了。我停顿了一下,但只是为了喘口气,然后又接着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即命运。’这时,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看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了。我甚至感到有些遗憾,我所面对的只是他们，而不是更加聪明和更加匹敌的对手。但现在是他们在这里,至少此刻看上去,他们仿佛是无所不在的,不管怎么说,送别我爸爸的时候，他们也在场。他们也走过了自己的路。他们也预先知道、预先看到了一切,他们和我爸爸告别时也仿佛已经埋葬了他,后来他们争吵的内容也只是我到底该坐郊区有轨电车呢,还是该坐公共汽车去奥斯威辛…… 但听到这里时，已不仅仅是史泰依奈大叔，甚至连老弗莱施曼也跳了起来。他现在也在尽量克制着自己,但已经做不到了“:什么?”他冲着我大叫道,脸涨得像只红辣椒一样,同时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脯“:难不成我们,我们

这些受害者,都是罪犯吗?!’我试着向他解释,这不是罪,只是应该明白,也可以这么说,为了理性,为了那份诚实,也应该素朴地、简单地明白这个道理。不能够，那就试着理解一下吧！不能够把一切都从我这里拿走,不能够既不让我成为胜利者,也不让我成为失败者,我既没有对,也没有错,我既不是任何事情的起因,也不是任何事情的结果。试着明白一下吧,我几乎是在向他们乞求了,因为我无法咽下那口龌龊的苦水，并说我仅仅只是个纯洁无辜者。然而,我看到,他们什么也不想明白,于是我背起行囊,戴上帽子，伴随着几个错乱的词语和举动，以及一两个未完成的手臂动作和说了一半的话,离开了。

下面的街道迎接了我。去我妈妈那里得坐有轨电车。但这一回我想起来,自然,我没有钱,于是我决定走着去。为了积蓄力量，我在广场上，在刚才坐过的椅子旁边，又驻足逗留了一分钟。前方，在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有一条街道看上去正在变得又长又宽，好像没有尽头似的。在发蓝的小山上空,云朵已变成紫色、天空已呈深红色。在我的周围也仿佛发生了一些改变：车辆和行人减少了,人们的脚步放慢了,他们的说话声音变轻了,他们的目光显得柔和了,他们的脸似乎也转为彼此相对了。即使是现在,即使是在这里,我也认得出它——这就是我在营地里最喜欢的那个特别的一小时,此后就有一种尖利的、痛楚的、徒劳的情感攫住了我的心：是想家了。一下子,一切都鲜活了起来,一切都在这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我被一种古怪的氛围完全淹没了,那些琐碎的回忆让我颤抖不已。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里的生活更清楚、更简单。一

切我都想起来了,所有的人我都逐一数了一遍,其中包括我不感兴趣的那些人,也包括另一些人——对他们存在的全部证明也只是这一遍清点和我在此的存在 柠檬邦迪、普耶杰卡、鲍沙、医生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此时，我是头一回怀着带有一点点责怪意味的爱恨交加的情感在想念他们。

然而,我们还是不要扯得太远吧,因为我毕竟身在此地,而且我很清楚，为了能让自己活下去，我会接受一切要活着的理由的。是的,当我环顾黄昏中的这个温馨的广场、这条虽被暴风雨席卷过却仍充满万千承诺的街道时,我已感觉到,我的内心里有个意愿正在积聚和增强：我将继续过我那无法继续过下去的生活。我的妈妈正在等我,见到我,她一定非常地高兴,可怜的人儿。我记得,她从前的计划是要让我当一名工程师、医生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人。即便如此,她所希冀的东西也一定能够实现,没有什么荒谬是我们不能够自然地生活于其中的。我已经知道，幸福如同某种绕不开的陷阱似的正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窥伺着我,因为即使是在那里,在那些烟囱旁边，在痛苦的间隙中，也有过某种与幸福相似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只过问我的不幸及那些‘恐怖的事情”,然而对于我来说，也许只有这种体验才是最难以忘怀的。是的，下次，如果人家再问我的话,我应当给他们讲讲这一点,即集中营里的幸福。

只要人家再问我，只要我本人还没有忘记就行了。